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6卷



Vol.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政治经济学报

名誉主编：史正富 张晖明

主编：孟捷 龚刚

副主编：张林 杨虎涛

编辑部主任：李帮喜（常务） 袁辉 张开

审稿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艳 冯金华 朱富强 何自力

张忠任 张衍 周文 荣兆梓

贾根良 高帆

学术支持单位：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

协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peer.org））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6卷



Vol.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目 录

CONTENTS

1	专辑：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刘 灿
11	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荣兆梓
24	论经济学的多元化 龚 刚
29	必须用邓小平两个“历史之问”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何祚庥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及其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 任保平
52	什么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林光彬
59	本期特稿
61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 ——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再解释 孟 捷
61	第一章 生产方式的结构与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
83	第二章 科恩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辩护：一个批判的考察

97	第三章 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其动力：迈向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135	中国经济
137	即将到来的中国危机 理查德·韦格
149	调研报告
151	首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以建筑业为例 孙咏梅 田超伟
185	学术综述
187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九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 李怡乐 韩文龙

专辑：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刘 灿*

摘 要：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经济学，要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征和问题，而且要从基本经济关系层面上研究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权利、利益关系的变化，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保持它长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保持它的指导力和解释力，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 21 世纪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竞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学科开放 学科竞争

一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就需要理论界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所谓学好，指的是认知，也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认知；所谓用好，指的是实践，按经济规律办事。这里讲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及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30 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可以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

* 刘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现代公司理论、产权理论。

展的理论经济学,就需要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塑造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解释力、前瞻力和影响力。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首先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为基础,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基本范畴),包括对现有、正在使用的学术名称和概念进行全面梳理,给予它们丰富的内涵(文献中的语言和实践运用中的语言)。二是对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全面总结、梳理、提炼,这些成果是我们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它推进了20~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有重要贡献。三是构建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对象和方法、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问题(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否构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既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贡献,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二 要加强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和新特征;之后,他又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适应新常态、剖析新规律,是时代赋予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征和问题,而且要从基本经济关系层面研究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权利、利益关系的变化(所有制和产权问题),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举例分析如下。

(一)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都有着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边界,在此基础上,政府和市场都可以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不是对立的,不能以为强市场就一定是弱政府,强政府一定是弱市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其模式的特征也不是一个强市场、弱政府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上也十分强调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积极干预。

经济学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它成为后来以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竞争市场均衡及其效率模型的分析工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非充分就业均衡提出

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并在一系列背景下在实践中被推至极端，而近两次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激化又使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重新反思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有学者还提出了“重构经济学”的问题，以及是否要“回到凯恩斯”的问题。^①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交织和互补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各自作用的边界，有着其制度和体制的特征，我们不能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内来解读这个问题，而应该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研究方法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成熟使得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出现的变革也同时要求上层建筑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反映了这一规律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职能。政府在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主要是起到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作用。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市场运行的基础环境，能够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解决微观市场的不足，能够调和市场在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过程产生的负面作用，等等；而法治政府则更多的是给政府划定了运用权力的界限，避免权力介入到市场中去产生权力寻租，防止行政垄断，保障市场主体的机会均等、交易自由、信息对称和权利公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二）关于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

关于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可能性及所有制改革模式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许多研究发现，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取决于转轨国家市场发育程度及改革的初始条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比完全私有化的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也是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所有制选择模式。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在邮电通信、铁路航空、金融保险、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仍占垄断地位，因而就这些国有公共企业自身而言，政府管制的低效和行业垄断是两大顽症，并没有得到解决。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情况来看，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机制是市场化改革和满足消费者福利的必然要求；从自然垄断产业组织效率和国内市场开放

^① 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已经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大的啦啦队了，尽管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这样想。如果美国要想在经济改革中获得成功，那它必须从重构经济学开始。（斯蒂格利茨，2011）

后产业的竞争力来看,又需要政府以一定的管制来实现这些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遏制无效率的过度竞争。这决定了改革决策者要不断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均衡点。我们需要研究在这些背景下自然垄断行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与放开市场、引入竞争的关系是什么,混合所有制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基础上才是有效率的,并以此指导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具体的改革路径选择。

产业组织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是把技术和市场特征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来讨论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相互关系,在“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中,从结构到绩效,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才能传递这种决定关系,但是企业行为不仅受来自技术和市场的约束,而且受制度(产权)约束。对于在转型期制度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应着重探讨制度因素,分析一个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和政企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技术低效率也会由于政府的政策性或制度性保护导致进入管制壁垒的发生。在不改变产业内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的前提下,放松管制的结果,也可能无法保证市场竞争性的提高。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有两种主要因素在影响企业绩效:一是由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进入壁垒,使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二是在政府长期行政保护下不求进取,服务质量低下,缺乏创新动力,并将低效经营的结果向社会转嫁。在这些部门,政府管制下的严格的市场准入使竞争无法充分展开,企业缺乏竞争压力,而这种竞争恰恰是促进效率的。因此,在这些部门,从单个企业的经营效率来看,用同样的经济指标评价,它可能超过其他竞争性产业的企业,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来看,行政性垄断的维持将是负效应的。在自然垄断产业选择一个合理有效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产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退”字,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非国有化和民营化,而是重新布局。应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经营业务的性质,分层次、多环节地推进民营化的改革措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一般在自然垄断产业中的网络环节(基础性和关键性)应保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主体,可以是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即使是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中国有股份也应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在竞争性环节,应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引入民间主体,形成多种所有制结构,企业的产权结构中国有股份可分为相对控股和一般参股。这就是自然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三)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而它提供的激励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自动导致差距缩小(“倒U形”假说)。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型工业化浪潮中,拉美国家的快速增长与巨大的贫富差距被称为“双重奇迹”,至今还看不出差距自动缩小的趋势。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是一场涉及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结构调整和财产权利重新配置的深刻的社会变迁。改革30多年后，社会产权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当前我国产权结构矛盾的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间财产占有的差距过大，财产权利分配失衡。因此，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0；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2012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0.73。

根据各个国家的经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及政府加大对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力度，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而同时发挥收入分配的市场激励作用。我国也是这样，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发挥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作用。但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不能有效遏制而持续恶化，将成为一个潜在危险因素而影响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稳定、高质量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

从较表象的层次看，当前收入和财产结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不同阶层居民之间及不同区域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居民拥有财产的形式和数量差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及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居民个人禀赋差异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回到初次分配领域去看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即分布状况，来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从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财产结构的。马克思把财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来研究，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财产占有及利益关系，揭露出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核心实质是资本强权，分配的不公源于财产权占有的不平等。财产权的分配使没有财产权的劳动者成为被剥削者，财产权的缺乏使其无法参与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更谈不上参与市场的选择权。而经济危机恰恰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即按资本权力分配使没有资本权力的广大劳动者的收入过低从而消费被限制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财产权结构。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贫富分化和财产权结构失衡是由它的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利是一种财产性生产要素，财产性生产要素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是经济主体获得财产及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性条件，而财产性生产要素的获得又与个人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有关；也与社会政治因素、主观行为特征（对待风险的态度）、有无财产遗赠，以及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当聚财行为等非市场因素有关。从体制性因素来看，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缺失、弱势群体获得财产的能力低、资本强

权下的分配不公、一部分人非正当性途径获得财产权利等，是导致我国转型期财产权在社会成员间分布失衡的重要原因。

财产占有的问题源于财产所有权即生产关系。要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应解决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平等受益的问题，以及在第一次分配中如何以有效的手段保证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合理比例。因此，对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及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政治经济学分析。

三 政治经济学要在学科开放和竞争中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自 150 多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不接受它的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也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揭示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20 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发展，使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在 20 世纪初，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就是经济学，你只要读懂这本书就够了。而今天，就连有 260 多万字、收录 2000 多个词条的《新帕尔格雷大经济学大辞典》恐怕也难以包括经济学发展的全部内容。进入 21 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的开放、融合、创新态势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保持它长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保持它的指导力和解释力，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 21 世纪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竞争。

21 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向何处去？自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世界多个国家以来，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分裂、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深刻问题凸显在世人面前。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希望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造时，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到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西方国家许多学者都尖锐地看到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出了问题，^①也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缺陷，并有“回到凯恩斯”“回到马克思”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根基并没有动摇，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还有其解释力，因此它在 21 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主流。

① 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认为，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托马斯·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克里斯特曼提出了一个“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财产权结构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同时,我们要注意从20世纪以来到进入21世纪,西方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以及新奥地利学派、李斯特经济学、熊彼特经济学等新发展。例如,在当今经济学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无论是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效的产权或者说制度安排都是重要的;并且,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对经济学假定的修改影响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演化经济学不同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是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中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及新资源的创造等,这是否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还有待于我们的观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经济学发展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多元化时代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推崇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反对国家计划调节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对美国和德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李斯特学派,^①等等,它们也可能影响21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进路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竞争的格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与竞争,还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危机的双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继而在北美引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两地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的中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罗宾逊和斯威齐等学者相关著作的推动下,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启了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对话,对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主义危机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展开了更具现代性的分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多布、斯威齐、曼德尔、置盐信雄等学者代表了学院派用现代分析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代表性文献包括:Dobb, 1932; Sweezy, 1942; Mandel, 1962; Okishio, 1961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面对现实经济体中繁荣与衰退的更替,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样性特征的演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视野、方法层面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大量学术流派亦集中兴起,包括“转形问题”的研究、长波理论的重构、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扩张不断挤压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活动空间和话语权,然而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内生的矛盾又为马克思主义

^① 参见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

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理论进步的空间 (Kotz, 2011), 例如, 新帝国主义的扩张 (Harvey, 2003)、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 (Lapavistas, 2009)、生态危机的加剧 (Foster, 2006), 长期困扰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 (Crotty, 2003; Brenner, 2006)、2007 年金融危机后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利润率变化趋势的热烈讨论 (McDonough, 2010; Shaihk, 2010; Mohun, 2011) 等成为最近 20 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中心的话题。系统梳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我们由此可获得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的拓宽, 在理论演进的背后, 我们也能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路径和多样性特征, 这对于增强政治经济学揭示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走向,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选择问题的解释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在 21 世纪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时代, 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and 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 大量非经济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现代经济学极大地增加了它的包容性。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派的“侵入”, 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又发展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 例如, 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将是 21 世纪经济学发展必然面对的新环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主动融入这种学科生态, 在学科开放、学科包容和学科竞争中实现其不断地发展创新。

参考文献

- [1] 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 李俊青、杨玲玲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 [2]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 张子源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 [3]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4。
- [4] 郑秉文:《20 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 《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 [5] 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 《学习与探索》2015 年第 2 期。
- [6] 刘灿、李萍、吴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荣兆梓*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和出版为主线，主题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后一阶段贯穿了百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研究对象扩展到两种经济制度，其时代主题转换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以实践引领理论创新，理论紧随实践发展，总体进程具有更多演化而不是建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三大方法论特点：（1）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2）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两点论；（3）坚持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是我们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主阵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如何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含义、历史地位、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以下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线，划分为两个既互相衔接又互相区别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 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所有制理论、企业理论。

将理论研究的重心转到政治经济学起,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历时约70年。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主线则是《资本论》的创作、出版和最初的传播。第二阶段以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践探索为起点,历经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历时近百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其时代主题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转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东方各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责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划世纪的事件,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路标。而它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两个阶段的分水岭,还有其特殊的理由: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几乎完全是资本主义,在此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为东方世界一系列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的主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此拓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的内容,^①但他们的全部研究还是聚焦在资产阶级社会。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生前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构想,始终不愿谈论任何细节。在他看来,这个课题必须由未来社会的建设者根据实践加以研究。^②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一直到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才真正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上日程的原因。俄国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人们对此是否有清醒认识,或如列宁那样,在革命爆发前残酷政治斗争的空隙中撰写《国家与革命》,为未来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建设做理论准备;^③或如布哈林那样,以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④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几乎是在一晚间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全新的研究领域。国家经济建设面临一个接一个的紧迫任务,要求执政党拿主意、做决策。作为实践依据的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以问题导入,展开了自己旋风般的历史,并且随着东欧、东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理空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旅居英国的少数先知者的事业,也不再是西欧少数工人政党的理论家们的“专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遍布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以本国实践为导向研究本国理论。从这个意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第155~1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89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

④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

上说,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仍然以现代资本主义为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向。这里不仅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而且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说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已经转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创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仅仅是推翻旧世界,更重要的是建设新世界,推翻旧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当俄国共产党人勇敢承担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时,当更多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政权并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创新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东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是,正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追求的目标;东方马克思主义者走到了运动的前沿,代表了运动的方向。他们所面对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是全新的,而且也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在遭遇了许多挫折之后仍不改初衷)未来可能面对的。前沿阵地的胜败关乎全局,特别当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时更加如此。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守前沿阵地,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意义更加举足轻重。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年前曾经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由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人类最终找到的最好制度。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此后20年奇迹般的成就迫使福山修正自己的观点。最近,福山在法国《回声报》载文,承认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竞赛,其结果将决定欧亚绝大部分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前途。^①世界还有变数,历史尚未终结!

其次,相比而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任务更重、创新空间更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从一张白纸开始创建。其理论建设任务之重、创新空间之大,前所未有的。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发展,大量诚实研究者的优质思想成果为研究准备了条件。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精心研读,批判吸收前人成果,最终达到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巅峰。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研究积累的成果无疑更加丰富,但绝大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俄国人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时,这里还完全是一块处女地。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为开垦这块处女地投入了巨大精力,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成熟、不确定,进展并不顺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跟随实践的艰难探索逐步推进,最大的难点是实践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然后才是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就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数百年时间里跨越若干阶段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

^① 弗朗西斯·福山:《丝绸之路,中国向世界发出新的公开收购》,法国《回声报》,2016年1月28日,转引自澎湃新闻。

经济学的发展可能也要经过更长的时间,经历更多的阶段,才能达到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科学、系统的最佳境界。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而两种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格局,也影响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及其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曾经影响了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方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修正了商品交换等于资本主义的旧观点,政治经济学不得不在市场经济一般的前提下讨论两种经济制度的区别,《资本论》因此被重新解读。不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现状与趋势,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一系列新特点。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存在一种理论偏差: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①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

二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践引领创新发展

从认识论的角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逻辑上环环相扣的三个特点:

(一) 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较,研究对象的发育程度不同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以一个业已充分发育而开始显露颓势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对象。19世纪中叶,当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这个经济制度已经在西欧主要国家发育了二三百年的,不仅制度的优势已经释放,而且固有的矛盾也已经暴露。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表现,逐步演进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熟理论形态,开始遭遇理论发展的瓶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适逢其时,应运而生。正是在对这个相对成熟制度的研究中,马克思构建了自己系统、严谨的科学体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可供研究的现成对象,甚至在发展一百年之后,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供系统研究。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成长发育期,其制度优越性尚未充分显示,而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却大量存在,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或者遮蔽作用还难以厘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正在经历从不成熟理论形态向系统成熟形态的艰难转变,能否华丽转身,还要靠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同配合。它所面对的问题首先不是解释现实,因为严格来说,可供

① 中国香港学者潘毅、美国学者李民琪等人近期有关“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言论就很具有代表性。潘毅:《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2016年1月16日,民族复兴网;潘毅:《再论“世界工厂危机”与新自由主义》2016年1月28日,破土网;李民琪:《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阶级斗争》2016年2月14日,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解释的现实还没有以确定的形态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只有在理论与日益展开的实践互动中解决,在实践尚未充分展开之前,事先构造一个系统是不可能的。

(二) 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相比较,改变世界的实践手段不同

早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之初,1846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实践在新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两个阶段肩负同样的历史任务,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抱负。但是二者面对的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世界的方式有重大差别。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生长、发育到衰亡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若干发育阶段,走到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衰老期”。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解剖这个现成的社会有机体,分析它的生理学和病理学,进而找到“改变世界”的方向和路径。结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内在的根本矛盾,正在走向衰亡,其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是,为一个更加先进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推翻旧制度的社会革命迟早会随着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爆发而到来。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说明这一社会巨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研究对象,任何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破坏旧世界。

社会主义是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崛起,开始其生长发育的漫长历程。建设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指经济建设,而且必然地包括制度建设。十月革命以后,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任务落到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肩上,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也发生相应变化,建设新世界的理论必须以全新的形态出现。列宁从治理国家的实践出发,发表了大量演讲与论著,有效处理了新制度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大量论述开拓了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先河。列宁逝世后,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内不同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国家经济过程的方方面面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如商品交换、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运用,国家工业化道路问题,国家机构官僚化问题等,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后,苏联在斯大林主导下进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继而,斯大林根据计划经济实践主持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页。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引入计划经济理论的窄轨。在此期间,“离经叛道”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特别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实践,东欧理论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对这个模式的质疑、调整,甚至突破体制框架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最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创新。近百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但是所有这些从内容到形式千差万别的理论,有一个区别于前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区别于同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它以建设而不是破坏为手段来实现改变世界的目标,基本论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这个成长中的新经济。

(三) 理论紧随实践发展,总体进程具有更多演化而不是建构的特征

因为没有可供参照的先例,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在试探中前进。在重大问题上每前进一步,往往要反复试错,甚至有可能付出超乎寻常的代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预言,新生的工人国家可以由全体工人直接参与管理,^①十月革命后仍然主张工会应该成为国家组织。^②但是,建设国家的实践很快让列宁认识到,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管理经济过程是不切实际的。自上而下的委派制、一长制、集中制才是管理经济的有效方式。^③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都离不开科层等级制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还曾经断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组织应该是一个“国家辛迪加”,^④即覆盖全社会的“大科层”组织,商品、货币关系将会消亡。但是,这个结论很快也被实践否定,于是就有了允许商品买卖、货币流通的“新经济政策”。^⑤此后,斯大林在工业化进程受阻、国家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的严峻时刻,宣布终止“新经济政策”,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轨,商品货币关系重新被关进越来越狭小的计划经济笼子。斯大林在回到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大科层”的同时,给农业集体经济保留了一席之地,进而为国家与集体农业的商品交换保留了一席之地。^⑥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斯大林主导编写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⑦即理论形态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460页。

②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83~384页。

③ 参见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20年1月),载《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278页;《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载《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第407页,第425页。

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460页。

⑤ 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33~334页。

⑥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第11~12页。

⑦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

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而在东欧东亚一系列国家推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三十年借鉴苏联经验，但也从来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结合中国实际，就若干重大问题对苏联模式提出了修正意见。^①不仅如此，1958年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曾尝试突破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的界限，向更加严格的“国家辛迪加”体制靠近。此后，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试图冲破官僚等级制度的羁绊，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组织管理国家。众所周知，这两次大规模社会实验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回顾百年历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关系令人深思。马克思主义主张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里具体化为交替互动、高度纠缠的特殊形式。理论与实践都几乎在一张白纸的状态下起步。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入研究中，就未来社会提出若干原则性构想，这些文献大多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得以综述^②（不包括当时尚未公之于众的手稿）。如前所述，其中不要说细节，就是有关根本原则也未必全都能通过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实践的社会主义大厦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破土的，新建筑依据的图纸除了终极目标之外，其他部分并不是最终完成稿，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差错。勇敢的探索者不得不边设计边建设，还经常会“拆了重来”。毫无疑问，此乃古往今来所有前无古人之开创性事业的共同特点。成功实践的积累会形成理论，正确理论的推行再指导下一步实践。这一特点在以实践哲学指导的社会主义中更加突出：实践不可能完全脱离既有理论，理论也不可能大跨度地超越实践。这种互动就像人类直立行走一样，左脚与右脚不可能分开两步。某些情况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率先前行的往往是介于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之间的党的方针政策。广受诟病的“理论解释政策”现象，其实应当合理解读。首先，政策需要在理论上被正确解释，才能在实践中被有效贯彻；然后，受实践检验的政策才能在理论上得到总结，修正其该修正，提炼其可提炼。总体上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相互关系可以类比量子力学的波粒二重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认为，在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实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理论跟随实践发展，总体进程具有更多演化而不是建构的特征。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720～744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我们已经在认识论层面上讨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下面再从经济学方法论本身来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它既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又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 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这一点在《资本论》的创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研究中,马克思就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三种手段——协作、分工和大机器生产入手,其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致,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这一辩证关系的依赖。^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从开始就被置于最显著位置。经济落后国家能否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并且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定而明确地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进而使建设新制度的探索成为可能。此后,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认为,随着国家工业化纲领的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消灭了。^② 毛泽东正确指出了这一认识的偏颇。但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仍然是不准确的。唯物史观不允许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做先进与落后的比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积极的反作用,但是,超越历史的、“过于先进”的生产关系只会破坏生产力。^③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认清当代生产力的大格局,进而找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形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更加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度,而且是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刚刚脱胎而来的,具有高度延续性的社会演进阶段。破坏需要有度,建设也必须有据。如何把握好分寸与尺度,以推进社会变革?东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目标坚定、手段灵活的长期探索,才最终找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坐标。虽然理论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入,但是基本的结论已经形成:当今时代全球范围的生产力需要市场经济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从市场经济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还需要全球生产力更程度的发展。

邓小平对此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第374~375页。

③ 参见荣兆梓《毛泽东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两次探索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界》2013年第5期。

必要性和必然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长期看，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从国际环境看，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逐步摆脱国际竞争的被动局面，抵抗国际资本的入侵。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两点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发展的最新成就。其核心命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两点论。

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第一阶段的重要结论，曾经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常识。进入第二发展阶段，这一“常识”很快就受到质疑，并且随着实践的展开为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但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融合，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范畴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实践是这一理论突破的第一动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辩证统一的理论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孕育与萌动后终于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理论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育，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须巩固完善，坚持两点论就是坚持我们的制度优势，而探索两者的兼容与融合则是制度演进的主线和理论创新的核心。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更多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真诚地学习、引进各种外国经济学说，把他们当作朋友，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的确也为国内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人在登堂入室之后企图坐上主席，要以他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水火不容的市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将社会主义百年探索的成果彻底摧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创新发展，不能不对这样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另外，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少数人，沉湎于已经被百年实践证明错误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否定市场经济与当代生产力仍然相适应的基本性质，不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不理解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怀疑深化改革方向，唱衰中国发展前景。这些人的观点和意见阻碍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同样需要有所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与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两点论正是在这一理论斗争中逐步发展完善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不仅是对实践的要求，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指导方针。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剩

余价值理论的坚实基础上，以无可辩驳的辩证逻辑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是否必须抛弃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另起炉灶？一开始，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最典型是十月革命之初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甚至认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应当终结。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有限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完全否定剩余价值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以及与此有必然联系的资本范畴，一直到今天还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说这些范畴只适用于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而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无关。可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资本论》范畴体系中市场经济的一般意义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不仅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适用于社会主义，而且《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从直接生产过程到资本流通过程，再到包含了利润率平均化和剩余价值分配在内的生产总过程，几乎《资本论》前三卷的每一部分，都包含了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内容。马克思的研究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对象，当然其基本结论，如阶级对抗、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等，都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避免这些结论的根据并不是消灭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而是利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对这些市场经济共有的规律进行了有利于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而扬弃资本主义，因此，两种经济制度在市场组织各个领域的共性特征比原先想象的要多。《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还在于对市场经济一般的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守《资本论》的经济学范式，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推进学科创新发展，进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大体上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内容。但是，由国情和执政党根本任务决定，其重点必然在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是我们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主阵地。广义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两个交替互动的侧面，前者是写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政治经济学，后者则是实践的影射、实践的总结、实践的提升。狭义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指其理论形态，而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共同努力、代际传承、

动态演进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一本书，而是由千百人持续推进的理论事业。

经济学理论以范畴体系的形式展开，但理论体系不是静止的存在。理论跟随实践发展，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与之匹配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理论体系的跃迁中发展的：譬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到李嘉图的《赋税原理》，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尚在发展中，它的不成熟、不完善显而易见。我们今天所能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很可能同样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但我们必须去做。因为只有系统性的理论才能在总结实践中提升，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做出更大贡献。以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系统思考，可能是数十年来此类努力中最近的一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想法还很粗糙，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和争论，以加快理论演进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劳动生产力范畴为起点，^①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通过七个部分的内容逐层展开。

第一部分，总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劳动生产力）。

以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起点，发展生产力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手段；先从当代生产力现状出发论证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内在联系；再从基本国情出发，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是发展当代中国生产力唯一有效的社会形式。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企业生产力）。

讨论公有制的内在矛盾，公有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劳动平等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公司、合作经济及其他公有制的效率优势，以及公有制不同实现形式的效率比较；混合经济中的劳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企业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劳资和谐的制度保障与生产力基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比较，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力格局。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积累（人的全面能力）。

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共同富裕，它经历与经济发展方式相联系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现代生产力突破市场经济界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人的全面能力与共产主义。

第四部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协调机制）。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的总量问题源于结构不协调，供给侧结构与

^① 参见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需求侧结构的辩证统一；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调整：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生产力的空间结构，以及相应的区域间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绿色发展与社会劳动生产力；价值规律、时间分配规律、社会经济效率。

第五部分，多元利益下共享发展（社会生产力：动力机制）

公有资本参与的利润率平均化，创新利润、创业利润；混合经济的资本市场，利息、股息与其他；公有土地的租金、价格，混合经济中的房地产业利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其防范；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叠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格局，分配公平与和谐社会的生产力；利润率下降趋势与投资动力学，公有制与共享发展。

第六部分，国家经济过程与政府作用（国家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及其运用的自觉性，政府成本与政府效率；国家财政，财政、税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国有经济的社会功能，国有经济的管理形式，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国有资源与国家理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第七部分，发展中大国的开放发展（国际竞争力与全球生产力）。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秩序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屈从与抵抗，中国模式的成功及其示范效应；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和劣势，国际价值和全球价值链；国际金融，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两个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倡导劳动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因素和中国责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理论工程，不可能靠一己的力量独立完成。希望有更多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同志们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 [1]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
-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 [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
- [4] 弗朗西斯·福山：《丝绸之路，中国向世界发出新的公开收购》，法国《回声报》2016年1月28日。
- [5]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 [6]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58。

- [7]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
- [8]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
- [9]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57。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4。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
-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 [1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 [15] 荣兆梓：《毛泽东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两次探索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界》2013年第5期。
- [16]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
- [17]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

论经济学的多元化

龚 刚*

摘 要：(1)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经济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或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2) 然而，与一般的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经济学研究通常不是在一个确定性的实验环境下进行，而是以极度错综复杂、不断动态演变和受各种不确定性冲击的人类社会为其界定环境。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非普适性，而经济学理论的这种非普适性必然意味着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3) 学术也有“市场”，也存在着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4) 学术垄断是可怕的，它不仅会固化学术思想，阻止学术进步，而且，由于经济学理论的非普适性，学术垄断更有可能因其脱离现有环境而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5) 中国应极力避免经济学的学术垄断。如同在产品市场防范垄断通常需要政府干预一样，在学术市场上，政府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防范学术垄断。

关键词：科学经济学 非普适性 多元化 学术垄断

对于经济学多元化的讨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什么是经济学?”。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

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当中，经济学被归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学科并不一定等于科学：算命术如果弄得复杂和系统一点也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很多人也会去研究它。然而，它绝不可能成为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真理、规律和事实。进一步说，作为一门科学，它研究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什么（What will happen）。显然，科学是不受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的，而学科则不一样，可以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

那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或仅仅是一门学科？为了展开讨论，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谈起。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本人的经济学教材例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定义被称为“规范经济学”的。显然，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学实际上就成为一门劝说你应该

*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如何去做 (What should we do) 的学问。目前主流经济学中频繁出现的最优化模型, 不能不说深受此种定义之影响。此外, 这种定义也非常迎合一些经济学家们所喜好的指点江山之责任。

遗憾的是, 这种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必然意味着经济学有很大的立场和价值取向, 因为“有效”或“什么是最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和立场取向问题。确实,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学已经不是一门科学, 而仅仅是一门学科!

然而, 除了上述规范经济学的定义之外,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即在我刚接触西方经济学的那个年代), 经济学还有着如下“实证经济学”角度的定义: “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经济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或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显然, 这种定义更符合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不具有阶级性, 也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去研究经济问题, 则他 (她) 就是科学家, 有资格申请科学院院士。

也许有人会说, 经济学研究通常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而经济学家有责任向政府献计献策。然而, 第一, 只有当我们充分研究了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或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第二, 作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 或者作为一名科学的经济学家, 他 (她) 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提出政策和建议以期达到某种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 事实上, 他 (她) 还必须告诉政府和民众这样一种政策和建议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影响。例如, 某项政策尽管能使失业减少 (这也许是一个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 然而, 它却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 (而这不会被政府和民众所认可)。当然, 该项政策最终是否被采纳仍然在于政治家和政府的抉择。而这似乎又让我们重新回到了经济学之科学定义; 相反, 如果经济学家仅仅提出某项建议而吝于展示它可能带来的全方位的经济效果, 则我们很难称之为合格或科学的经济学家。

科学经济学视角下的多元化

然而, 与一般的自然科学所不同的是, 经济学研究通常不是在一个确定性的实验环境下进行, 而是以极度错综复杂、不断动态演变和受各种不确定性冲击的人类社会为其界定环境。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非普适性。

首先, 我们已经知道, 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由于经济和社会环境制约着经济人的行为和选择, 从而形成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 因此, 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会具有不一样的经济学理论, 即不一样的经济变量的决

定方式。这实际上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普适的经济学理论。例如,目前全世界普遍接受并用于课堂教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自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研究,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产生于截然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时,必然会因水土不服而令人感到“迷惑”或被认为是“反逻辑”。

其次,经济学的规范作用(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建议等)有可能会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而当这样一种改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求我们重新界定经济环境,由此而产生新环境下新的经济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针对同样一个国家,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真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的非普适性还体现在对于同样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们对其界定和理解通常也是不一样的。例如,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为其主要背景来研究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然而,即使是针对这样一种特定的经济环境,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学派: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大学派之间的不同来自它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环境之界定。

在新古典学派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市场经济。这种完全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的规模上(即每个企业规模都很小,从而其行为将无法影响市场价格),而且体现在交易模式上(如瓦尔拉斯的拍卖型交易模式)。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的界定下,逻辑演绎的结论是:市场能得以出清,社会资源能得到最合理的安排。毋庸置疑,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至理名言。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西方主流社会一向引以为豪的价值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大萧条的时期。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产生背景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解释将无法体现亚当·斯密的至理名言。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和垄断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交易也绝非通过拍卖;信息的传递通常是不对称的,具有非完整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未来对它们来说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与此同时,市场的价格调整也通常具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失业和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减少失业和修复市场的失衡,特别是当这种失业和失衡达到足够多、足够大的时候。

由此可见,经济环境的极度错综复杂和不断动态演变决定了经济学理论的非普适性,而经济学理论的这种非普适性必然意味着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

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因经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学理

论,而且也体现在对于同样的经济环境,因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最后,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也应体现在经济学研究成果在表达方式上的多元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因强调学术化而过分地“数学化”,进而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和现实化。这具体表现在:①依赖西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加甄别地用数学模型等学术化工具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②“重形式轻思想”对于具有创新性思想且对中国当前现实问题具有很好深度分析的文章,如果没有数学模型等学术化工具,则一概不予重视,并拒绝发表。

我们认为,数学工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问题,且新的经济学理论如能被数学模型解释和检验则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由于目前西方主流世界普遍接受并用于课堂教学的经济学理论通常来自于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产生于截然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中国经济现实时,难免会水土不服。然而,此种水土不服完全可能在高深的数学模型下“隐身”,从而在对数理逻辑研究方法之膜拜中,精华和糟粕统统被接受下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许多战略性发展问题没有现存的理论可供借鉴,也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和分析(或至少不能在短期内构建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然而,由于这些问题和现象又是如此的重要和紧迫,因此,用数学模型作为发表文章的前提条件,很容易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脱离中国的现实,无法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此我们呼吁:在提倡“中国现实问题学术化”这一更高境界的同时,不要再拒绝当前还无法用数学模型验证的根植于本土现实世界的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思想萌芽。

走向科学和多元化的中国经济学研究

学术也有“市场”,也存在着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垄断,这和一般的商品市场没有实质的区别。而一旦某种经济学理论成为垄断,则该理论所形成结论就有可能被固化,从而产生出强大的意识形态。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统治学术界,显然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与其他经济学理论(包括凯恩斯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而经济学的定义之所以能从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并重转向只强调规范经济学,显然也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统江山有关。

学术垄断是可怕的,它不仅会固化学术思想,阻止学术进步,抑制学术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而且,由于经济学理论的非普适性,学术垄断更有可能因其脱离现

有环境而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2008年所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与西方经济学界的学术固化和垄断不无关系。

中国应极力避免经济学的学术垄断。第一，经济学研究应重回科学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之轨道。唯有如此，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才可以交锋，才可以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唯有如此，才可以使中国在重大决策和战略性问题上不至于犯下大的错误。

第二，如同在产品市场一样，防范垄断通常需要政府干预。在学术市场上，政府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防止学术垄断。例如，政府应适当扶植一些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非主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期刊，适当提高其在各种评审（如大学职称评审）中的地位；在各种奖项和学科的评审中，也应适当兼顾非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思想和学术的进步通常表现为非主流对主流的逆袭。容忍学术垄断将固化学术思想，阻止学术进步。科学是如此，经济学更是如此。为此，我们倡导科学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

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国际主流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其经济环境之界定，而这必然限制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经济文献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很少有“线”可查。有关的研究通常是零散而不系统的，而且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领域。许多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动态优化等）更没有很好地被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亟待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共148个，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82%，但是它们的经济现实无情地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必然会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推动经济学研究迈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以中国经济为素材，融入发展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成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逆袭，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这一逆袭过程中具有当仁不让的责任。

必须用邓小平两个“历史之问”指导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何祚庥*

摘 要：本文对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两个历史之问，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又从这两个问题入手，较系统地讨论和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决定人类社会进步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动力。而阶级斗争，只是在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解放生产力时，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这对基本矛盾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的社会性”出发，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做新的解读。尤其需要看到，市场和科学技术都是价值中性的，两者都是手段。而因此，必须将科技创新和市场进步引入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改革。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 使用价值 全要素生产率

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5年12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特别谈道，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又说，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回答和实现的重大理论问题。

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却大多只会“言必称希腊”，“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毛泽东还具体批评某位黄姓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① 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也一直组织各级干部、学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成立初期的新中国，一直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未能持续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因

*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7~798页。

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上述“言必称希腊”的学风,其实并未根本转变。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如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问题上,众多学者意见分歧,纷争不一。产生这一重大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于有相当一些学者,对新中国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重大发展的事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理解不足、估计不足。尤其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两个“历史之问”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认识、理解、估计不足。因而在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建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问题上,也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 邓小平的两个“历史之问”: 1)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2) 什么叫社会主义?

(1) 早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召开的为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而在5年后的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中,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两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提出两个“历史之问”: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

较为清醒一些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③

必须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邓小平会在1984年,提出这两个“历史之问”?而对这两个“历史之问”,其回答却是“最注重”“就在于”“发展生产力”。

也许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邓小平这里所说“认识不够清醒”的“我们”,是“谁”?不用说,这里当然包括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才接触或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后辈”。但更重要的是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多年革命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竟然会提出“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社会主义”这两大疑问?而且认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当然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正面临重大转折。而且因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对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2~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

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而我们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①

至于“何谓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就谈到并且批评了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

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竟然做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亦即并不是最注重阶级斗争！实际上这涉及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从来没有明确回答和解决的根本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推动历史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还是阶级斗争？

前辈哲学家吴江同志在他去世不久前曾约我到他家中，深入讨论若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他给了我一篇在他晚年写的《论历史的动力》的理论文章。他告诉我，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早期，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由此引起，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

他还告诉我，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拿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面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②

现在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到了为上述“争议”做结论的“时代”了。应该明确，这也是邓小平的回答，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决定着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阶级斗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即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而这样一重大问题的回答，不能不牵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31页。

② 吴江：《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154~155页。

学的研究。坦率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阶级斗争学说强烈的信奉者、支持者。青年时代的何祚庥等人,之所以决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就是因为早年读到的,马克思所写的如下字句: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而现在却要转到“社会生产力是决定历史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这就不能不质疑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学说是否十分正确?或仅在特殊条件下才正确?如果思考得再深入一些,就还要进一步提问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相关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还正确?或仅在一定时期、一定特殊条件下才正确?这些都是对深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不科学地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2) 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到,劳动价值论其实是以许多重大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奠定它的科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历史经济重大变动发展的动因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成就,认为“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是人类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要考察某个社会,其投入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有多少,所创造的“价值”又有多少?而大体上说,某个社会所能投入的“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虽然会随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体制而有所差别,在总体上,却总是和人口总量成正比。因而判断某一国家或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往往首先考察某一个社会所包含的人口总数、就业人数,是增长还是减少。或者说,按照劳动价值论,某个国家或社会的总产值,将大体上和总人口成正比。

这一点,完全得到了中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证实。

在林毅夫所著《解读中国经济》中,曾给出美国哈佛大学珀金斯所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所给出的从明朝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的一项研究:他从中国2000多本县志中,把各种有关生产、人口的数据逐一统计,然后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根据他的研究,在1368~1968年这60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增加了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单产增加了2倍。由此算出,粮食增产10倍,但是人均粮食产量却维持不变。^②当然,类似统计数字还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31页。

②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67~278页。

很多人的研究。

这就是说，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国家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人口增加。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均产量的增加，即劳动生产率，却长期维持不变。而一旦出现了“水旱黄汤”等天灾人祸，就必然导致人口的死亡，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这类由社会经济许多统计数据所提供的强烈的证据，可以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强烈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剩余价值论及相应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得到了很好的检验和证实。1948年年初，我曾有机会参观在冀中地区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曾仔细学习过《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的一份内部文件。正是这一文件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具体给出了如何计算剥削量、如何计算各不同阶级、家庭及个人所占有的剥削份额的许多规定。正是这一文件帮助土改工作者正确地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读到这些历史文件之后，对于马克思发明的剩余价值论，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学说，真是倾倒佩服之至！从而也就完全确立了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的信心、决心。

(3) 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将阶级斗争学说，移用于打倒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天下大乱！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发展也严重滞后于那一时代的发展！而中国周边的邻国（或地区），如日本和“四小龙”，却在这一时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从1959~1976年，整整17年，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和“四小龙”的GDP上升速度做一比较：日本是8.44%，韩国是9.45%，中国台湾地区是9.57%，中国香港地区是8.45%，新加坡是9.24%。这就不得不提出尖锐问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①

而在那一时期，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当然也包括我们，却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由阶级斗争学说引申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重大历史行动的。举一个例子，像朱德总司令这样的早期领导井冈山斗争的领导同志，就在《喜读主席词二首》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充分的支持。其中就有“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这样的诗句。可以说，那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了党中央许多革命前辈的几乎一致的支持。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空前失败！

① 何祚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学术界》2013第7期，第9页。

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必须明确回答或科学总结的重大理论问题。阶级斗争及剩余价值的理论、学说是否还正确？或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革命时期才正确。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理论就变得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当然也会有人认为，这不是理论的不正确，而是运用和解读得不正确。在土地改革时期，人们曾运用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份额做了许多定量计算，而“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走资派”，却全未见到这种定量的分析。

痛定思痛！我是完全支持对“文化大革命”不仅要全盘否定，而且还要深入反思的！这就必须有一个对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的完整的、科学的分析。

三 甚至在“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也仍然强调要“发展生产力”，而传统的理念，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所带来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私有制，建立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民所有制

(1) 邓小平的回答是：①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③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④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⑤理由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⑥否则就不能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了。⑦

后来，到了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⑧或者说，在何谓“本质”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提到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剥削和消除压迫人民的私有制，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公有制。而从邓小平同志来看，更重要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取决于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⑨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5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⑦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页。

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或者说，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依靠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远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做到。

(2) 那么，当代中国将怎样“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回答是：

第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第二，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③

现在发生重大争议的是除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以外，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而且引起巨大争议的，是在体制改革上，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经济体制，包括市场经济及它们推行的计划控制等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但是，一个显然的疑惑是，这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复辟？

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讥讽邓小平同志为眼光短浅的“不论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是邓小平忙于“救急”，不顾“长远”。然而这大错特错！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多次谈道，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④

(3) 那么，我们应怎样“从理论上搞懂”“搞清楚”邓小平的这些论述？

首先是必须从理论上真正搞懂、搞清楚，为什么当代已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将来必定会走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要真正搞懂、搞清楚，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有性”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8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9页。

矛盾；而其中“生产的社会性”又是基本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方面。

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力将持续不断地越来越走向社会化的分工和协作，其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细，其协作范围将越来越广。或者说，生产力的社会化自身，及其所使用的“手段”，也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和本性。正是生产力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的特性或本性，决定着人类社会在分配上也必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讨论的个体生产演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过程，做了如下描述：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①

问题是，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而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②

正是这一“社会化劳动”，或“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的事实，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冲破“占有的私有性”带来的种种消极面；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走上适应于这类社会化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从邓小平来看，“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4) 问题是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其社会化程度早已超越了生产成品是某个工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295页。

某个企业的“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现代化的许多生产成品，甚至是远隔重洋，超越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大洲的地理区划，并由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协作组合而成的“共同产品”。世界经济，也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力，正通过不断发展中的各种“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科技市场，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市场，而联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历史上空前的超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市场”是构建现代社会化生产力走向全球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中介。

而邓小平却比我们想得更为深入。邓小平同志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①

所以，接下去又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② 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和作用，做了根本性的颠覆！也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做了重大发展！

这也就是说，从邓小平同志看来，市场和科学技术一样，都是价值中性的。它们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市场，也和科学技术一样，既有被私有性所占有的一面，同时也有服务于社会化的一面。所以，市场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早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倡议召开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在开幕式上，更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还提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③ 而在1979年之初，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④ 后来江泽民在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⑤ 而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也说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⑥ 所以，如何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是我们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而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综合地利用市场和计划这两种手段，促进这种现代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产力。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8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6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55页。

⑥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10页。

(5)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历史之问”所做的科学回答,一举突破了某些人用生产关系发展的顺序,作为判断社会历史是前进还是后退的所谓的“生产关系标准”。而事实是,在当今社会,人们更公认的是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是发达还是落后,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作为判断其发展阶段的标准。

这样一来,是否妨碍人们走向共同富裕?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认为,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分配形式。而世界各国的事实表明,分配水平的高低大小及其差别,首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谓库兹涅茨夫曲线,就鲜明地刻画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一基本特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对分配没有影响或毫无作为。到了《21世纪资本论》里,皮凯蒂就以丰富的数据,表明在某些国家库兹涅茨夫曲线的延伸,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皮凯蒂也给出中国等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即使其中的某些国家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国家中的贫富差别,甚至较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拉大!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分配问题将主要取决于发展生产力和所有制,亦即不是单一地取决于阶级斗争!而如果把“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制”之间的斗争,仅仅看成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争夺,这就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化了。

(6) 至于判断某个国家或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更赞成列宁说过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经典论述。也赞成王震将军在仔细参观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所做的一番谈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①

所以,判断当今中国社会是姓“资”还是姓“社”,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② 所以,我坚决拥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③ 当然,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无疑问,仍伴随着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争夺和冲突,而某些冲突甚至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某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和“左”倾教条主义学者的错

① 科斯:《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第2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5页。

误，就在于或者否认有或者夸大了这种争夺和冲突。而重要的是，要将这种争夺和冲突服从于促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是“社会和谐”，是“合作、互利和共赢”。

把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想得太简单了，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①

所以，是否真的认同，即不是口头认同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分界线。

(7) 所以，在中国的发展路线的探索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就不仅要吸收“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且还要学习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理念、概念，包括它们用以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走向这一“新”的探索之“路”。只有走出一条“新路”，才能真正回答并解决面临的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问题。

而所谓“新路”，就是邓小平所反复指出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② 但邓小平又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 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④

而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正面临新路、老路、邪路三种发展路线的不同理念之争。这是我们推进如何深入改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需要深入反思的大前提！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494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2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 [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
- [5] 吴江：《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6]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学术界》2013 第7 期。
- [8]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
- [10] 科斯：《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及其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

任保平*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形成了分工理论体系。从社会劳动的性质入手研究分工的内涵，系统地考察分工社会组织各个层次的作用，把分工作为商品交换以及市场产生的条件，对分工与制度关系进行了研究。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通过改善社会生产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供给侧的改革实质是改善和调节分工，形成新的分工体系，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供给侧的改革不仅为了改善社会分工，而且还强调企业内部分工的改善，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进行改革，使国内的生产分工与国际分工相协调。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供给侧的改革要以改善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使旧的分工体系向新的分工体系转变，形成新主体、培育新动力、发展新产业为出发点。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培育新的发展动力。要把消解产能过剩、形成新的分工体系和发展新型产业作为发力点。同时必须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相适应的措施，以保障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分工 企业内部分工 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往的分工理论进行了扬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研究分工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调整分工，形成新的分工体系。本文在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分工理论对供给侧改革进行理论解释。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系统概括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将其看作“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① 马克思早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就对

* 项目来源：“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 HSSTP201401）。

作者简介：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4页。

英国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第一次从哲学上做了分析和批判,对分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同时还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资本论》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以及在人类劳动发展过程中分工导致的资本、产品与劳动相分裂的现象。总体来看,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研究了两个方面的分工问题: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此后列宁又在其《论市场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论著中,研究了企业内部分工对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意义、生产分工对生产社会化的作用,以及分工对所有制形式的制约性。斯大林又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分工、工农分工、脑体分工的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分工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分工,而对生产分工主要研究了两种类型:一是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把企业内部分工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加以研究,着重阐明了企业内部的分工提高了制造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又加强了资本主义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统治。二是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将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经济的一个前提条件加以研究,认为分工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着重研究了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社会分工论,指出社会分工不同于企业内部分工,但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他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买卖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累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

马克思在对分工的实质及其与社会分工的区别的大量分析中,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分工的制度内涵。首先,分工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而且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制度。其次,分工不是没有历史背景的生产要素组织,而是以特定的经济制度,尤其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前提的,是所有制在具体生产组织上的反映。最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有统一的一面,但也有冲突的一面,即企业内部分工的有组织有比例性与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的无组织无规则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正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根本矛盾在分工制度上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

1. 解释了分工的内在本质

认为分工是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决定的,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分工从

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它是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形成、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种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集中等客观因素作用下而自然形成的。依据这一思想，马克思把分工的过程概括为：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2. 研究了分工作用的二重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分工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认为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对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制约性。在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强调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和对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重大意义。认为分工能形成种属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在分工对社会关系的制约方面，马克思具体地考察了分工对社会组织各个层次的作用，并科学地阐明了分工对社会组织各个层次的作用，阐明了分工对人的发展、商品经济、阶级关系的制约性。

3. 研究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认为商品交换随着生产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发展的。^① 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② 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使商品交换的形式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商品的多种使用价值表现为一种劳动分工。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③

4.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了分工问题

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它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分工是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既表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表现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体现了分工在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中的统一。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一种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的一种在技术形式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14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5页。

的分配。这种划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时又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它对于创造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人力的巧妙运用,^①是“扩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形成和制约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分工所具有的生产关系属性,意味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匹配,即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②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③

5. 研究了劳动的地域分工

在劳动分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劳动的地域分工,他从自然因素的差别上揭示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关于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④从经济层面考察,所谓城市就是工商业经济中心,农村就是农业产业所在地。最基本的地域分工就是划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区域。这种划分贯穿于全部经济史。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经济内容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现代工商业所在地。相当多的现代工商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了城市。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地域分工实质是产业的地域分布。马克思说,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⑤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分工理论作为研究范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经济思想史上的其他分工理论相比较,其理论特征体现在:

1.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工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形成了分工理论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把社会分工看作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7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0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2页。

设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①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了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了分工的本质,揭示了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了分工的历史作用,而且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2. 从社会劳动的性质入手研究分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劳动的性质入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②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定性分析的角度,分工属于劳动过程,它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既分析了劳动的市场分工,又分析了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了可能性。在本质上分析了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了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3. 研究了分工社会组织各个层次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不是单纯地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具体系统地考察分工社会组织各个层次的作用。既考察了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了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③

4. 从商品经济的基础研究社会分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列宁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④认为商品交换是随着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随着分工

① 刘佑成:《社会分工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11页。

④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4页。

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马克思指出,分工越是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交换手段。^①另一方面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是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②

5. 研究了分工与制度的关系

分工既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本身也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某一制度的收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劳动中,生产的社会性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而是表现为不同劳动相互交换形式下的物的依赖关系。归个人所有的劳动通过它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使用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形成了一定的所有制。在分工与阶级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③认为分工与阶级关系是内在联系的。由于劳动关系制约着财产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所以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④在分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形式,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独立发展的基础,造成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

三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的改革,学术界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萨伊定律,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同于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供给管理是针对供给问题而进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其重点在于政策工具方面。而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国新常态下的供给结构问题,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和生产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包括经济主体、生产要素及其结构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等方面,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不仅对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重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1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13页。

④ 刘佑成:《社会分工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191页。

地位，但是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新常态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既要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又要发展生产力，调节社会生产。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可以对供给侧的改革形成合理而有效的解释。

（一）供给侧的改革实质是改善和调节社会分工

供给侧是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起作用的生产方的因素或者力量，生产方的这些力量是长期因素，主要着眼于长期增长因素来改善生产能力，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通过改善社会生产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供给侧的改革实质是改善和调节分工，促进旧的分工体系向新分工体系的转化，进而改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原因如下。

1. 供给侧的改革首先是为了改善社会分工

供给侧改革是针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而提出的。在新常态背景下，产品市场供给结构失衡使得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剧了能源的浪费。要素供给结构的失衡导致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关键作用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投入存在着结构性偏差，造成了这些关键资源的错配，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投入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创新驱动无法实现。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化解结构性矛盾，而结构矛盾实质是社会分工体系的僵化。由于社会分工体系的僵化，旧的分工体系不能打破，而新的分工体系不能形成，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能形成种属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新常态背景下由于社会分工体系的僵化，马克思所指出的种属力量、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都无法实现，形成了产能过剩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供给侧的改革首先要改善社会分工，依据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新的社会分工体系，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产能的成长。

2. 供给侧的改革还强调企业内部分工的改善

供给侧改革需要组织能力的优化来作为保障。要清理僵尸企业，减轻企业压力，促进企业活力的恢复，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这实质是强调企业内部分工的改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社会成员与此对应地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分工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而且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制度。企业内部的分工对建立科学劳动组织有重要意义。因此，供给侧的改革需要强调企业内部分工的改善，发挥企业和创业者的作用，清理无效供

给、提高供给质量、挖掘潜在供给和创造新的供给。

3. 供给侧的改革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进行改革

既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调节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了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它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全球将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信息技术仍是引领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技术力量,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信息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催生出一批新兴业态。供给侧的改革必须把握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既要实现创新驱动,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又要改善生产关系,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企国资改革、价格体制机制改革,为企业、人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放松“供给约束”,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4. 供给侧改革要使国内的生产分工与国际分工相协调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依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保持了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处于从属地位,造成了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不协调。供给侧改革要改善国内的生产结构,提高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提高产业、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视角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1. 分工理论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出发点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表现形式,尤其受财政分权的影响,各级政府为了追求产出的扩大,不断刺激投资需求,试图在短期通过资本供给的扩张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这种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中国劳动力丰裕的实际,对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忽略了对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导致了技术进步增长缓慢。使社会分工体系和企业内部分工体系僵化,形成了供给结构失衡,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造成了这些行业产能相对过剩。因此供给侧的改革要以改善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体系,形成新主体、培育新动力、发展新产业为出发点,促进结构升级。发挥企业和创业者的作用,清理无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挖掘潜在供给和创造新的供给,优化供给侧的结构,调动供给方的积极性。

2. 分工理论视角的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着眼于长期增长因素来改善生产能力,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通过改善社会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培育新的发展动力,着眼于新领域、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

形成新的分工体系。以新技术、新机制、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形态出现来培育新动力。而这些新动力的形成需要通过分工的深化来实现,使得经济发展的要素从低端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转向高端要素(人力资本、技术、制度、信息等),从而形成新的生产结构和新的动力结构。通过分工的深化使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动力体系。

3. 分工理论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力点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把消解产能过剩、形成新的分工体系和发展新型产业作为发力点。

(1) 形成新的分工体系。形成新的分工体系是把供给侧的存量与增长联系起来的改革。形成新的分工体系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发力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依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保持了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建立了适应当时生产力特征的分工体系。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主要处于低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产业链条中处于从属地位,旧的分工体系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旧的分工体系不仅造成了资源的误配置,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难。因此供给侧的改革需要实现从旧的分工体系向新型分工体系的转变,在打破旧的分工体系和形成新的分工体系上发力,减少经济下行的动力,提高经济上行的动力。

(2) 化解过剩产能。化解产能过剩是对存量的改革,过去中国经济改革是存量不动,进行增量改革,但是存量矛盾积累已经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发展。供给侧改革中化解产能过剩是对供给侧的存量改革,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减法。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发力点之一。产能过剩是新常态下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产能过剩已经从低端的、局部性过剩蔓延至高端的、全局性过剩。当前我国的产能过程表现为产品价格相对下滑、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滑、行业供给超过了行业需求。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使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金融和财政的风险加大。化解产能过剩,根本的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要交给市场和企业。依靠现有机制难以根治,只有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适度淡化GDP指标在地方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中的权重,才能根本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供给侧首先要发力于化解产能过剩,清理无效供给。

(3) 发展新型产业。发展新产业是供给侧的增量改革,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加法。供给侧结构改革也要在新产业的发展上发力,形成新的社会分工,发展新型产业才能

形成结构性变化,从而导致结构性增长,从而形成新动力。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投资、项目实现的是规模性增长,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也会形成产能过剩。全球将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信息技术仍是引领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技术力量,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信息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催生出一批新兴业态。新能源、绿色和低碳技术的发展势头迅猛。关系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的生命科技及生物技术成为关注热点。我们必须把握世界产业分工的趋势,发展新的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我们在供给侧改革中形成新产业要防止“去工业化”和“金融化”,以工业化的逻辑来发展新产业,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实施再工业化,推进新分工体系的形成,推进供给侧的改革。

4. 分工理论视角的供给侧改革的保障措施

旧的分工体系的打破和新的分工体系的形成是长期的,因而供给侧的改革也是长期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为了保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效果,必须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相适应的措施,以保障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实施。

(1) 完善制度保障。旧的分工体系的打破和新分工体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需要实现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为了让“供给侧结构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从GDP指标转向政府治理水平,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以改善供给、降低成本,通过竞争全面提升效率。要改变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通过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进一步加快政府简政放权,联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价格体制机制改革,为企业、人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2) 优化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结构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内部分工,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企业压力,促进企业活力的恢复。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3) 调整产业政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为了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产能的进入,从而形成新的分工体系。目前产能过剩的产业都是各级政府关爱的产业或者是鼓励性的产业,鼓励性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投资的潮涌现象,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供给侧的改革需要建立普惠性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

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以市场机制为核心机制进行供给侧改革，政府主要致力于环境创造，解决供给侧改革中的人员安置等社会问题。

(4) 转变政策措施。供给政策更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财政、金融、税收都要服务于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新产业的不断成长，从而加快结构改革的步伐。但是供给侧改革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因而供给侧改革中不能放弃需求侧的扩大内需，需要把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与需求管理相结合，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结构转化，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保增长和保就业，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结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
- [3]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 [7] 刘佑成：《社会分工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什么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林光彬**

摘要：从经济学研究服务的主体对象看，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国家理财学，要服务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本文提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在确保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使国家效能和国家尊严得以最大程度提高的科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要基于人类 5000 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养分，站在世界人口大国的广阔经济实践舞台上，根据中国历史演进中“以民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要从中国的经济规律、经济制度或工程、经济管理这三个层次，总结提炼我国古今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阐释解决经济利益冲突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国家理财学 根本立场 理论构建

2015 年下半年以来，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一个焦点问题、一个时代课题，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核心是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讲中国故事和走中国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國价值。就此，我谈两点认识。

一 什么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说史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另一个是后人整理、研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说史，是描述性的，不一定真实。就目前来看，经济学界完全被西方中心论所支配，明显忽视中国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政治经济学。

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完全以西方为中心，几乎失去了自我。在国内，一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言必称“英法”，完全被西方中心论所支配。清末

* 本研究受到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资助，特此致谢。本文的部分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的“第二届中青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上进行了交流，感谢孟捷教授、周文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

** 林光彬，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研究员。

民国时期，都是引进西方的理论，“以洋为尊”“唯洋是从”，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偶有反思，如梁启超、唐庆增等，^①发出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声音，也淹没在一片崇洋媚外的浪潮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以苏联为师，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又几乎等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苏联改造后的政治经济学虽有毛泽东、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对中国的经济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探索和总结，但一直没有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仅停留在实际运行层面、政府层面。改革开放后，我们仍以引进为主，至于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有意无意地冷处理，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市场。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以为，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存在误解。在以洋为师的学生心态下，认为洋人老师讲得都对。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规律认识，被赋予“真理”高度，并且认为洋人的书里理论已经讲完了、讲清楚了，我们只需用来解决中国问题就好了。二是将经济理论的一般和特殊混同。把一定历史、地域和国别条件下的特殊经济理论都划归为一般的、普适的理论，甚至绝对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关系的言说。三是与近代以来对政治经济学界定有“窄化”的学术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先是窄化为欧洲（尤其英法）才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又进一步窄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再进一步窄化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文献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没有说的、没有做的，我们似乎就不能做、不能创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条，把政治经济学说变成僵化的、刻板的静态理论。上述这样的认识，使得我们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产生了误解。好像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独有，近代才开始，只有二百年而已。完全被西方中心论所支配。国内的一般教科书都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依据，即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马克思的认识有逻辑上的缺陷。因为作为一门历史科学，一种研究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学科，怎么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开始呢？这明显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这个当然不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分析所形成的理论价值。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认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政

① 梁启超：《中国生计学史》，生计学即经济学，认为我国先秦以前，原有此学，1902。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1936，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他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上卷，第362页）。日本经济史学家泷本诚一（1931）的《欧洲经济学史》，其副标题便是“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中国的学说”。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页。

治经济学。这明显带有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色彩。那资本主义以前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规律研究又叫什么呢？

目前，学术界的这些“主流”认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有一种文化上的、学术上的自卑感，产生一种无比郁闷的错觉，仿佛我们的古人和今人都不会研究、思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交往的规律，只能跟在西方人的话题后面“吃剩饭”“炒冷饭”。这种认识和学风，导致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学术自卑和创新窒息。而实际上，经典作家不可能把真理讲完！没有发生的经济现象他们也不可能讲出来、写出来、预测出来。资本主义以前发生的，他们没有研究，不知道的，也不可能写出来。他们只能写他们那个时代自己知道的有限知识、有限信息和有限实践下的理论思考。

回归常识和突破。其实，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对经济现象的学术归纳和抽象，一种国家产生后一定时代经济特征的语言概括，人类管理自己经济关系的智慧言说，古今中外本都存在，也无高低贵贱之分。所谓一种理论本身不过是一种思想认识的逻辑展开，是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形成的语言逻辑体系。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演进，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一种平等交流、相互理解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和学术环境。

如果我们认同国家是经济学研究和服务的整体对象与目标，政府、企业、家庭、个人是经济学研究和服务的个体对象与目标。那么，作为“国家的理财学”的政治经济学，无疑一直贯穿于古今中外。

人类关于物质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至少有 3000 年以上的历史。每个人类发展阶段都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是具体研究的主题和内容的粗细、深浅有所不同而已。

按照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的标准，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分为家族自治国家、家族行政国家、民族行政国家和民族民主国家四个阶段；按照技术与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的标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狩猎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工业阶段三个阶段。结合上述两个标准，从全球来看，公元前 8 世纪～公元前 3 世纪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1～13 世纪我两宋时代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17～19 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革命和工业革命形成第三次高潮，20 世纪以来的民主化、法治化、工业生产智能化形成第四次高潮。这四次高潮形成的理论成果都是我们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知识养分，我们要看到这个历史演进和历史方位。

因此，双向认识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往史和经济学理论的交往史，就显得尤其重要。从 5000 年古今中西的文明交往，以及人类经济行为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

角度，来重构与自身传统和世界的联系，来重新理解自身与世界经济学的学术演进。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经济学中建立理论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丰富世界经济学大厦贡献中国人的原创思想。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发展，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这既是一个常识的回归，也预示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将做出新贡献。

从经济学研究服务的主体对象看，现代经济学可以大致划分为家庭理财学、企业理财学、政府理财学和国家理财学。从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实践看，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个人、家庭和企业的理财学；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政府理财学；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理财学，要超越个别的经济主体，服务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如果我们要为政治经济学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研究国家在确保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使国家效能和国家尊严得以最大程度提高的科学”，^①即国家理财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体现共同需要、公共价值、社会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四个经济主体的平衡。那么，我们就可以连贯地研究人类古今中外经济分利关系的实践和理论的历史演进，考察中国人关于人们物质利益关系规律认识的思考和贡献，构建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二 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渐进形成的，是先有人类的社会实践，后来才有学者们对实践规律的总结、归纳，以及基于实践因果逻辑的主观演绎。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相适应。作为一门实践学科，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必然同那个时代的信仰、人们所关心的经济问题相联系，也必然呈现为与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状况共生同构的结果。一句话，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应时而做，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认识。

如果我们仍“以洋为尊”“以洋为导”“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吃别人吃过的剩饭，被别人提出的命题所导引，怎么能超越呢！甚至，一些极端的做法，如把论文在国外发表和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能有什么前途！漠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两张皮现象——说一套、做一套，怎么让青年学子和人民信服！因此，思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要基于人类5000年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养分，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

^① 国家效能是指以服务于一国全体公民的政府、企业和市场的运转效率和能力；国家尊严是指一国对内和对外的尊严，对内尊严包括体现共同需要、公共价值、公平与正义、经济主体的平等与法治秩序，对外尊严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国家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有尊严的经济交往地位。

袤国土和13多亿人口大国的广阔经济实践舞台上,根据中国历史演进中“以民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构建以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和公共价值视野下的国家理论。因为,有什么样的国家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理财学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经济规律的研究,二是经济制度或工程的设计研究,三是经济管理的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上,总结提炼我国古今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阐释解决经济利益冲突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以我为主就是以我们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观察、论证、归纳、抽象经济现象,发现经济规律,说中国话,讲中国故事,阐释中国人关于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经济发展和经济交往关系的智慧和规律性认识。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对待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积淀,都要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观点上要辩证取舍,看哪些仍然适用,哪些已经演进变化,需要改进更新。比如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就,在国家层面,主张“社会和谐、以民为本、民富国强”为理想国家秩序;在政府层面,以政府财政收支为主线,强调收支均衡;在家庭层面,以人民丰衣足食为基准,提出小康和大同的理想社会秩序;在社会分工层面,以农虞工商为中心,秉持“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经济分工秩序;在市场层面,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理想市场秩序。这些今天仍有建设性的意义,需要继承和发展。

推陈出新,就是要清楚地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原理、命题、方法、分析模型等,哪些是中国先有,外国后有;哪些是中国有,外国没有;哪些是中国没有,外国有;哪些是外国先有,中国后有;哪些是古人概括抽象出来的,哪些新的现象和实践需要我们今人概括抽象,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从发展的差异性和历史演进的不同同步性的视角看待政治经济学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全人类演进的视域,说我们研究的是全球视野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一定时间、特定地域的政治经济学;才能较为准确地说,哪些是我们当代人推陈出新的成果。

政治经济学要在时代发展中起到理论和思想的引领作用,关键是提高其理论的洞察力与预测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才会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就此,我以为,至少要夯实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夯实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提高其对社会经济的解释力。二是要夯实政治经济学的前瞻性、战略性、政治性、实

践性研究，提高其引领性和应用性。比如：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的国家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发展，提高社会认同度；通过深入研究全球视野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发展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的规律，为政治考量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深入研究经济发展速度与结构性变化的可能冲击，提高对经济预判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建设性政策建议；通过对基于中国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发展深入研究，提高在中国发展推进中的话语引导力。

总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时空条件的政治经济学样态，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人类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谱系。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学说没有绝对真理、静止真理，只有不断变动的实践及其持续演进的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人民的中心地位来研究，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研究，不能脱离一定时空条件来研究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不能抛开服务国家效能和国家尊严来研究，要经世济民、经国济世，始终关系关心国计民生，围绕国计民生开展研究。

本期特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

——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再解释*

孟捷**

摘要：自第二国际以来，所谓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一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解释。这一解释的根本缺陷，在于假定生产关系只具有一种功能，即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生产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生产关系的这两重功能既可能相互结合，也可能相互背离。在实际历史过程中，除了生产力系统的自主变化外，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的竞争是推动生产方式演变的两大直接动因。一种生产方式的演变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即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必要条件的整体变迁——取决于流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方向。如果一国的特定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联盟，面对来自阶级冲突和国家间竞争的压力，有能力利用国家权力推动一场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将流行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切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从而使剩余的增长更多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促成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既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其自身之形成也构成了这一制度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国家理论相应地成为一切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笔者希望，本文提出的这一再解释能给历史唯物主义带来足够的弹性和活力，使之不仅摆脱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束缚，而且能为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指引。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国家 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

第一章 生产方式的结构与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普列汉诺夫在

* 本文是孟捷教授出版的新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的前三章。由于这三章在内容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且从未完整地公开发表过，本刊特意将其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以“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再解释”为题发表。

** 孟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提出,用财产关系或生产关系解释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起源,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如基佐和梯也尔,已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的独到贡献在于,将财产关系或生产关系进一步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将生产力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将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唯物主义地置于一个统一的基础上,即形成了所谓“一元论历史观”。^①自第二国际成立以来,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其运用中还有如下特点:它将生产力在塑造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时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被看作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这种意义上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被进一步法典化,最终成为所有教科书一致采用的标准理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外部或内部的批评者看来,这种片面的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其实难以解释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情况。^②自恩格斯以来,尽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申辩,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但这些申辩似乎并不足以让批评者们信服。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力图通过其多元决定的观点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决定论,但最终又与韦伯式的强调各种社会权力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观点做了妥协。

本书的前三章试图在回顾既往理论的基础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为此我们特别倚重于卢卡奇晚年的本体论著作,其中的核心思想,即社会存在的最终不可分割的要素是人的目的论活动,为我们重释生产方式及其结构奠定了基础。我们将生产方式定义为以榨取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并在此前提下,批评了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这是对第二国际以来一直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最为晚近且颇有影响的解释。科恩(或者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关键失误,在于忽略了生产关系(或所有关系)不只具有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种功能,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上海三联书店,1961,第2章;也可参见王荫庭编《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②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根据经济决定论,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是脱离上层建筑而自主地变化的,这一变化可以解释上层建筑随之发生的改变。而生产力决定论则解释了生产关系的这种相对于上层建筑的自主变化植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力决定论不成立,则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就需另作解释,这意味着,上层建筑的改变将有可能成为生产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这样一来,经济决定论就随之失效了。因此,在逻辑上,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共同构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解释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部分。

生产关系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即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生产关系的这两重功能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这一点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总是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某种来自生产力以外的因素,也会造成生产关系的改变。然而,不管最初造成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当一个生产方式趋向于将剩余的榨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促成该生产方式在整体上不可逆转的变革,即本文所说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包含着新的历史过程因果性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笔者希望,上述极为扼要地加以解释的这些观点,在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容的同时,也为兼容历史唯物主义批评者的意见预留了空间。

本章在结构上安排如下,第一节由文本分析出发,简略地讨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透过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本人和通常所说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其实保有某种距离。第二节至第四节对生产方式做了一个较为精细的结构分析,在张闻天的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我们区分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并以卢卡奇晚年的本体论思想为借镜,从目的论活动的角度解释了生产方式概念。第五节简略地讨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两种可能的因果关系。从内容及其与后两章的关系来看,这一章可以看作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预备性讨论。

第一节 楔子: 所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

1980年,马家驹、蔺子荣发表了《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他们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上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即两者之间的中介。^①在发表于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吴易风进一步重申了这种观点,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所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而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直接相互作用的原理。^②为了证实这种观点,吴易风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考证,根据他的梳理,从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开始,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等一系列论著

① 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

②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该文收录于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中，马克思多次强调了这一原理。譬如，在致安年柯夫的信里，马克思这样写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①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②

出版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一般被看作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结论的经典表述。也唯独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没有提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而只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直接相互作用。不过，吴易风指出，一般研究者所忽略的是，在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第一卷）和1872年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里，马克思对这篇序言做了征引，但在征引的同时，马克思也对序言里的表述做了重大修改，即把“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分别修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③通过上述细致的文本分析，吴易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表述事实上是一个孤证，在绝大多数的其他场合，马克思的表述都具有如下特点：“不是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④

吴易风和马家驹等人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他们的观点中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99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9页；《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61页。

④ 引自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53页。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吴易风还进一步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第一，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第二，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这些观点同时意味着对两个阵营的批判，一方面，吴易风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有违马克思的定义，把研究对象仅仅规定为生产关系，这就把生产方式排除在外，同时也排除了生产关系范畴所包容不了的资源配置问题；另一方面，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他提出应该研究具体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的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而非局限于研究资源配置一般。

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第一，他们把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是教科书里通常采用的关于生产方式的定义，因斯大林的倡导而流行）对立了起来。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相互沟通的；第二，他们依然按照决定论的方式解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三者的联系，例如，用吴易风的话来说：“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①显然，这种诠释并没有克服主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统理论所固有的弊端。

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我们摆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契机。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的观点，可以用来发展一种不同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解释。譬如，生产方式作为劳动和分工的特定组织方式，自然要以某种生产力水平为前提，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未必是决定论的关系，因为劳动和分工的组织也受到生产关系以及其他制度因素的制约，在生产力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完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以不同于吴易风等人的方式重新诠释生产方式作为中介的含义，并将它与斯大林倡导的“统一”说（即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相结合。依照我们的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通过将这二者统摄在内的生产方式这一整体而互相联系的，我们将生产方式界定为以占有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生产力的一切变化都必须有利于扩大这一剩余，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要服务于对剩余的更大规模的占有，在此意义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是以实现生产方式的这一目的为中介的。

第二节 巴里巴尔对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

法国哲学家巴里巴尔在他与阿尔都塞合著的《读〈资本论〉》一书里对生产方式提出了一种结构分析。依照他的观点，生产方式是由三种因素和两重关系构成的，这三种因素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和非劳动者；两重关系是：所有权关系、现实的或物质的占有关系。巴里巴尔将所有这些构成因素和关系称作“一切生产方式的……各个不变要素”。^②

^① 引自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54页。

^② 巴里巴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载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61页。

巴里巴尔详细讨论了第二种关系,即他的所谓现实或物质的占有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曾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过“占有”一词,有时用它指所有权关系,有时又用它指占有关系。例如,根据他的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有以下两种表述:

“当他(指劳动者——引者注)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

“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①

巴里巴尔认为,在这两处,占有一词所表达的分属不同含义,第二句话里的占有表达的是所有权关系(即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第一句里的占有则不表现所有权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它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的分析”,而劳动过程在马克思那里指的是人对自然的占有,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让资本家作为占有者出现,只有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巴里巴尔进而讨论了生产力和构成生产方式的所有组分(即三种因素和两重关系)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生产力并不是对生产方式的所有构成因素的罗列,只有在第二种关系中,即在人对自然的占有中,生产力才能体现出来。他还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单纯依靠劳动者并不能推动生产资料,非劳动者或资本家的监督和指挥是使劳动者推动社会生产资料,使个别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并使劳动过程具有合目的性的必要条件。

在巴里巴尔看来,生产方式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各个因素不是一次性地被联系在一起,而是“被两种不同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这些要素的结合“不是一切生产的各个‘因素’之间的简单关系,而是这两种关系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三种因素(劳动者、生产资料和非劳动者)一方面通过所有权关系相互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通过巴里巴尔界定的第二种占有关系联系起来。在巴里巴尔看来,后一种联系对于理解什么是生产力是关键的,因为生产力不是孤立的要素,而是占有自然的整体方式,他甚至认为:生产力不是要素,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②

巴里巴尔关于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的主张,在内容上虽有其合理性,但在表述上毕竟显得突兀。英国学者里格比在评论这一观点时,就对他提出了批评。参照里格比的评论,被巴里巴尔视作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其实是劳动关系,也就是在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和分工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应该和作为剩余劳动占有关系的生产关系(或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可称为所有制关系或所有关系)区分开来。^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55、557页。

② 巴里巴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载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61、289页。

③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9页。里格比的这部著作较全面地介绍和评析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把劳动关系和生产的社會关系或所有关系相区分，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步骤，后文还将继续讨论这一区分在理论上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关系的重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曾引发了一场争论，里格比在概括这场争论时提出，围绕劳动关系的定义，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将劳动关系视为生产的社會关系，其二是将劳动关系看作有别于生产力和生产的社會关系的独立概念，其三是将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力（这是巴里巴尔的观点）。里格比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生产的劳动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生产的社會关系，后者涉及的是对剩余劳动的占有问题。劳动关系是劳动组织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不应该将劳动关系包括在社会生产力范畴之内，像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要素一样。”^① 笔者认为，在定义劳动关系时，其实可以在里格比提到的这几种观点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劳动关系自然具有属于生产力的维度，但劳动关系也镌刻着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将其完全归结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都是不妥当的。劳动关系在概念上的这种特点意味着它是一种中介，但承认这种中介地位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其作为概念的独立性。接下来我们在介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理论家张闻天的观点时，还将涉及这里的问题。

第三节 张闻天论生产关系的两重性

1963年，张闻天撰写了《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1979年，该文正式刊发于《经济研究》杂志。^② 在这篇文章里，张闻天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新阐释。张闻天的理论工作，不仅代表了中国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真正改进，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新颖而深刻的。从写作时间来看，张闻天的这篇著作要远早于科恩、巴里巴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他在近乎封闭的研究环境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见。

张闻天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里的一段论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③ 在他看来，

①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31页。

② 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③ 张闻天征引的这段话如下：“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有趣的是，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定义的生产关系，其实只是劳动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提出有别于劳动关系的所有关系或生产的社會关系的定义。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486~487页。

参照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如下解释。

第一，生产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或用他的话来说，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在文中，张闻天曾建议将这种生产关系称作“生产关系一般”，在个别地方，他还曾以“直接生产关系”代指这种生产关系。张闻天认为，在马克思的笔下频繁出现的生产方式概念，指的也就是“生产关系一般”。在他看来，上述生产关系一般并不能独立存在，而需要和一定社会形态里特殊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关系相结合，“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所有关系。任何生产关系一般，都必须在所有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而所有关系是形式。”他还指出，所有关系事实上是“包摄所有这些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的形式”，是作为总体的生产关系，而不只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

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上述两种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内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关系对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是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所有关系又阻碍这种发展。”“显然，这里被消灭的是生产关系的特殊，即所有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一般；那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般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还要继续保存和发展下去，不过要在另一种所有关系……中表现出来而已”。

第三，上述两重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进一步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事直接生产的阶级，在生产关系内总是代表生产力的；而剥削阶级，在生产关系内总是代表所有关系。

第四，不能把生产力等同于技术；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看作人和生产技术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不能把生产力最后决定生产关系，看作生产技术最后决定生产关系。张闻天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毫不吝惜笔墨，他指出，技术本身并不等同于生产力，因为技术只有同人的劳动相结合，为人们所掌握、所推动，才能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的物的因素。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劳动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一定要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才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力。”“生产技术的作用，也只有在人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技术，不过是一堆无用的死东西。”这样一来，“生产技术的发展过程，完全要受到它所在社会的生产关系

的内在矛盾的制约，是很自然的了。”^①

张闻天主张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转化为两重生产关系的矛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界分，实质上暗示了后文还将详细讨论的问题：①生产关系实质上具有两重功能；②某种所有关系在特定时期的流行，并非必然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而可能只是服从于剩余榨取的需要。

张闻天就劳动关系、生产力和所有关系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大体属于前文介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类观点，即把劳动关系作为有别于生产力和所有关系的独立概念。这种观点的缺陷，是在强调劳动关系的独立性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劳动关系作为中介的地位。除此之外，张闻天的理论还有如下两点缺失。第一，他偏重强调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或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区别，相对忽略了所有关系对劳动关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布雷弗曼发展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详细考察了后面这种影响。^②考虑到这一点，像张闻天那样以生产关系一般来代指劳动关系，便是不适当的，因为在劳动关系中可能包含着反映特定所有关系即特定社会权力的内容。为此，就应该以直接生产关系（这也是张闻天使用过的概念）代替生产关系一般，作为劳动关系的同义词。第二，在张闻天那里，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仅限于劳动关系，他在此忽略了，某些所有关系也有表现生产力，或者更准确地来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功能。例如，《资本论》里谈到的对铁路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股份公司，作为一种特定的所有关系，就发挥了这种功能。^③

①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张闻天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展开了批判，其要旨是认为斯大林的定义使生产关系变得片面而狭窄。鉴于他的这一批判极为独到而深刻，值得引述如下：“（1）由于它（指斯大林的定义——引者按）排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而只研究所有关系，它就使所有关系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同时也就使生产关系失去了内在矛盾的动力。这样，生产关系就被人为地简单化和片面化了。（2）它把所有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因素，而不承认所有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包摄所有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所有关系。这样，它就缩小了所有关系，即全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3）它把阶级关系（或社会集团的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而不知所有关系即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即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它也就缩小了阶级关系的意义。（4）它把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分配关系同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并列起来。殊不知所有关系，阶级关系，不但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而且也在产品的分配中表现出来，不但在产品的分配中，而且也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如果没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不可能存在的。（5）它把阶级关系和人们在生产中‘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混淆在一起，并且把生产中人们‘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同产品的交换、即社会内劳动置换关系混淆在一起了。”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第42页。

②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88页。

基于上述讨论,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事实上都有两个功能,即一方面表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另一方面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为此,可以提出表1-1所概括的四种组合:①表现生产力的劳动关系;②表现生产力的所有关系;③服务于剩余占有的劳动关系;④服务于剩余占有的所有关系。在这四种组合中,只有①和④是张闻天认可的。

表1-1 两种生产关系及其双重功能:四种组合

	表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	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
劳动关系	①	③
所有关系	②	④

在转入下一节的讨论之前,还需就生产力、劳动关系、所有关系这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做一番说明。

(1) 生产力:从其构成来看,生产力涉及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甚至地理空间诸要素。^①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力是依循特定的劳动关系对这些要素进行开发、组合和利用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劳动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应,生产力还包含着各种可以直接运用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用于协调或组织劳动关系的“组织知识”。^②

(2) 劳动关系:是生产中的协作和分工关系,它不仅直接表现生产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③另一方面,劳动关系的形成也受着剩余占有关系,即所有关系的制约。因此,在劳动关系中,既有表现生产力、属于生产力的部分,也有表现所有关系、属于所有关系的部分。劳动关系在此意义上体现为一种概念的中介或过渡。

(3) 所有关系(或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与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占有直接相关的权力关系。依照科恩的定义,“生产关系是对人和生产力的有效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法

① 科恩在讨论生产力的要素时,将空间也列入其中。参见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69~70页。

② 哈贝马斯曾将“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相区分,并将两者列入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见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48页。

③ 经典作家认为劳动关系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例如:“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发展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3、38页。

律上的所有权关系。”^① 大致来说,所有关系涉及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对生产资料及其他资源的支配权力;②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权力;③决定产品分配的权力。这些权力关系也会对劳动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发挥直接的影响。

现实的生产,是生产力、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导向生产方式的概念。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在匈牙利思想巨匠卢卡奇的晚年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关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即把生产方式看作由两类目的论活动组成的有机整体。

第四节 作为目的论活动的生产方式: 以卢卡奇晚年本体论思想为借镜

20世纪70年代初,卢卡奇在去世以前,一直致力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的写作。在这部巨著中,卢卡奇提出了如下核心论点:社会存在的最终不可还原的要素,是人的目的设定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活动。他这样写道:“我们迄今的阐述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其基本的本体论结构而言,社会存在乃是某种统一的东西:社会存在的最终‘要素’是人的目的论设定”。^②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目的论活动,第一种类型是劳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卢卡奇提出:“劳动作为经济领域的最后的、无法再予分割的要素,乃是基于目的论设定……就这个基础的方面而言,经济领域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根本没有区别。……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存在的构造在本体论上是统一的。”^③ 谈到劳动与目的设定的关系,读者大概立即会记起马克思就蜜蜂的劳动和建筑师的劳动加以比较的那段名言,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

①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81页。对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关系而非权利关系的详细论述,见该书第8章。

②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11~412页。遗憾的是,该书在卢卡奇生前并未竣稿,因而具有未完成著作所有的一些缺点,如重复、冗余、叙述线索往往不够清晰等。自其问世以来,该书也一直为卢卡奇研究者所轻视。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撇开这本书表面的缺陷,细读下去,便会在其中发现大量思想的珍珠。卢卡奇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及其卷帙浩繁的手稿极为熟悉,并从中提炼、汲取了大量思想资源,以形成和丰富他的哲学思想,这一点是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不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许多观点往往可以直接在经济学分析中加以运用。

③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392页。

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①

卢卡奇对劳动中的目的论设定及其实现做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由观念产生的目的论设定,在本体论上先于其物质的实现。另一方面,劳动中的观念因素与其物质的实现,是只有在思维中才能相互隔离开来的活动。目的论设定,只有通过物质的实现过程,才能成为真正的目的论活动,否则只能是一种意愿。在劳动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设定目的,另一个环节则是确定手段。一个成功的劳动过程,必须扬弃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异质性,促成“设定的目的”和“设定的因果性”之间的“同质化”,也就是“造成某种自身同质的东西:劳动过程以及最终的劳动产物”。卢卡奇就此写道,“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朴素的事实,即设定的目的能否实现,这仅仅取决于在确定手段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自然的因果性转变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设定的因果性。目的的设定产生于社会的人的需要;然而为了使它成为一种真正的目的设定,对于手段的确定,即对于自然的认识,必须达到一定的与这些手段相适应的水平;如果这些手段尚未获得,那么目的的设定就仅仅是一项乌托邦工程,一种梦想。”^②

卢卡奇的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正如前文提到的,谈论生产力,绝非只是对生产力的要素加以罗列,从劳动过程的目的论设定的特点来看,生产力归根结底意味着促成“设定的因果性”,并使之达成“设定的目的”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体现在目的的设定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手段的确定上,而无论是在哪个环节,观念形式 and 知识都起着重要作用,都是生产力的重要的组成要素。^③

除了劳动之外,在经济领域中还存在第二种目的论设定。卢卡奇指出:“目的论设定的这种第二种形式在非常低级的社会阶段上就已经出现了,在这种设定中,主体所设定的目的直接就是让别人进行目的设定。”^④ 第二种目的论设定与第一种目的论设定是相联系的,或者说,是为了促成第一种目的论设定:“这种第二性的目的设定的对象不再是某种纯自然物,而是一群人的意识;这种目的设定的意图已不再是直接改变一个自然对象,而是促成人们做出一种当然是以自然对象为准的目的论设定;同样,实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直接影响自然对象,而是要在他人那里实现这样的影响。”^⑤

卢卡奇笔下的第二种目的论设定包括不同的类型,其中一个类型是社会化生产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1972,第202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强调了人的劳动和动物的劳动的区别。

②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16、19页。

③ 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戈德利耶强调了这一点,即思想、表象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见 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pp. 131 - 137。

④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51、364页。

⑤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51页。

需要的协调和控制活动。^①在经济生活中,一切包含协作和分工的社会化生产都要以这种类型的目的论设定为条件。中国古代思想家柳宗元在《梓人传》里就曾观察到,那位在生产中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的梓人,已经无须从事直接生产活动,而只需对他人发号施令,即进行指挥和协调。另一方面,第二种目的论设定与统治和隶属关系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卢卡奇指出,“这类目的论设定可以自发地或者以制度的形式为了对被统治者进行统治服务。”^②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种目的论设定就发展成为监督和控制活动,它不仅要改变他人的意识,而且要支配或占有他人的意志,唯此才能形成对他人的统治关系。^③在中国古代的《诗经》里,就有一首《七月》,记录了类似农奴的西周村社农民,每天在里宰的监督下,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

卢卡奇曾结合人类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谈到第二种目的论活动得以发展的动因,他将这一动因归于剩余的占有。人类社会一旦产生超过必要需要的剩余,就出现了谁占有剩余这一问题。只有某种被垄断的合法化的暴力才能确保并扩大对剩余的占有,在此意义上,对剩余的占有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的分野和国家的形成。卢卡奇甚至把剩余的占有对于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影响,与劳动范畴本身的出现对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影响相类比,他写道:“劳动中对某种新东西的生产本身,就使社会存在超越了自然界;这标志着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一种具有新品质的形式,这一事实本身就突出了劳动所具有的新的特殊性。如果劳动以及从劳动中产生的分工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从而再次创造出某种同样具有新的品质的现象,即人能够生产出比自身再生产所需要的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新产生的经济现象就必然在社会中造成全新的结构,即阶级结构以及从其中产生的一切。”^④以第一种目的论设定即劳动为前提的剩余的生产,推动了第二种目的论设定的发展,后者反过来影响和型塑了第一种目的论设定即直接劳动本身的发展。

卢卡奇的这些理论观点,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发展对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首先,两类目的论设定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界定了生产方式的概念。^⑤生产方式是由上述两类目的论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它自身也是一种目的论活动,笔者将其定义为以扩大统治阶级对剩余的占有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下属

① 在卢卡奇笔下,交换活动是第二种目的论活动的另一个类型。卢卡奇写道:“商品交换也是通过实际的目的论的活动把某种观念的东西变成实在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商品交换的充满活力的全过程和劳动的全过程是相同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365页。

②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163页。

③ 马克思:“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因此,没有意志的东西,例如动物,固然能服劳役,但这并不使所有者成为领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503页。

④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261~262页。另可参见该书第254~257页的讨论。

⑤ 生产方式或可区分为两个亚种,即微观意义的生产方式和宏观意义的生产方式,前者指的是在奴隶主庄园或资本家企业内进行的生产活动,后者则是指的整个社会生产。

的两类目的论活动在实际中难以分离，但在概念上可以分别加以考察。其中第一类目的论活动是以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为内容的直接劳动；第二类目的论活动则可被称为协调—控制活动，即对直接劳动者的指挥、役使和监督。从这个角度看，在分析上将生产方式还原为三种生产力要素和两重生产关系（如巴里巴尔）就是不适当的，这些要素和关系并不能脱离目的论活动而获得自主的存在。生产力的个别要素（如机器或劳动对象）一旦脱离目的论活动的整体来考察，事实上就不再属于社会存在，而倒退为无机或有机物。正像卢卡奇在批判了布哈林时所说的，“只有基本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整体才能被当作经济领域的范畴加以考察；而布哈林就曾经宣扬过的、如今仍然很流行的观点，即似乎可以把技术视为经济的基本‘要素’，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① 根据这个观点，对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分析，应该以下探到两种目的论活动的水平为限，而不能还原到个别要素。图1-1表达了生产方式的结构及其下属的两种目的论活动的关系，由于两种目的论活动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图中的两个系统互有交叉，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恰好处在这个交叉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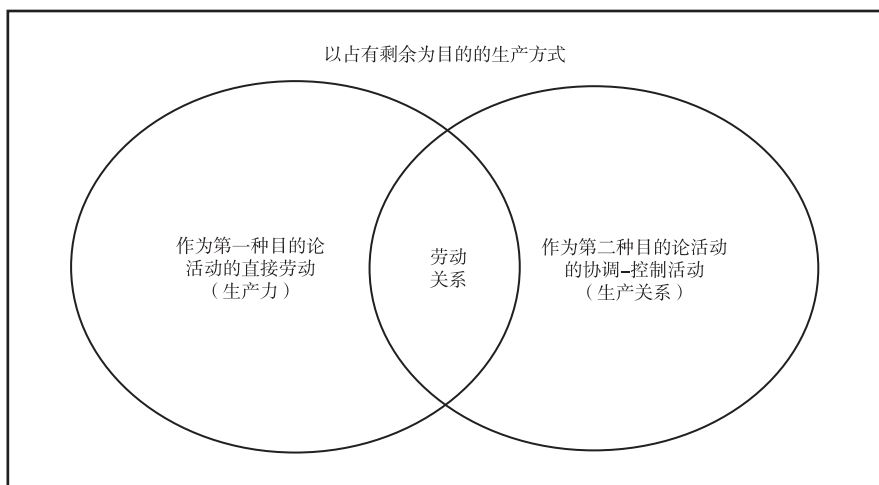


图1-1 生产方式及其下属的两种目的论活动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概念。笔者认为，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可以把马克思笔下这些不同含义统一起来。生产方式的第一种用法是指生产的物质方式，用科恩的话来说，“这是指人们运用他们的生产力劳动的方式，他们安排的各种物质过程，他们的专业化的形式和分工。”生产方式的第二种用法是指生产的社会方式，科恩认为，这一含义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即生产的目的、

^①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368页。

剩余劳动的形式以及剥削方式。生产方式的第三种用法则是前两种用法的结合，即将生产方式看作生产的物质方式和社会方式的统一。^① 从前述目的论活动的角度看，生产方式的这三个用法是相互补充的，其中第一种用法和第二种用法分别对应的是第一和第二种目的论活动，第三种用法则可以视为由两种目的论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即生产方式本身。

卢卡奇对两种目的论设定的论述，还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实际上是促成两种目的论活动的制度条件，其中劳动关系横跨了两种目的论活动，即在直接劳动和协调—控制活动中都发挥作用，而所有关系则大体对应于第二种目的论活动，并作为一种权力关系促成和调节这种活动。卢卡奇指出：“这些设定（指第二种目的论设定——引者注）同劳动本身的一个很重大的差别只是在于，它们所引起并予以实现的目的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某一具体情况，而是旨在影响他人，使之完成设定者所希望的劳动活动。……在这方面，各种目的和手段是很不相同的（从奴隶制到农奴制时直接使用暴力手段到今天使用控制手段）”。^② 卢卡奇在此谈到的暴力和控制手段，对应于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后者作为一种权力关系，不仅包含了暴力或强制，而且是与所谓共识（consent）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使得生产关系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某种合约关系。在本书第三章，我们还将结合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戈德利耶的观点正式讨论这一问题，并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加以比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十分重要的概念重构，他的理论贡献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其一，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包含所谓“精神成分”（Mental Part，或译思想成分）；其二，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宗教、血族等不同制度型式都曾起到生产关系的作用，并因此成为各自社会中最为显著的决定力量；其三，具有统治和剥削功能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交换服务的关系，即合约关系。上述第二个和第三个命题将留待本书第三章再作讨论，这里先来看第一个命题。

根据戈德利耶的解释，第一个命题还可换作如下表达：思想和表象是社会关系的“内在成分”，是“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再生产）的必要条件”。^③ 这种稍显晦涩的表达，如果结合以卢卡奇的本体论思想，其实并不难了解。首先，和第一种目的论活动一样，第二种目的论活动顾名思义也是以目的设定及其实现为特点的，因而也要依靠

①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98～105页。

②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364页（重点标识为笔者添加）。

③ 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p. 151, p. 170.

各种表象、原理和规则来组织这种活动；其次，在第二种目的论活动中，这些表象、原理和规则还被用于改变他人的观念和意志，故而具有将既定生产关系合法化（或去合法化）的功能。基于思想或表象的这种双重作用，戈德利耶提出，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包含着精神成分。

戈德利耶的这些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依照这种观点，观念形式或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而且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内在成分。由此出发，前述有关生产关系具有两重功能的观点，也可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既然任何生产关系都包含着“精神成分”，即对应着一套规则、原理和表象，那么具有不同功能的生产关系，自然也对应着不同的规则、原理和表象。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矛盾，就会因此转化为两套不同的“精神成分”乃至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而解决前一矛盾，便成为克服两种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现成的例子，作为这种思想的具体的、尚无充分自觉的运用。卡萝塔·佩蕾丝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因提出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理论而知名，在她那里，技术－经济范式“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所构成，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① 她指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通常会与旧范式形成冲突，为了促成一场技术革命，其先决条件是以新范式代替旧范式。^② 从戈德利耶的观点来看，这种技术－经济范式事实上正代表着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之中的精神成分；佩蕾丝所说的两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冲突，则可看作两种经济关系的矛盾的表现形式。

生产方式下属的两种目的论活动，分别对应于两种获取剩余的方法：其一是在第一种目的论活动的范围内提高生产力，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利用他人劳动；其二是改变第二种目的论活动赖以进行的生产关系，以更野蛮而残酷的方式役使他人劳动。^③ 这两种方法虽然彼此之间互有联系，但它们作为两种并列的取得剩余的方法，意味着在涉及生产方式的改变时，两种目的论活动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是率先造成变化的动因。

① 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第21页（译文略有修改）。另见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Vol. 34, No. 1, p. 186, p. 194.

② 参见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孟捷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65页。

③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将这两种方法分别命名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正如本书第二章还将讨论的，这种区分在理论上可以一般化，并推广到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生产方式。

第五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两种可能的因果关系

从上一节的讨论出发，我们可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可能形成的因果关系作一个类型学分析，即将这些因果关系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第一种目的论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生产力系统首先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涉及生产力要素品质的提高，直接构成生产力的那一类劳动关系的改变，以及进入第一种目的论活动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① 当这一变化在给定生产方式内部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引起第二种目的论活动和所有关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遵从由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改变的顺序。

在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些学者主张生产力发展的根据或动力来自生产力内部。平心大概是主张这类观点的最为知名的早期代表。董辅初也主张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生产力自身包含着推动其发展的内在矛盾，如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的矛盾、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的矛盾、生产工具与生产工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近年来，卫兴华教授也力主这种观点，并试图对生产力发展的根据何以在生产力内部作进一步的论证。^② 这一类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将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无条件地普遍化了。但问题是，并非生产方式的一切变革都可归于这一类型。

在历史上，符合第一种因果关系的实例比比皆是。以中国上古史为例，耦耕曾是一种长期流行的劳动关系，它和相当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井田制、村社制度结合在一起，构成“三位一体”的生产关系，历经夏商周三代，直至战国才最终衰落。根据历史学家李根蟠等人的研究^③，耦耕，即两人一起进行翻土的耕作，是伴随黄河流域原始

① 要注意的是，并非一个社会的所有发明或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都体现为生产力的变化，此处的衡量标准是这些知识存量的增长是否能为直接生产活动所接纳。那些未能引入物质生产领域，或者为后者所排斥的知识存量的增长，并不造成生产力的变化。我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曾关注过一个非常有趣但极为深刻的现象，即在奴隶制盛行的古代社会，有些技术（较为复杂的机械）在当时的军队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却无法在生产中采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古代社会的生产依靠的是奴隶，后者往往会破坏性地使用工具，而军队主要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因而不存在奴隶劳动所造成的那些限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7页。）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当生产力在发展，而生产关系尚未改变的时候，后者事实上“默许”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中，生产力虽然是率先变化的，但也要以生产关系的“在场”为前提。

② 平心：《再论生产力的性质》，《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董辅初：《关于生产力的几个问题》，载《论生产力》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第252页。均转引自卫兴华《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2~13页。卫兴华的观点亦见此文，尤见第14页，后文还将涉及对其观点的评价。

③ 李根蟠：《耦耕纵横谈》，《农史研究》1983年第1期；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1章。

沟洫农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为了在同一地块上连年种植庄稼,产生了翻土的需要,翻土工具即耒耜也应运而生。耒耜起初是木石工具,后来虽逐步在耜上施金,但仍沿用了两人并耕的形式。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耜的尺寸很窄之外,还因在田间挖掘沟洫时,两人并作是最合适的形式。易言之,只有在两人并耜挖沟的条件下,才产生了耦耕的概念。迟至春秋,耦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井田制和村社制度仍然相当流行。只是到了战国,由于新兴生产力即牛耕和铁制工具的发展,耦耕才最终式微。牛耕和铁制工具的普及为个体家庭开展独立经营提供了便利,独立的自耕农经济因此得以发展,以井田制和村社制度为核心的领主封建制所有关系也随之衰落,并因农民的分化而向新兴的地主封建制过渡。^①在这个故事里,生产力的变革,即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是造成劳动关系(耦耕)以及以井田制和村社制度为代表的所有关系消失的直接动因,因而是第一种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

现在来看第二种类型的相互关系,此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关系的质变居先,生产力的根本改变居后。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遵从了从生产关系的变化到生产力变化的顺序。

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在讨论苏美尔和古埃及的青铜革命时,他曾指出,冶金业的这一革命,是以剩余在一个社会里的集中为前提的,否则便无法供养冶金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职业或半职业工匠。换言之,生产关系的改变,是这场技术革命的前提。他写道:“事实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青铜时代的开始与一项我们称之为‘城市革命’的社会变革相一致。我称之为极权主义的确立。它系统而有序地从农民那里获取剩余物品,并集中到王室和庙宇。”可以设想,“极权的经济方式是冶金业诞生的必要条件。相对庞大的剩余财产必须积累起来并吸引人们去从事勘探、采矿、熔炼、分配、铸造这些具有风险的职业。这样的一笔剩余财产确实首先在极权经济体制下聚集在法老宫廷和苏美尔庙宇里。”^②

一个更为重要的例证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时,他们明确谈论过这种类型的相互关系。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撰文批评布哈林的技术决定论观点时,就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里的观点,以说明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或技术的首要性。^③在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学者持有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① “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发明及普遍应用,生产力大为提高,人们开辟了荒地,逐渐占为私有财产,这就破坏了‘井田’制度,使土地渐可买卖。”《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180页。

② 柴尔德:《青铜时代》,收录于柴尔德《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第108、110页。柴尔德接下来还论及,在埃及和两河流域,何以“建立起冶金业的生产关系也束缚了它进一步的发展”,见该书第110页。

③ Lukács, G.,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R. Livingstone, ed., *Political Writings: 1919 - 1929*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p. 134 - 142.

的观点，并与上文提到的主张生产力的发展根源完全来自生产力内部的观点相对立。^①

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关系的变化，大致属于第二种目的论活动的改变，从生产方式变革的整体来看，这种改变必然带来剩余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改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里，经典作家结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讨论了资本主义历史起源，其中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根据笔者的阅读和整理，可以将他们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扩大，甚至在各个城市之间出现了生产的分工，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据优势，城市经济的地域局限性开始消失。

第二，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出现。在不同国家，工场手工业的初步繁荣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在意大利和法兰德斯，工场手工业的初步繁荣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英法两国，工场手工业的最初发展是依靠国内市场出现的。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的程度也影响着工场手工业的初步发展。

第三，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即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的方式来进行的。商业自此以后具有了政治的意义。

第四，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行会中的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被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

第五，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资本积累，进一步提高了工场手工业相对于传统行会的优势。

第六，自17世纪中叶以后，商业和航运相对于占次要地位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经开辟的世界市场。新形成的世界市场是推动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就此指出，“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② 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凭借其海军的霸权，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也占据了优势。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即英国，这种集中逐渐使英国占据了世界市场的最大份额。对英国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超过了既有的工业生产力所能满足的程度，“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

① 代表这一派观点的有李洪林和胡钧等人，参见李洪林《只有生产关系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57年1月23日；胡钧《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纵横》2011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2页。

展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①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城市之间贸易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关系（既包括分工协作关系，也包括交换关系）在空间上的扩大。这种变化改变了生产的目的和剩余占有的方式，即使其越来越服从于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的支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它发生在传统的行会制度以外。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手工工场进一步扩大了生产，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要。此后，伴随殖民地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对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要超过了既有的工场手工业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从而诱发了生产力的根本变革，促成了马克思所谓“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兴起，以及生产力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革命性跃迁。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之所以发生，是以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变化为前提的。在形式隶属出现以前，生产力也有所发展^②，与此同时，劳动关系和交往关系也在变化。但和生产力以及行会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这种渐变相比，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是生产关系的一个质变，在这一质变的前提下，才进一步诱发了生产力的根本变革。正因为如此，与资本主义起源相关联的这个例子才被看作第二种类型因果关系的代表。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哲学家科恩作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辩护者，也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这里存在着第二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即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在时间上要早于生产的技术方式或生产力的根本变革。但科恩认为，这一现象并不违背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科恩的理论中，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被转换成“生产力在解释上（相对于生产关系）的优先性”（详见第二章的讨论），即生产关系的性质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而非相反。据他看来，生产力的这种“解释上的优先性”并不要求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力一定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出现，而只要求“新生的生产力不能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使用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结构是生产力的进步所必需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一旦出现，就会催生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

① 笔者的概括主要依靠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0~67页。在《资本论》里，则有以下几处重要段落代表了马克思的意见，在谈论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渡时他说：“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另外还有：“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分别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50、344、358页。

② 马克思曾提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要求生产力“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度”。见《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26页。

产力的革命，这在科恩看来反过来证明了他的观点，即一种生产关系之所以流行，在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①

科恩的这种观点虽然有助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成为流行的生产关系，但对于这种生产关系最初何以出现，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如英国学者里格比指出的，科恩的上述辩护实质上是向对手做了让步，即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生产关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作用。^②要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前提下解释形式隶属的出现，唯一可利用的论据是形式隶属要以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正如前文业已提及的，在发生形式隶属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以往相比并没有产生质变，因此，要将形式隶属的产生这一生产关系的突破性变化完全归因于具有渐变特点的生产力，是非常困难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更应看作造成形式隶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虽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里，上述两种类型的因果关系都存在，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却成了最为流行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诺思（或译诺斯）提出对马克思的下述诘难就不难理解了，他写道：“马克思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理论解释技术变革率，还在于在忽视其他变革原因的情况下对技术的强调。”^③诺思的第一个意见，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没有解释技术变革率（或变革速度），体现了他对马克思的误解。回顾一下《资本论》就能发现，这部著作实在堪称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几乎所有重要理论都是以技术变革为前提的，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动因、它所采取的特定发展形式以及这种发展的界限。如果这还不算技术变革率的分析，真不知在诺思的心目中马克思的模型究竟为何物了。一个反证是，即便科恩——作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当代代表——也曾提出，生产关系透过其反作用，在影响生产力发展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和速度上起着重要作用。^④

①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210页。

②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林出版社，2012，第138页。

③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3，第29页。

④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95页。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篇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手稿里，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和斯威齐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潜力的限制作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他们写道：“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力在一个给定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中是否发生某种增长，而是这种增长的可实现潜能在这一秩序的架构中得以实现的程度。这些潜能本身的出现取决于多种因素：科学知识的推进、新的技术机会的开辟、人类能力和技能的改良范围的扩大以及许多其他因素。核心的问题是，流行的生产关系是促进还是阻碍、鼓励还是压抑这些潜能的真正实现。因此，若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一方，既定的生产关系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冲突的产生，并非必然以经济增长的消失为征兆，而是反映为以下事实，即无论增长是否发生，都表现为这种增长与可见的、触手可及的、可实现的增长潜能之间的不成比例上面。这一现象以及在所实现的增长和增长潜能之间的鸿沟的加深，表明了现存财产关系以及依赖于这种财产关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业已转变为实现增长潜能的明显障碍。”见 Baran, P., and P. Sweezy,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onthly Review*, 2012, Vol. 64, No. 3, pp. 26–27.

诺思的第二点意见，即马克思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是对马克思最为常见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来自马克思主义者。^① 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应注意林岗教授在比较诺思和马克思的理论时曾经提出的一点，即马克思和诺思所考察的经济变迁分属不同的类型，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或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变革，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其根本前提；诺思所关注的则不仅包括基本制度框架的根本变革，还包括一定基本制度框架内的制度的边际调整，后者未必与生产力或技术的变化相关。^② 林岗的这一看法是相当中肯的，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之处，后文在涉及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问题时还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① 马克思的思想总体上是复杂的，足以容纳不同的解释。英国学者里格比就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两种理论，即生产力决定论和在与之对称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见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8章。

② 林岗：《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208页。

第二章 科恩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辩护：一个批判的考察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通过对科恩的批判性考察，继续深化在第一章里得出的初步结论。科恩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在发表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里，他试图为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进行一次新的辩护。^①科恩的论述由两个核心原理构成，即所谓发展原理和生产力首要性原理。由于科恩不仅在论述中借鉴了来自当代分析哲学的论证技巧，而且在提出其发展原理时还采用了新古典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因而成为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章由三节构成，第一节讨论科恩的发展原理；第二节讨论生产力首要性原理，即科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第三节通过对科恩和布伦纳的比较，继续深化了对科恩的批评，指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假定生产关系仅仅具有一种功能，即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节 评科恩的发展原理

科恩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辩护分别由他提出的两个原理构成，即所谓发展原理和生产力首要性原理。科恩将发展原理概括为如下命题：

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

生产力首要性原理则被概括为：

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解释的。

相对于生产力首要性原理而言，发展原理是科恩理论中更为独特且更为要害的部分。这是因为，首先，发展原理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前提，如果发展命题是错误的

^① 科恩在其著作里坦承，他“要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观念”。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序言，第Ⅲ页。

或片面的，自然会影响到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能否成立。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发展原理的提出和论证，即便非为科恩首创，也因科恩的论证而达到了极其彻底的程度。^① 这种彻底性体现在，科恩试图在完全脱离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建立人的动机模型和行为模型，以证明生产力趋向发展的规律。在科恩之前，大约只有普列汉诺夫提出过与发展原理类似的问题，但在提出问题的同时，普列汉诺夫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问题，因为他将问题转换为地理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普氏写道：“归根到底决定全部社会关系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所决定的。”^② 英国学者里格比在谈论普列汉诺夫的贡献时指出：“普列汉诺夫意识到，……如果我们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的变迁，那么又根据什么来解释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呢？像马克思一样，普列汉诺夫简单地假设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即使在某些社会条件下，这种发展是以‘极慢的速度’实现的。他更关注的问题是，生产的发展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平衡。”^③ 在普列汉诺夫以后，科恩再度提出了发展命题，而且，和普列汉诺夫不同，科恩没有在提出问题后又立即改变问题的性质，而是试图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一来，科恩就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史上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透过科恩对发展原理的论证，我们就有可能发现，自第二国际成立以来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会在何种意义上因其论证逻辑的透彻反而导向自我矛盾的尴尬境地。

科恩对发展原理的论证并不复杂，在他看来，如下三个“事实性命题”支持了发展原理。^④

- (1) 人，就其特性而言，多少是有理性的。
- (2) 人的历史境遇是一种稀缺的境遇。
- (3) 人具有的聪明才智使其有能力改善其境遇。

科恩的论证有几点值得商榷。

①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主张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在于生产力内部的一派观点，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发展原理”。在其最近的文章中，卫兴华教授在完全不知晓科恩的前提下还试图对这一原理进行论证，他提出，要论证生产力之所以会发展需解决以下问题：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动机；第二，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和行为。他把发展生产力的动机归结于人的消费需要，把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归结为知识的增进，这些观点大致对应于科恩的论证，只是不如科恩的分析更为明晰和彻底。见卫兴华《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研究中的唯物史观》，载《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引自王荫庭编《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92页。

③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林出版社，2012，第78页。

④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82页。

第一,由第三个命题可以看到,在科恩那里,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知识的进步。这样一来,对发展命题的解答就变成,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知识或智慧发展的结果。科恩在这一点上和圣西门的见解非常相像,后者曾是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里批评的对象。^①圣西门非常深刻地看到,在欧洲社会制度的发展中,财产关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财产关系的这种作用又来自实业发展的需要。在继续解释实业发展的动力时,圣西门又提出,实业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一来,知识的发展在他那里就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因素。为此他还力求发现知识发展的规律,提出知识的演进遵循三个阶段(即依次经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换言之,历史发展服从于这种人类智慧或知识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在解释知识的发展时,圣西门也像科恩那样诉诸个人的理性,在他看来,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理性的发展不过是个人理性的发展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现。

把生产力的发展还原为进化的学习过程,这在一定限度内是成立的。问题在于,科恩对知识的定义是相对狭窄的,从其论述来看,他所理解的知识大体局限于直接劳动过程的技术知识,那些同样隶属于直接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或分工的组织与协调相联系的组织知识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一来,人类的学习过程就被曲解了。如果我们认可后一类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的发展就不能还原为孤立个体的学习过程,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集体学习,承认后者自然会导向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动。^②

第二,如果说科恩只是无意识地效法了圣西门,他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亲缘性则是一目了然的。和其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科恩在论证中运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即以个人理性和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将发展原理还原为个体的最大化选择。科恩这样做,在逻辑上有其必然性,因为他要彻底撇开生产关系来解释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来,生产的主体必然沦为孤零零的个人。然而,科恩所遗忘的是,在历史上,个人多半是不独立的,那些最重要的主体往往不是个人,而是不同类型的生产组织,如原始氏族或部落、奴隶制或农奴制庄园、资本主义企业等。至于个体生产者如自耕农或独立的手工业者,正如马克思一度指出的,他们只是部分地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并在某些经济过渡时代(如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时期,或封建社会向资本主

① 参见引自王荫庭编《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1~22页。

② 哈贝马斯曾试图把生产力的进步解释为进化的学习过程,在他那里,学习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和组织知识的进步,而且涉及“道德-实践领域”的知识进步,后者带来他所谓“社会一体化”的发展,即作为一个生活世界所必需的统一价值及规范的确立和再生产。见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义过渡时期)特别地繁盛过,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时代。^①对这些生产组织而言,其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并不是抽象意义的稀缺,而是能否取得以及以何种方式取得更多的剩余。在原始社会晚期,伴随考古学家柴尔德所称的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次革命,即人类实现了对食物供给的支配,剩余及其占有的问题就出现了;相应的,阶级差别也产生了。^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面临的任務就不是简单地改善其稀缺的境遇,而是如何更多地生产和占有剩余,发展生产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第三,发展原理只解释了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排除了生产力会出现停滞乃至倒退的情况。科恩承认,在特定情况下,生产力不仅会停滞,而且可能出于社会内部原因而倒退,他举了罗马帝国衰落后的例子,当时欧洲的生产力水平在长达两百年间出现了长期退化的现象,但他又把这种倒退看作历史理论不能回答的反常情况而予以排除。^③科恩的做法或许可以从经典作家那里找到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曾专门指出,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但他们又把这种停滞和倒退归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这些事件“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观点意味着,生产力的停滞或倒退,不是从社会组织内部的原因来解释的,而是归结于外在的偶然原因。诺思和托马斯曾针对这一点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马克思未能认识到经济增长(从而生产力的发展——引者按)并不是必不可免的”,而是以“有效率的所有权”为前提的。^⑤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导致有效率的所有权,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诺思等人的这种观点,足以表明他们支持的是前一节提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第二类相互关系。

根据以上讨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停滞和倒退)趋势不能脱离既定的生产方式,在抽象的个人层面来论证。特定的生产方式或获取剩余的方式,会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这一发展的速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结合奴隶制生产方式与技术进步

① 马克思:“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71页注释。

② 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校,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5章“新石器时代革命”。

③ 科恩:发展原理“没有说生产力总是发展的,更没有说生产力从不会衰退”,见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63页。关于古罗马瓦解后生产力倒退的例子和科恩的评论,参见上引书,第186~1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1~62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此还指出:“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才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⑤ 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223~224页。

的关系进一步考察这一点。

20世纪20年代,在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评论中,卢卡奇就曾讨论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布哈林当时流露出这样的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所谓技术。以奴隶制为例,布哈林认为,奴隶劳动只适应某种低水平的技术,一旦采用新的技术,如一些复杂的机械,就会遭到奴隶的蓄意破坏。因此,为了采用新技术,就必须废除奴隶制。

与布哈林的观点相反,卢卡奇认为,布哈林在此颠倒了因果关系。奴隶制并非由于低水平的技术而变得可能,相反,正是因为奴隶制成为统治劳动的形式,才使得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以及采纳合理化的技术变得不可能。^①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剩余榨取方式,就限制和妨碍了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其晚年的本体论著作里,卢卡奇又回到他早年和布哈林争论的问题上来,他在书中反复提到,在奴隶制生产中,由于暴力在第二类目的论活动里作为直接的甚至唯一的手段发挥作用,就造成了这种剥削方式的原始性及其在经济上缺乏效率,即除了外延型的增长外,不可能在给定的生产范围内提高生产率。^②

卢卡奇的这些看法植根于马克思对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分析,并与后者完全一致。正如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发现,在古代社会,一些先进技术最早是在军队里得到运用的,而不是运用于生产。这种奇特的现象证明了奴隶制生产方式对于新技术的运用有一种内在的阻碍力量。但即便如此,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不能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技术)也在一定限度内得到过发展。这里可以提醒读者留意马克思在北美内战期间所写的著作,在那里马克思专门讨论了北美蓄奴州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这一分析通常不太为人注意,值得在此费些笔墨加以介绍。

马克思指出,在北美奴隶制经济中,生产的发展存在两个特点。第一,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生产的扩张靠的是人力投入这样的粗放经营,而不是技术进步,这一点是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写道:“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③第二,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是,为了实现生产的扩张,奴隶制生产方式“就必须获得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

① Lukacs, G.,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Political Writings: 1919 – 1929*, ed. by R. Livingstone, New Left Books 1972, pp. 34 – 142.

②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327页。

③ 马克思:《北美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353页。

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隶。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没有取得路易西安纳、密苏里和阿肯色，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该被扫除了”。^① 这意味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天然有扩展的需要，这种扩张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正好为奴隶的繁殖开辟新的人口市场。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外延的粗放式扩张，而非技术进步，才是推动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动因。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也正是这种扩张最终激化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成为北美内战爆发的原因。在第三章里我们还将谈到这一点。

马克思对北美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分析表明，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以及这种发展所具有的限制，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依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因素之一——之所以无法得到发展，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本性”；另一方面，奴隶的大规模使用——作为奴隶制下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杠杆——也同样取决于这种“本性”。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显然不同于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解释，并为后来卢卡奇对布哈林的批判提供了背书。

基于上述讨论，科恩用来支持发展原理的三个命题，或可替换为以下三个截然不同的命题：

(1) 人们必须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结合起来才会有现实的生产，由此而形成的生产方式是以扩大对剩余的占有为目的的。

(2) 在给定的生产方式内，生产力会在某种特定的形式上、以特定的速度得到发展，剩余的供给也会因此而增加。

(3) 在这种特定形式上得到发展的生产力会遇到制度本身造成的极限，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

在整个历史中，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有不断发展的趋势。

这个结论的潜台词是，如果生产关系不能得到顺利的变革，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就会遇到阻碍。与科恩不同，上述原理——如果可以称作“新发展原理”的话——不

^① 马克思：《北美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353、354页。

仅解释了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而且可以解释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的原因。新的命题还避免了科恩的下述武断,即把任何生产力的停滞或倒退都作为非典型情况预先从发展原理中予以排除。

第二节 评生产力首要性原理及所谓功能解释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和张闻天类似,也区分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即把生产关系区分为生产的物质关系(或劳动关系)和生产的社會关系(即所有关系)。科恩本人也接受这种区分。在讨论生产力首要性原理时,科恩据此提出,生产力的变化首先引起生产的物质关系的变化,然后再引起生产的社會关系的变化。在提出这一观点时,科恩还特地批评了与张闻天的见解相类似的另一种观点,即主张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关系联系得太过密切,以至于后者的变化不可能是前者变化的结果,两者毋宁是同时变化的,因此并不存在独立于生产的物质关系的生产力的变化。科恩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生产力不仅可以脱离生产的社會关系单独发展,也可以脱离生产的物质关系即劳动关系单独发展。^①

在上述准备工作之后,科恩对生产力首要性原理进行了论证,科恩将这种论证视为一种功能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被解释的东西的特性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影响决定的”。^②举例来说,鸟长有空心骨是因为空心骨有利于飞行,在这里,被解释的现象(鸟长有空心骨)是根据它有利于鸟的飞行这一原因来解释的。科恩认为,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也可做类似解释,他写道:“流行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会流行,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现存的生产力水平会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将提高其水平,而那一类提高其水平的生产关系也就会流行。换句话说,如果K类型生产关系流行,那是因为就现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K类型生产关系适应这一生产力的发展。”^③科恩提出,在这段话里包含着以下三个命题:

(1)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哪些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哪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

(2) 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促进了生产力;

① 参见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四章第六节以及第六章第六节的论述。

②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317页。

③ Cohen, G. A.,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译文引自段忠桥《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51~52页。

(3)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经济结构（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

依照科恩的意见，上述第（1）个命题可以解释哪些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解释哪一种生产关系最终流行；第（2）个命题解释了一种生产关系流行的必要条件；将这两个命题合并，会得到第（3）个命题，只有这个命题表达了生产力首要性原理。^①

需要指出的是，科恩的生产力首要性原理和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并不完全一致。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初始含义，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在科恩那里，这一原本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命题，变成了纯粹认识论的命题，这体现在，科恩只限于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流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不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出发，推演出生产关系如何变化以响应这种发展。换言之，一种生产关系何以成为流行的生产关系，对他而言已不再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科恩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卸除了负担，因为按照他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无须从生产力的发展出发，推演出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而只需根据生产力的水平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但这样一来也给科恩的理论招致了负面后果。在上述第（1）个命题中，他实际上承认，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不止于一种。在第（2）个命题中，由于科恩只解释了一种生产关系得以流行的必要条件，而没有解释其充分条件，这就带来了段忠桥教授指出的下述可能性，即对科恩而言，一种生产关系之所以流行，可能源于和生产力无关的其他因素，尽管这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②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时默认了生产力以外的因素，科恩就不自觉地走向了他要为之辩护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面。^③

科恩对问题性质的转换，即他将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转化为认识论的问题，决定了他所解释的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必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种静态匹配关系。借用一个譬喻，这相当于某种生物学理论只能解释昆虫的外观在色彩上和环境相一致，至于昆虫的外观何以变得与环境一致，则无从解释。在此意义上，科恩的生产力首要性命题事实上可以兼容前文概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两类因果关系。加

① 科恩不仅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中，而且在其他地方阐释了其功能解释的含义，对此段忠桥教授有全面而精当的介绍。此处的三个命题即转引自段忠桥教授的上引著作（段忠桥：《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51~52页）。

② 段忠桥：《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55页。

③ 科恩对非决定论因素的引入还体现在他的下述观点上，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解释所有生产关系的特性，而只能解释一部分生产关系的特性。由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引出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多样性的结论。见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93~194页。但科恩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非决定论观点是如何与他的基本理论相契合的。

拿大马克思主义者伍德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她写道：科恩的解释“不包含任何特定的时序先后性（Temporal Sequence）。生产力动态可能会冲破社会关系的外表，并推动后者相应地改变；或者，停滞的生产力由于其不能发展，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以鼓励和加速技术进步。的确，科恩的公式能够对应这两种情形”。^①

第三节 科恩与布伦纳：一个比较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科恩对生产力首要性的功能解释，近似于经济学里的比较静态分析。所谓比较静态分析是以各种变量的均衡关系为出发点的，它要研究的是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各种变量之间的新的均衡位置将在何处出现。在科恩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初始状态下的彼此适应，类似于一种均衡关系。由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是和不同的生产关系相对应的，当生产力首先发生改变后，为了重建均衡，就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

比较静态分析不属于动态分析，这体现在，第一，这种分析方法抽象了时间，因为它假定朝向新的均衡的调整是立即实现的；第二，它没有提供一个因果解释，以说明何以变量 A（而非变量 B）作为自变量而先行变化。这一分析方法事实上默许，任何一个变量都有可能作为自变量而先行变化。在科恩的分析中涉及两个变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力被看作自变量，然而，在逻辑上也可以反过来，即以生产关系为自变量来解释整个体系的变化。科恩自己就承认了这种可能性，他说：反对生产力首要性原理的一个“最有希望的思路也许是提出一种关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命题，一种这样的主张，即生产关系趋向特定方面的变化贯穿整个历史，而且这不是因为它们之中的生产力的提高”。不过，科恩又说，“我们认为，要证实任何这样的主张都会是极其困难的”。^② 然而，若从比较静态的方法看，提出一种“生产关系的发展命题”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困难。如果存在困难的话，也只在于这一新的发展命题和历史事实之间的符合程度。但是，要在历史理论和历史事实之间完美地缔结一致，在科恩的理论中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正如里格比尖锐地指出的，科恩的功能解释“在历史经验上的疑难是，尽管特定的阶级结构未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有一种趋向于停滞，甚至危机和倒退的内在倾向，但这种阶级结构持续存在了几个世纪”。^③ 科恩解决这种矛

① Wood, E. M.,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981, I / No. 127, p. 73.

②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89页。

③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第151页。

盾的办法仅仅是，宣布这些经验是历史的“反常”情况，并最终对其置之不理。

有趣的是，里格比在批判科恩的观点时，还曾试图论证这种“生产关系发展原理”。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确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的替代理论，这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将生产关系视为现实生产过程的条件，例如，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①里格比在此基础上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在第一种理论中，以生产力首要性为基础，物质生产产生社会关系。在第二种理论中，生产本身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它受到劳动工具分配的制约，而工具的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承认生产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这就为一种对历史变迁非常不同的解释开启了理论空间，这种解释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给出的解释。”^②

里格比所指的后一种理论，在以布伦纳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著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在其关于近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中，布伦纳提出，在16~17世纪欧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存在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形势，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生产关系，进而塑造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轨迹。在英国，特定的阶级斗争形势导致农业生产关系变得资本主义化，即出现了“地主—资本主义佃农—农业雇佣工人”这样的阶级结构（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的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的阶级结构）；在法国，则带来了绝对主义国家和广泛的自耕农经济；在德国东部和波兰等地，出现了农奴制的重新崛起。^③布伦纳在分析英国的情形时提出，资本主义佃农作为大片土地的租赁者，实际上是乡里的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他们必须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以具有竞争性的成本出售其产品。布伦纳写道：“资本主义佃农的成本如果低于平均水平，作为其采纳落后生产方法的后果，他将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如果他试图按现行水平交纳地租，利润率将落在平均水平以下，他的积累资金就会减少，在市场上的地位也会进一步被削弱。另一方面，如果他试图交纳的租金偏低，他就会受到地主的惩罚，后者将转而寻求更有能力从事必要改良的新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4~25页。

②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第175~176页。

③ Brenner, 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Ashton, T. H., et al. eds.,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renner, R.,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农，以便在市场上开展竞争。”^①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得到成功的发展，这是由阶级制度、产权制度、剩余榨取制度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剩余榨取者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尽管并不完美——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相适应。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而非只是绝对的剩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剩余）。 ”^② 在这里，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与科恩不同，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首要动力，被归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③

科恩试图为之辩护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其根本缺陷在于假定生产关系只具备唯一的功能——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决定论解释所忽略的是，生产关系还有另外的功能，即扩大统治阶级对剩余的攫取。在一种流行的生产方式中，扩大对剩余的攫取与生产力的发展绝非必然是并行不悖的，两者有可能相互矛盾。在比较近代欧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时，布伦纳强调了这一点。

应予指出的是，假定生产关系只具备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唯一一种功能，在理论上根源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文本里，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假设界定了生产关系，让我们来看《雇佣劳动和资本》，在那里马克思写道：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及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① 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4, 1997, p. 76.

② 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4, 1997, p. 78, p. 68.

③ Hilton, R. H., Introduction, in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7-8. 布伦纳的理论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或晚近的阿西莫格鲁的相似之处是明显的，他们都强调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首要作用。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在解释阶级斗争的作用时，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并将两个阶级的关系彻底还原为合约关系。布伦纳在其著作中反对这一观点，参见 Brenner, 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 note.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①

在这段引文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两句话，即生产关系的存在是为了便于生产者“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以及“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对生产关系的这些近乎定义式的阐述有以下两点缺陷：第一，它等同于假定生产关系的功能只有一个，即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这里谈论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只是劳动关系，换言之，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对所有关系和劳动关系加以区分。在区分生产关系两重性时，张闻天也是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这段论述为依据的，但他通过区分这种两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从而避免了马克思的失误。

如果我们承认生产关系具有上述两重功能，则科恩在论证生产力首要性原理时采用的第（2）个命题，即“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促进了生产力”，就是片面的。我们可以写出如下两个命题，并将其运用于对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的区分，这两个命题是：

（1）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扩大了对剩余的占有，但并不一定促进生产力；

（2）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既促进了生产力，也扩大了对剩余的占有。

生产关系的这两种功能，显然对应于马克思提到的两种取得剩余的方法——绝对剩余生产和相对剩余生产的方法。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详细地阐述了这两种方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其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必须诉诸残酷剥削的手段，如延长工时、降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等，这些手段往往造成对劳动力的耗竭性使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需诉诸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出现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成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有剩余的主要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则退居次要地位。

根据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的占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互为条件或彼此促进的：一方面，获取更多的剩余，取决于发展生产力（其主要表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只有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才能占有更多的剩余。不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486～487页。

仅如此，依照《资本论》的论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还存在实际工资伴随劳动生产率进步而增长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这一取得剩余的方法不仅满足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人的利益。^①

布伦纳的理论贡献，是从《资本论》对两种剩余价值生产的讨论借来灵感，提出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对剩余劳动的区分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可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作为一般分析概念来使用。^② 与获取剩余的这两种方法相对应，生产关系也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类型，布伦纳的研究暗含了后一区分。在布伦纳看来，由特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产生的生产关系，在欧洲不同区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英国，新形成的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剩余的增长；而在德国东部或波兰，重新崛起的农奴制虽然促进了剩余的增长，却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③ 在这里，他事实上在类型学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只是没有在概念上将其正式确定下来。笔者建议，可以将这两类生产关系分别命名为生产型生产关系和榨取型生产关系。值得强调的是，对这两类生产关系的区分，是以其各自的功能为依据的，生产型关系在功能上将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榨取型关系则通过纯粹的剥削来实现剩余的增长。

在现实中，一种生产关系可能同时具有生产型和榨取型这两种功能。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虽然马克思假设，在机器大工业诞生以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占据主导地位，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不排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反而还会在某些情况下加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这种情形下，对榨取型及生产型关系的界分只具有理想类型的意义。在某些条件下，一种生产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生产型功能，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可能更多地表现出榨取型功能。在此意义上，经济结构就不是由两类生产关系按某种比例结合而成的，而是由具备了两种不同功能的同一生产关系构成的，这两种功能分别占据不同的比重。若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特定生产方式自身的演进，还是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更替，都可视为两种剩余劳动以及生产型和榨取型关系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尽管绝对剩余劳动以及

① 本书第六章第一和第四节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笔者在那里提出，通过上述观点，马克思表达了属于他自己的另一种“看不见的手”原理。

② 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1977, p. 68, p. 78. 另可参阅里格比的相关评价，见里戈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林出版社，2012，第147~148页。

③ 参见 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p. 60, p. 78.

与之相对应的榨取型生产关系占据着主导地位^①，但对统治阶级而言，在长期内仍然需要引入生产型关系以提高相对剩余劳动的比例，并借此遏制社会矛盾（后文还会涉及这一点）。如果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其阶级统治地位就更容易被倾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可以假定，相对剩余劳动及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类型所占据的比重有趋于增加的趋势。这一观点呼应了我们在批判科恩的发展命题时所得出的结论。

① 里格比：“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对剩余劳动的区分也适用于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但在这些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绝对剩余劳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第147页。

第三章 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其动力：迈向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布伦纳通过对近代欧洲不同地域的比较历史分析，得出了一般意义的结论，即阶级斗争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需注意的是，布伦纳所分析的发生在英格兰的历史变迁和其他两地的变迁相比，并不属于相同的类型，只有在英格兰发生的变化，预示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生产方式的嬗替，而在诸如民主德国和波兰所发生的农奴制复辟，则不具有这种意义，充其量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插曲而已。这种差异的存在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只有在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既增加了剩余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才具备了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以往生产方式的资格。因此，尽管在布伦纳那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解释历史变迁的直接动因，却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形态变迁的必要条件。

布伦纳的比较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把我们引向对社会科学中普遍运用的因果性概念的反思。在既有文献中，可以找到两种对历史因果性概念的分析，第一种可称之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因果性，其代表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当代哲学家罗素；第二种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因果性，其代表是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下面就来分别讨论这两种因果性概念。

第一节 历史因果性概念和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

在于1843年出版的名为《逻辑体系》的著作里，穆勒提出，在因果关系中并不存在终极意义的原因，特定的结果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赋予任何一个因素以客观的首要地位是不可能的；通常人们所说的原因，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确定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当人砸碎一只玻璃瓶时，玻璃瓶碎裂是因为有人用石头去砸它，还是因为它是由易碎的玻璃构成的？如果分析者从玻璃易碎这个事实出发，那么玻璃易碎就可以成为关键的因素；如果从有人用石头去砸这个事实出发，则以石头砸就成为首要的解释因素。^①

① 对穆勒的介绍引自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林出版社，2012，第6~7页。

哲学家罗素在探讨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时，针对历史因果性的概念发表了如下见解：“历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如果精心地选择事实，就可以发明许多普遍的公式，这些公式都有充分的根据表明自己恰当。我想以谦虚的态度，提出下述有关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另一种理论，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因此，在探索**历史因果关系**时，基本的研究乃是水文地理学。”^①

罗素和穆勒所涉及的都属于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因果概念，这一点体现在，他们所谈论的原因，都脱离了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纯粹是由研究者主观选取的，因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两人的区别在于，在穆勒那里，对相互作用的强调，导致他最终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而罗素则通过时间上近乎无限的回溯，将地理环境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在转过来看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或“结构因果性”概念。与上述纯粹认识论意义的因果性概念不同，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了因果性概念，即结合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谈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为因果作用。阿尔都塞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果性概念。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整体表现为市民社会、国家、艺术、宗教、哲学，但所有这些都还原为“绝对精神”。由于黑格尔的社会整体是由绝对精神这个单一要素构成的，因此它并不具有复杂的结构。阿尔都塞指出，与黑格尔的这种观点类似的，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观点，即认为社会整体的一切变化都是经济的表现，都可以从经济因素中推演而来。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整体具有复杂的结构，其中含有三类要素，即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要素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在结构的演变中都有可能起第一位的或首要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正是唯经济主义事先就一劳永逸地规定，**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必定是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矛盾的这一‘方面’（生产力、经济、实践）必定起主要作用，而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必定起次要作用，却不了解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

^① 见罗素《论历史》，何兆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45、147页。引者增添了重点标记。

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①他把这种各个要素交替占据主导地位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称作矛盾的“多元决定”。

阿尔都塞在这里区分了“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和“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并认为前者决定了后者。可是，阿尔都塞虽然正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他并未对这两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②正因为如此，要素（如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独立发展，就有着与“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相游离的倾向。这样一来，通过其多元决定的观点，他事实上就和韦伯式的主张各种社会权力在历史发展中都有同等重要性的观点做了妥协。^③

需要指出的是，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非为其独创，而是渊源于毛泽东《矛盾论》里的观点。阿尔都塞本人非常熟悉毛的这一文本，在其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重要论述：“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④

将这些论述和阿尔都塞的论述相比，我们或许会发现，后者除了在表达上增添了一些结构主义的色彩，并没有实质性地补充新的观点。《矛盾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化的观点，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一观点的确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提供某种方法论的指引。本文提倡的有机生产方式概念，实际上也是以这一方法论思想为依据的。但同时要看到的是，《矛盾论》对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并未加以区分，这样一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主次矛盾何以相互转化，生产关系何以享有某种自主性，并转过来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没有给出足够充分的解释。在上述征引段落之后，《矛盾论》的作者还进一步把生产关系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与通常理解的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的反作用等同起来，就表明了这一点。将生产关系的功能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第184页。重点为引者所加。在《读〈资本论〉》里，阿尔都塞还使用了“结构因果性”的概念，含义与“多元决定”类似。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16、219页。

② 参见段忠桥《评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无主体过程论”》，载《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61页。

③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在其晚年一篇论文里，曾主张生产关系具有相对于生产力的优先性，见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文景》2013年第1和第2合期。

④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5~326页。

局限于这种反作用，实际上是以默认生产关系只有一种功能，即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依照这种观点，生产关系就必须也能够及时地被改变。然而，由于生产关系实际上具有两重功能，且这两种功能可能相互背离，这样一来，那些割断了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榨取型关系就可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生产力的发展会被持久地压制，社会将因之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准此，在理论上便不能简单地推断，凡是生产关系的变更都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的。

为了避免上述片面性，同时也在方法论上继承从《矛盾论》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所包含的富有价值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提出一种新的因果性概念，以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这一新的概念或可命名为**系统因果性**，以区别于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性概念。系统因果性的概念建立在如下认识的基础上：导致某一系统最初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不必然等于这一系统在整体上发生变化的原因；只有后一类原因，才会带来系统的不可逆转化，即造成这里所说的系统因果性。准此，我们或可进一步提出如下观点：不管最初造成生产方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什么，只有当这些原因最终导致生产力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方式才最终在整体上实现了变迁，这一变迁也才具有**不可逆性**，这便是笔者定义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①与《矛盾论》以及阿尔都塞不同的是，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这一概念里，“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和“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并不必然处于一种有机联系中，换言之，虽然生产力的质的提高在这里被看作导致整个生产方式发生系统变革的必要前提，但当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先行改变时，未必一定会引起生产力的这种改变。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界定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时我们采用了不可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和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历史性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在其本体论著作里，卢卡奇试图重申马克思的下述思想，即存在（包括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是作为不可逆过程的历史性，他写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存在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存在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正确地理解所有问题的本体论出发点。”马克思“把全部存在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就其基础而言是历史的（不可逆

① 王峰明教授的下述见解表明他已接近于认识到本文提出的系统因果性的概念，他写道：“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事后’的总结和概括。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生产力 and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只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而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只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见其《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载于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01页。但是，所谓逻辑的先后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此并没有得到清楚的交代。

转的)过程”。^①

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或不可逆性体现在,经济社会形态从简单的、落后的形态依次发展到复杂的、发达的形态。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②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认识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的方法,并把不同社会形态的发达程度归结为生产组织(实即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那么,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可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呢?一个很自然的尺度便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生产方式的变迁不仅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嬗变而实现的,而且最终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那么这一变迁就获得了不可逆性。我们将这种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变迁称作**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有机一词在此意味着这种变迁的整体性)。这一概念指涉下述两种情形,其一,一种生产方式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从而相对剩余劳动的比重在根本上得到提高;其二,在既定生产方式内,相对剩余劳动所占的比重较绝对剩余劳动得到显著提高,该生产方式因而从较低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在这里,相对剩余劳动和绝对剩余劳动所占比重的消长,抑或与之对应的两种生产关系(生产型和榨取型生产关系)所占比重的消长,成为定义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主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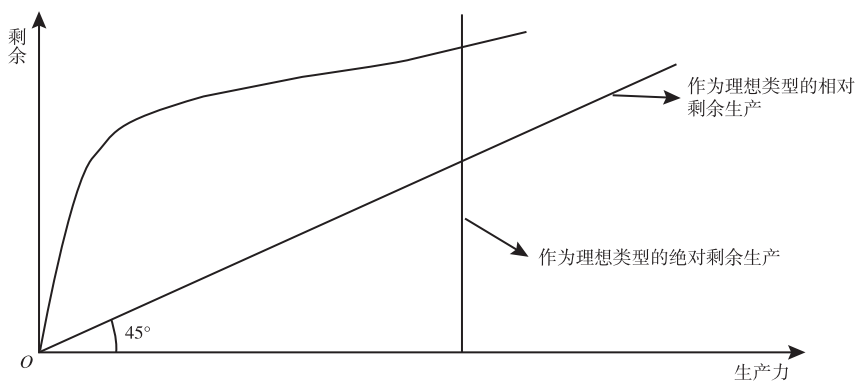


图 3-1 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

图 3-1 描绘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过程。图中的横坐标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纵坐标代表统治阶级剩余占有的规模。从原点出发的 45° 直线代表了作为理想类型的相

①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100、134页。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卢卡奇以大量篇幅讨论了作为不可逆过程的历史性原则之于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意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3页。

对剩余生产,在这条线上,剩余的提高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那条与横坐标垂直的直线,则代表了作为理想类型的绝对剩余生产,沿着这条线,剩余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全然无关。以这两条线为参照,我们画出了一条变化的曲线,在其变化的第一阶段,曲线近乎垂直,这意味着获取剩余的方法以绝对剩余生产为主导;在其变化的第二阶段,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即大体和 45° 线平行,获取剩余的方法此时以相对剩余生产为主导,这一转变既可代表该生产方式进入新的阶段,也可代表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出现。

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原则,并不排斥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些局部的、可逆的变化,前者甚至就是以后者为前提的。布伦纳笔下近代东欧农奴制的复辟便是这种倒退的典型例子。在当代,苏东社会的巨变是更为醒目的例子。在后面这个例子里,倒退之所以发生,在于革命后的社会虽然彻底改变了旧的剩余占有关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关系,使之全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达到的水平。一些西方国家的左翼学者在观察苏联经济时经常发现,在企业内部,劳动组织和分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非常相像。^①与这一认识相关联,在进而判断苏联社会的性质时,左翼学者中间也产生了相应的理论困惑和争论。根据曼德尔的介绍,在这一争论中主要形成了三派观点,除了将苏联归于社会主义或归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两派之外,还有曼德尔所主张的苏联社会属于特定过渡阶段的观点。曼德尔的主要论据是,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虽然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但它所取得的生产力仍然落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因而也不是一个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②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完成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曾试图回答这个最先由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因而十月革命不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列宁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在这里,列宁间接地

① 参见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朱基俊等译,张伯健校,商务印书馆,1979,第17~18页。

② 参见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务印书馆,第197~203页。另见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的导论及第1章第3节的论述(孟捷、李民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③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在写于1917年的《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里,葛兰西也表达了和列宁类似的设想,他写道:俄国“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它必须从零开始,它就将在别处已经改善了的基础上起步,因而将迫使自己达到被马克思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那种经济成熟水平。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而且他们创造这些条件的速度,将比资本主义所能做的更快些”。《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第12页。

承认了十月革命的局限性（即只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又为克服这一局限性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通过政治革命为先导，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实现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然而，苏联社会后来的演变及其解体表明，尽管它在短暂的70余年里在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最终却没有完成列宁所瞩望的目标，即未能发展成为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曼德尔在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力与货币》等在内的不同时期的著作里，分析了革命后苏联社会的性质，以及这一体制最终失败的经济和政治原因。我们大体赞同他就苏联社会的性质所发表的下述看法：苏联社会的性质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介于两者间的过渡社会。

由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并不等于实际历史本身，而是对后者的根本趋势的表达。在此意义上，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序列所对应的，只是从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作为不可逆转过程的那一部分历史。接受这种解释还意味着，我们可以像晚年卢卡奇那样，在谈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时，援用本质和现象这对辩证范畴。^① 传统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借助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但问题是，正如我们在批判科恩时业已指出的，由于生产关系具有两重不同的功能，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生产关系都在同等意义上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准此，以内容和形式这一对范畴来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便不是无条件地普遍适用的。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的整体的、不可逆转的变迁要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这就使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类历史的本质趋势，尽管这一本质趋势是以生产力和作为现象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卢卡奇在其本体论著作中，还进一步将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在本体论上解读为必要劳动永恒递减以及社会存在的自然限制永恒退却，将此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本体论趋势之一。^② 在他看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最终贯彻了这些本体论趋势。

运用本质和现象的辩证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五形态论”。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

① 卢卡奇：“我们已经用经济领域的一般辩证法，用本质和现象的相互作用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最一般的关系”，见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408~409页；另见该书下卷第517~520页的论述。卢卡奇还强调，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也适用于占有剩余劳动本身与这一占有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差别（同前引书，下卷，第409、519页）。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大概是国内唯一一本试图全面考察卢卡奇晚年本体论思想的著作，但遗憾的是，囿于传统观点的束缚，他没有恰当地领会《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意旨，大大低估了该书的理论价值，并在误解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不切题的批评，他指斥卢卡奇以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便是其中一例（见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40页）。

② 参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296~297页。

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此之后，则是标志着人类史前期结束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① 这一观点后来被简称为“五形态论”，成为教科书里对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解释。在通常的理解中，“五形态论”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所谓“五形态”具有地域的遍历性，即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要依次经历这几个阶段。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思想，或马克思本人是否一直坚持这一思想，是存在争议的。在其晚年，马克思本人曾和这种观点刻意拉开了距离。一个最常被人举示的证据是，在给俄国民粹派代表查苏里奇的著名回信中，马克思就认为，他在《资本论》里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只是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并不先验地适合所有国家。^②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地域遍历性假说所面临的挑战，还体现在针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以中国古史为例，迄今为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夏、商、周三代，奴隶制构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世界历史中，诸如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完全是一种例外，并非普适的规律。^③

第二，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遵守着《序言》所确立的固定不移的顺序，即从原始共同体开始，依次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结束人类史前期，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和提出“五形态论”的《序言》不同，在其他文本里，马克思本人还曾颠倒过农奴制和奴隶制在历史上发生的顺序，指出一个社会可以先进入封建的农奴制，再进入奴隶制。事实上，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按照当时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水平，人类社会既具备过渡到奴隶制的条件，也具备过渡到农奴制的条件，至于具体形成的是哪一种生产方式，是由不同国度的历史特殊性决定的。以童书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体认到这一点，并以此为指导开展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④

然而，“五形态论”虽具有上述缺点，笔者却不同意一些学者的过于极端的看法，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9页。

② 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查苏里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5。在这一卷里还收录了马克思为复函查苏里奇而拟的三封草稿，其篇幅都远胜于正式的回信。拟稿之多和复函之简短，似乎都表明了马克思态度的慎重。

③ 在中国史学界，有所谓“有奴派”和“无奴派”之争，前者以郭沫若、吕思勉等为代表，主张中国古代经历过奴隶制生产方式，这一派观点长期主导了史学界。近三十年来则兴起了“无奴派”，即主张中国乃至世界古史没有普遍经历过奴隶制生产方式，其代表文献如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主张西周属于领主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观点，与“无奴派”的意旨大致是契合的。

④ 参照童书业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的讨论，《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312~313页。

即主张“五形态论”一无是处，应该全然放弃该理论。^①“五形态论”在下述意义上是有贡献的，即把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差别归结为生产方式的不同，而生产方式的演进又以生产力的根本变革为基础。在此意义上，笔者提出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实际上是对“五形态论”的重新表达，这一新表达去除了“五形态论”中那些富有争议且毫无必要的枝蔓，保留了这一理论的核心要旨，即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②，生产力的发展既是造成这一自然历史过程的归根结底的原因，也是测量这一历史进程的刻度。

在结束这一节的讨论之前，让我们插入一个涉及古代中国文明发生的历史实例，以佐证上文的观点。这个实例是要说明，只要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肯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问题是由已故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引发的，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时，他提出这一文明的形成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并将其称作文明产生的连续性假说，以区别于根据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的特点而得出的文明产生突破性假说。这一连续性假说在他那里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的。第一，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初阶段，即所谓青铜时代（按照张光直的界定，这大体相当于夏、商、周三代），在生产中得到运用的工具和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虽然青铜在当时已经发明出来，但主要是用于兵器和礼器，而不是用作生产工具。为此他提出，在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向最初的阶级社会（即所谓三代）的过渡中，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根本的提高，这一点和苏美尔—古埃及文明有着根本区别，后者向文明的过渡，是建立在生产力重大发展的前提下的。第二，在工具和技术没有本质变化的前提下，剩余的集中（这是文明产生的条件）所依靠的主要是劳动力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和战俘的掠取），而后者又是由政治制度的变化（如宗法制和封建制的确立）而造成的。第三，在文明的形成中，由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巫术，在统治阶级取得和巩固政治权力时起到了关键作用。^③

张光直强调政治权力在文明发生中所起的作用，与后文采纳的观点是大体一致的，但他的核心论题，即认为生产力因素在文明发生中毫无作用，则是全然没有根据的。他的关于青铜从未用作生产工具的观点，在新的考古发现及其解释面前已经不再成立了。依照历史学家陈振中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过程中，青铜曾经大量用作

① 历史学家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系统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②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见《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页。

③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其观点集中表达于书中首尾两篇论文，尤见第19、488、495页。张光直的文明连续性假说在国内史学界颇有影响，著名学者如李学勤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第41页。

工具。例如,在距今约四千年的齐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发掘中,就出土了不少铜镰、铜斧、铜钺等各类工具。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有许多铜制工具的发现。^①

然而,正如陈振中旋即提到的,在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之初,虽然青铜已用作生产工具,但由于青铜的制作十分昂贵,还无法完全排挤木石工具。历经三代,总体上还处于青铜与木石工具并用的时期。^②在这种限制下,原始种植业虽能有相当发展,但生产率仍较低下。一方面,生产出来的剩余虽有一定规模,但除非运用政治手段将这些剩余在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范围内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否则并不足以提供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农业是在黄土低地区域发展起来的沟洫农业,水患一直是限制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治水,也需要集中大量剩余。《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作者指出,“当时大规模开发黄河流域的低平地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农田沟洫系统,为了维护这种公共经济职能,不能不限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土地公有私耕的农村公社的建立,这就是原始的井田制。”^③在井田制的基础上,氏族成员在公田的助耕担负了为共同体提供剩余的任务,这些剩余在广大的社会范围内被集中起来,并使大规模的治水成为可能。这就带来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国家的最初形成的故事。

在禹之前,其父鲧就曾担任治水的总指挥,但因采取筑堤堵截的老办法,没有取得成功。禹总结了经验,采取因势利导、疏浚排洪的方法,才得以顺利治水。大禹治水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原始沟洫农业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经济部门的地位得到了巩固。^④

禹的成功以取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为前提。正如前文指出的,这种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集中和利用剩余的权力。《史记·夏本纪》说,禹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

① 陈振中认为:“从地下出土物来看,我国从公元前3000纪出现青铜工具以来,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夏、商、周三代持续增长。已知出土战国以前的青铜工具在5862件以上。主要有削、刀、锯、凿、锛、钻、锥、鱼钩、斧、铤、钺、耒、耜、铲、锄、耨、铎、镰等。既有手工工具,也有农具,数量较多,种类齐全,形制多样。这说明我国古代使用青铜工具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暂短的;而是大量的,逐步发展而持续增长的,形成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见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4页;另可参见该书第25~28页的进一步讨论。不过,陈振中在其著作里并未提及张光直及其文明发生的连续性假说。

② 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6页。

③ 董凯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第48页。

④ 汉初的陆贾曾这样描述了禹的功绩:“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植谷,以用养民。……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陆贾:《新语·道基》,转引自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第256页。陈振中认为,“这是对治水的缘起及与农业密切关系的确切说明。”(第256页)

土”。这意味着，禹的权力不仅针对着氏族公社的成员，而且针对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禹的这种权力，最初是由共同体的公共职能派生出来的，但通过治水，以禹为代表的氏族贵族进一步攫取或侵占了剩余的支配权，并将治水最终改造成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的经济职能。^①在治水之后，禹曾号令部落首领会盟于会稽，但防风之君来得太迟，遭到禹的处斩。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伴随治水的成功，禹的权力，也从一个部落联盟领袖的权力，演变为垄断了暴力镇压职能的国家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使其最终得以侵占共同体的剩余支配权。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就成了第一个“以天下为家”的世袭王朝夏的开国之君。

在古代中国文明之初，即在夏、商、周三代，存在着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的国有制，这种土地国有制是由原始氏族社会的土地公有演变而来的。三代以铜制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有限，既不能使农村公社瓦解，也不允许私人地主阶级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得大规模的剩余，唯一途径便是以共同体的名义将剩余在相当大的社会范围内集中起来并加以支配。通过完成治水这一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职能，禹做到了这一点。统治阶级一旦拥有了集中支配剩余的权力，便会利用这一权力侵占这些剩余，并将原始氏族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改变为统治阶级的土地国有制（或者更准确说来，是土地由国家所有、各级统治者实际占有的集体所有制^②）。在这种制度下，由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农村公社也演变为“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各级统治者利用这种基层组织对直接劳动者同时进行政治的统治和经济的剥削。^③

陈振中在分析上述变化时，在概念上区分了变革的两种途径，即来自“上端”的变化和来自“下端”的变化。前者是指，管理公社事务的氏族贵族向侵占公社财产、榨取公社剩余的方向发展；后者是指，公社成员向贫富分化和个体私有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人成为富有的阶级，另一部分人受其役使。陈振中指出，在夏、商、周三代，这两端的发展并不同步，而是“上端发展迅速，下端迟缓”。其原因何在呢？

这种以上端发展为主的过渡和发展，是与生产力的特性及其相对低下的水平相联

① 恩格斯：“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施密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04页。

② 笔者认同如下观点，即当时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和宗族占有制”，这也被称为宗法或领主封建制，见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320页。

③ 参见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2章，尤见第334、322、325页。

系的。首先,在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剩余的生产非常有限,还不足以造成迅速而普遍的贫富分化和向个体私有经济的过渡,这就使得农村公社作为必要的生产组织得以长期持续存在。^①其次,由于当时的低地沟洫农业以治水为条件,这就为氏族贵族通过担负共同体的经济职能而侵占和攫取剩余创造了便利,进而造成“上端发展迅速”的现象。由于变化主要是在上端即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在其下端的劳动组织中,便出现了文明发生过程中具有典型性的“连续性”现象,即发源于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在中国上古阶级社会的长期延续。张光直虽然倡导文明发生的连续性假说,但对农村公社的长期延续这一现象缺乏分析,反而把目光投向了萨满教或巫术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在整个三代,农村公社一直与井田制和耦耕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战国之际,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才濒于瓦解。在考察农村公社的性质时,有时会碰到这种观点,即认为它只是原始氏族公社的残留。这种观点忘记了,氏族公社所通行的,是其成员间的原始的血缘关系,而在阶级社会的农村公社里,所流行的是依照等级制度重构的血缘关系。^②至于井田制和村社制度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学家杨宽曾有如下论述:“进入古代社会以后,贵族把这种村社的土地制度加以变革,使之成为剥削的一种手段。原来的共耕地,称为‘公田’,或者称为‘籍田’,这时被贵族占有,并加以扩充,作为剥削集体耕作劳动的一种方式,称为‘助’或‘籍’。原来村社长老主持的春耕仪式,也被改造成为‘籍礼’,变成统治者监督从事无偿集体劳动的一种礼制。原来分配给各户的份地,称为‘私田’,也还保留按年龄受田、归田和定期重新分配、调换田地的制度。但是,这时的村社组织,已被贵族利用作劳动的编制,实质上已经成为服役的单位,使得再生产在悲惨的条件下进行。因此井田制尽管保留有村社及其土地制度

① 童书业:“周代早熟性的封建社会,是建筑在比较低的生产力之上的。我们知道,在春秋中期以前,还不曾用铁器和家畜耕田(至少铁耕与畜耕极不普遍),耕种方法采用人力的‘耦耕’。这种幼稚的农业技术,只有施用在黄土平原上,才能收获相当数量的生产产品;……因此,一般生产的落后便成为必然的情况,战国以前中国广泛存在农村公社的真正原因实在于此。”见《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华书局,2007,第179~180页。

② 在研究周代的宗法制时,历史学家金景芳指出:“周代的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很明显,它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存在和演化的反映。不过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和阶级社会的血缘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氏族社会民主的基础,而后者则成了阶级社会专制的工具。”“统治阶级重新利用了这一使氏族社会延续了无数世代的有力纽带——血缘关系,把它改造成了完全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有完整的体系和严格等级的宗法制度,……因此,周代宗法制度的本质,已经不是古代那种平等的血缘关系,而是血缘关系遮掩下的不平等关系,即阶级关系。”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142页。金景芳主张夏商周三代属于奴隶制,因此将周也作为奴隶制社会看待。但撇开这一点不论,此处对血缘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被利用和改造所做的分析,则是颇有见地的。

的形式,实质上已经不是原始的村社及其土地制度。”^① 陈振中也指出,具有农村公社性质的原始形态的井田制在进入文明历史后产生了质的变化,其所保存的农村公社形式的一面是次要方面,后者也不都是一仍其旧,而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农村公社的主要经济活动,如统一规划耕地和水利排灌系统、定期分配耕地等仍继续进行,但土地的农村公社公有已变为统治阶级国家的国有,因此,农村公社“首先是国家借以管理土地、户口,催交赋税、征调力役的基层政权组织。”^② 村社制度的这种经过改造后的持续存在,解释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性”,即在刚一进入阶级社会时,通过建立在这种村社制度上的超经济剥削,抑制了奴隶制的普遍发展,转而进入了宗法—领主封建制的漫长阶段。^③

以上讨论表明,在古代中国文明的发生过程中,生产力在双重意义上起着作用:一方面,以沟洫农业和共同体治水能力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文明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特性及其相对较低的水平,则有助于解释在这一历史过渡中某些具有连续性的方面。准此,张光直在强调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连续性时,完全排除来自生产力的影响,就是错误的。在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时,连续性的方面(如村社制度的延续)和非连续性的方面(政治制度的变化或“家天下”的出现)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在非连续性变化的基础上,才能解释连续性的方面,进而完整地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过程。

设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可以成立,在判断一种生产方式的先进或落后时究竟应该采纳什么标准的问题,也就变得迎刃而解了。近年来,在一些学者之间开展了争论,焦点是在判定一种生产方式的优劣时究竟应该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准,还是以生产关系的性质为标准。^④ 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是与所谓生产型生产关系(即旨在促进相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关系)相匹配的,因此在这种场合,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是统一的。如果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

① 杨宽:《重评1920年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辩论》,《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第29页。

② 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21页。

③ 童书业:“所谓早熟的封建制度,就是对公社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以赋税或贡纳代替地租,于是从周天子、诸侯到士,都变成了封建贵族。”《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178页。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过早成熟的特点,历史学家嵇文甫在1951年时留有如下评论:由于大量相当于农奴的“庶民阶层的存在,所以才一方面限制了严格奴隶制度的大规模发展,使东方历史不能出现一个像希腊罗马那样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另一方面却又促成封建制度的早熟,使东方历史上拖拉出一个漫长的封建时代”。见童书业《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新建设》1951年第四卷第1期;该文收录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第73页。

④ 相关争论可参见卫兴华《评机械生产力决定论、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对汪海波先生观点的评析》,《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汪海波《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7期;等等。

标准出现矛盾,那一定是因为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中,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应的榨取型生产关系占据了显著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取生产关系标准来判断生产方式的优劣。需要指出的是,采用生产关系的标准判定一种生产方式的优劣,同时也意味着改变生产关系业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因而这两个标准归根结底是统一的。

不过,还存在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情况。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和阶级关系相脱离的中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可以遇到若干种互不相同的生产力概念,如劳动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乃至人类的生产力^①,这些不同的生产力概念并非无条件的是等价的。如果我们进一步以生产率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会形成不同的生产率概念。正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鲍尔斯等人指出的,生产率的完全中性的增进意味着产出和生产中使用的每一种投入量的比率都有所提高,这些投入包括劳动时间、劳动的实际付出、自然环境、中间产品、资本品等。假设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当其他一切条件保持不变时,通过引入半自动化装配线增加了每小时产出,且同时无须提高劳动强度,这种技术变革便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如果装配线的引进使雇主得以提高劳动强度,从而使工人的劳动付出较产量有更快的增长,则装配线的引进就是一项缺乏效率的技术变革,尽管它会增加企业的赢利能力。^②与此类似,如果增加产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消耗更多自然资源而实现的,那也属于缺乏效率的技术变革。在这些情况下,运用生产力标准就要十分慎重。由于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未必和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相一致,反对片面注重生产力标准,提倡兼顾生产关系标准,就可能是合理的。

第二节 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作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动力

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一经形成,便面临着以下问题,即除了生产力系统的自主变化外,还有哪些直接历史原因,会造成相对剩余劳动比重的增长(以及相应的绝对剩余劳动比重的递减),从而推动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使之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大体而言,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

① 马克思:“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第124页。在下面这个简短的句子里,马克思竟然同时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生产力概念:“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63页。

② 参见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94页。

两类最主要的直接历史动因，而这两者又往往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①为此我们想提出一个成本－收益模型，借以分析两种剩余劳动及两种生产关系的消长与这两类动因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制度分析中使用成本－收益模型，始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不过，与诺思所代表的分析传统不同，笔者愿意指出，成本收益分析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特定阶级属性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林岗教授的意见，他曾中肯地指出：在不同的集团和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对于制度成本及其收益的一致评价标准，因而并不存在与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级的划分完全无关的中性的制度报酬。基于此种考虑，林岗批判了诺思的制度报酬递增理论，认为制度报酬递增在诺思那里是一个没有得到明确定义，因而也不适用的概念。^②在笔者看来，林岗的这一批判意味着，若要发展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不仅要清晰地界定成本、收益概念，而且要在这种界定中体现阶级利益的分野。为此，笔者建议将制度收益界定为在特定制度下，通过绝对剩余生产和相对剩余生产所带来的并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全部剩余。^③另一方面，制度成本除了通常所说的与产权界定相联系的交易成本以外，还包括统治阶级为了保卫特定的剩余榨取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付出的成本。

对既定生产方式的保卫包括两个维度，第一是对外的维度，第二是对内的维度。对既定生产方式的内部保卫，是在剩余被个别阶级垄断后而产生的。卢卡奇在其本体论著作里就这种保卫写有如下评论：“一个新的、同样是有机界中所没有的范畴进入了人的存在之中：对生存的保卫不再仅仅以保卫一定的人类集体本身以及其中的个人的生存为目的……，而是转向了‘内部’，变成了对一定的经济形态的保卫，保卫这种经济形态不受这样的人的侵害，他们由于自己的生存的根本原因，在自己的‘内心中’不可能赞成这种经济形态的结构，不可能赞成这种经济形态的职能，因此，他们必然

① 阶级和阶级斗争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直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以卢卡奇为例，在其本体论著作里就写道：“经济发展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改变作用，比经济发展本身同任何其他局部整体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改变作用都更加强大。”“在经济发展自身所引起的革命危机形势中，究竟是这个阶级还是那个阶级取得胜利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担对社会的组织工作（即促进或者阻碍具有一定经济影响的趋势），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把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加以比较，那我们就会看到，——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里所产生的具有鲜明差异的发展方向。”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266～267页。

② 见林岗《诺思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收入林岗《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223～224页。

③ 诺思有时也将制度报酬理解为统治阶级取得的租金，参见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3章第3节。

不断地被看作这种经济形态的潜在的敌人。”^① 这样一来，对统治阶级而言，敌人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的敌人，即其他具有敌意的国家；另一类是内部的敌人，即被统治的阶级。用于防范内外部敌人所付出的成本，既不能转化为投资，也不能为统治者消费，只能作为剩余的扣除。当代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还发现，在美国，单纯从事内部保卫的人员在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在整个20世纪持续增长，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超过了20%，2002年时竟高达26%。^②

可以通过图3-2形象地表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看到，与绝对剩余生产相对应的生产关系虽然开始时会带来制度收益递增，但由于这种类型的收益增长建立在单纯剥削的基础上，容易引发和加剧阶级冲突，加之还要支付对外防卫或战争的成本，在长期内将服从收益递减规律，甚至在危机时刻（如战争和革命），收益还会锐减为负数。与之相反，与相对剩余生产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将剩余的增加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这就使其更容易支付对外保卫的成本，并有条件通过缓解阶级冲突降低内部保卫的成本，从而在长期内服从收益递增规律。对某一既定的生产方式而言，其最终的成本-收益结构，取决于两种剩余生产方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在该生产方式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一个生产方式能在长期内决定性地提高相对剩余生产所占的比例，则该生产方式就会取得明显的制度绩效。相反，如果一个生产方式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会使总的成本-收益结构出现恶化的局面，即服从于收益递减趋势，从而为制度危机铺就道路。

关于阶级斗争在促成生产方式的有机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可以通过历史实例来说明。我们首先选取的是自秦统一到其被汉取代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秦简。历史学家在研究了睡虎地秦简后惊异地发现，在秦统一前后，除了通常了解的由商鞅改革所带来的封建地主经济外，秦国还存在着大规模的国家奴隶制，即所谓隶臣妾的制度。隶臣妾是为国家控制、并在国有部门内使用的生产奴隶，其来源为刑徒和俘虏。有趣的是，大规模使用隶臣妾的那些经济部门，也正是秦国在生产力上十分先进的部门，如铸造、油漆、陶瓷、织布、皮革制造、交通运输等。历史学家王子今曾在其论文里详细分析了秦在水利、交通运输、机械发明等方面所建立的相对于六国的经济优势。^③ 这些部门多半是使用奴隶劳动的国有经济部

①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262页。他还说：“特别是自从产生了奴隶制以后，每个人类集体必须保卫内部的社会现状，而且战争也提出了必须在获得奴隶还是使自己沦为奴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个问题，这样，人们在开展活动时，设定目标和确定方法这两者才发生了鲜明的分化。”前揭书，第254页。

② 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孟捷、赵准、徐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38页。

③ 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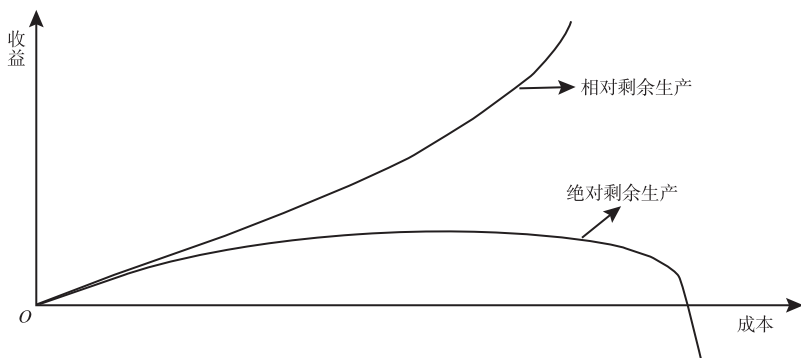


图 3-2 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门。在评价秦的这种国有奴隶制时，李学勤认为，和六国相比，秦的这种奴隶制是非常野蛮而落后的制度。^①但据另一位历史学家叶山分析，这种国家奴隶制以及它所确立的经济优势，是秦最终得以战胜六国的决定性因素。^②

然而，在秦统一并将这一包含奴隶制的混合生产方式推广到全国后^③，却没能维持多长时间，反而很快便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最终颠覆了秦王朝。在这以后，继续通过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来集中和攫取剩余的方法，就难以再现了。秦以后的两汉统治者，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击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工商业者。^④汉儒董仲舒以及日后篡汉的王莽，都曾激烈地抨击秦自商鞅变法之后新出现的奴隶制度。^⑤这类批评代表了自秦向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在经济意识形态上，汉初还出现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主张在经济上自由放任，也就是削弱绝对剩余劳动的所

①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91页。

② 叶山：《古代中国奴隶制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31~32页。不过，需要明确的是，隶臣妾制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秦的生产方式可以归结为奴隶制。在秦统一前后，其生产方式是国有部门的生产奴隶制和私人部门的地主封建制的混合（且以后者为主）。这两者都是在商鞅的改革后形成的。在地主封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被称作“农战”的举国战争体制。因此，秦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是由多方面因素型塑的，而不宜片面强调国家奴隶制的作用。

③ 郭沫若曾提出，“秦始皇把六国并吞之后，把六国已经解放了的自由民又转化为奴隶，而用刑徒、亡人、赘婿、奴产子等从事大规模的苦役：筑长城，戍百越，建阿房宫，筑驰道……动辄都是几十万人。”见其《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7页。但是，正如孟氧教授指出的，郭沫若后来不适当地放弃了这一原本正确的观点。见孟氧《郭沫若古代史分期见解初探》，载《孟氧学术文选——史学卷》，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第130页。

④ 参见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63~164页。

⑤ 王莽：“秦为无道，……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颠断其命。”见《汉书·王莽传》。在《汉书·食货志》里能找到董仲舒的类似意见。历史学家黄现璠认为，王莽的话证明，奴婢市场是秦代的新事物（见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3页）。有趣的是，在睡虎地竹简问世前，除了董仲舒和王莽提供的材料，在古文文献里似乎找不到其他有关秦在商鞅变法后存在大规模奴隶制的论据，以至于当时的史学家对董仲舒和王莽的意见多不敢采信。

谓“黄老”学说。因此，自秦到汉，借助于阶级斗争的作用，完成了一段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要注意的是，这种变迁不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西周以来的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转变。使这一转变变得复杂的是，除了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这一主流外，在战国时期（以秦为典型）还形成了奴隶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流行这一支流。^①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意义在于，它最终埋葬了与地主封建制杂交在一起的国家奴隶制，并使私人生产奴隶制的存在也日益变得不可能，大大降低了统治阶级利用绝对剩余劳动汲取剩余所占的比重，使得地主封建制这一更为进步的生产方式得以按较为纯粹的形式而发展。

阶级斗争在促进一种生产方式向有机生产方式转变中的作用，还可以透过马克思对北美内战的分析略见一斑。19世纪上半叶北美南部蓄奴州的兴盛，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携手并行的。资本主义在北美的早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制。^② 这种依赖关系类似于中国古史中地主封建制在战国初兴时伴随着奴隶制的出现。但逐渐地，和中国古史中奴隶制与地主封建制最终又发生矛盾和冲突相类似，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这种依赖关系也最终演变为双方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由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要求不断扩张其领地，对北方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必然会造成挤压；而奴隶制的本性又不受肤色的限制，除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外，其他种族（或民族）劳动者的经济地位也势必会因奴隶制的扩张而受到威胁；此外，在南部蓄奴州，因大种植园的扩张还造成了许多缺少土地的白人贫民，他们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利益也是对立的。马克思写道：“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③ 北美内战割除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不相容的野蛮奴隶制度，决定性地降低了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体的经济中绝对剩余劳动所占的比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摆脱羁绊，顺利地向前发展。作为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例子，在内战爆发前，北美两大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制度收益是不同的，奴隶主阶级试

① 童书业曾指出，在从宗法或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过渡中，伴随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奴隶制在战国时期一度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但和已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制度相比，这种奴隶制只是局部的现象。见童书业《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417页。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奴隶制在秦的显著存在，以及童书业关于这一时期奴隶制仅具有局部性的判断。

② 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里，马克思写道：北美奴隶制“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1~22页。

③ 马克思：《美国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65页。马克思的分析还见于收入该卷的另一篇文章《北美内战》。

图通过扩大奴隶劳动的领地以增加其剩余,但这显然提高了资产阶级的制度成本,既有压缩其市场的可能,也危及劳动市场的供给。

但要强调的是,在涉及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时,不能过高估计阶级斗争的意义。要在一种经济社会形态中根本地提高相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毕竟还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所提供的条件为基础。以古代中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和牛耕的渐次普及,为整个社会向以小农为主体的地主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过渡奠定了技术基础。在地主封建制后来发展得较为充分的秦国,牛耕的普及和铁器的使用都比较早,生产力水平在当时属最高之列。^①因此,尽管政治因素乃至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最终实现仍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所提供的条件。^②

上述讨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个老的话题,即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究竟谁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有趣的史实是,早在1919年5月,李大钊在为《新青年》写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其阶级斗争学说存在冲突,前者将生产力作为历史的原动力,后者又认为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③应该承认,在历史中,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有可能是彼此冲突的,这体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可能带来文明和生产力的倒退。《共产党宣言》就承认,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只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还有可能带来斗争双方的毁灭,这种毁灭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文明成就的破坏。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有理由将阶级斗争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即那种直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阶级斗争,以及对生产力单纯起破坏作用的阶级斗争。前者可以命名为**有机阶级斗争**,这一类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它们成功地利用了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通过相应的制度变革,使剩余的增长更多地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从而提高了相对剩余生产在整个生产方式中所占的比重。

可以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找到一个有机阶级斗争的典型例子,这便是“二战”结束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劳资协议”(Capital-labor Accord)。在法国调节

① 关于牛耕较早普及于秦,见董凯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第50页。关于秦在春秋时较早采用铁器,见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第27、384页。有趣的是,尽管秦的生产力发展较快,但商鞅变法的时间相对于列国却较晚,这证明了生产力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参见白云翔上引书,第384页)。

② 下述著作提出,战争是春秋战国时期推动列国变革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这部著作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强调了战争的意义,忽略了生产力发展和各国内部的阶级冲突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变革中所起的作用。

③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1919年第5、6号。转引自吴江《论历史发展的动力》,载《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155页。

学派和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分析中,这种劳资协议是由一系列制度型式构成的,其中最为核心的制度,是实际工资以劳动生产率进步为参照而增长,以及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作为一种历史制度分析,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但他们的分析有一个严重弱点,即在强调阶级斗争和制度变迁的关系的同时,相对忽略了生产力的因素,具体而言,就是相对忽略了在二战后出现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与同时期阶级斗争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忽略,在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中,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单纯以阶级斗争格局的变化解释资本积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点。在他们看来,劳资协议在其最初形成时,有利于保障工人阶级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改善资本家的预期,促进投资增长,进而形成了调节学派所谓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依照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形成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的积累体制。然而,这一积累体制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工人阶级谈判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工资份额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迅速提高,这就压缩了利润份额,降低了利润率,进而诱发了波及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1974~1975年的危机。^①

在笔者看来,导致战后劳资协议的形成和黄金年代出现的根源,除了阶级斗争形势的改变,还取决于技术革命带来的有利环境。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为投资和生产率的持续高涨提供了可能,战后劳资协议的形成实际上利用了生产力革命所提供的这种有利条件。20世纪50~60年代,伴随技术革命生命周期的演化,投资以及生产率增长逐渐开始减速,在工资依然按照制度惯性继续增长的前提下,最终造成了不利于利润份额的变化。因此,1974~1975年危机的爆发是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衰落相联系的,围绕国民收入分配的阶级斗争也是在这种衰落的前提下转趋激烈的。在这场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两国最先崛起,全球资本积累进入了新阶段,这一转变可以解读为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改变阶级力量对比,对相对剩余劳动和绝对剩余劳动所占比例的再调整,这一调整以削弱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增长为代价,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剩余价

① 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侧重于以阶级斗争解释积累周期的变化,对其观点的批评可参见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第107~112页。调节学派将二战后黄金年代看作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的积累阶段,这大体是正确的。但他们进而把这一时期和此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立起来,尤其是把整个19世纪都作为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的积累阶段,这就引发了布伦纳等人的批评,在后者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工业革命结束后资本主义各个不同阶段的普遍特征。参见, Brenner, R., and M. Glick,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1991, No. 188, pp. 54-75。在笔者看来,一个协调这两种观点的办法是,承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比重在不同阶段是变化的,相较于19世纪,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二战”后的“黄金年代”无疑占据着更为突出的位置。

值率的空前增长（参见图3-3）。^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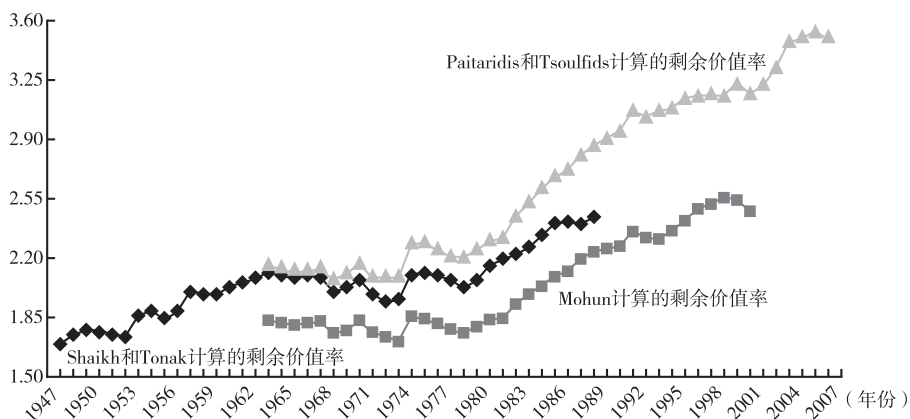


图3-3 美国的剩余价值率

资料来源：Paitaridis, D., and L. Tsoulfidis, “The Growth of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Phase-Change of the U. 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2, Vol. 44, No. 2, p. 222, Figure 4。

与阶级斗争具有同样重要性，并且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另一个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动力，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战争之所以成为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和经济本身在人的物质生活再生产中的“同根性”。^②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对每一个共同体而言，除了劳动之外，战争就是攫取剩余、占有共同生存条件的另一手段。马克思为此曾指出：“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③ 战争的这种经济意义使其相对于其他因素更容易造成对既定生产方式的冲击。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即将一国在战争中受到的压力转换为制度调整的动力，进而推动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取决于统治阶级世界图景的转换和制度变革的能力。或许我们可以将那些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称为有机国家，以与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失败国家相区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国家的这种类型学界分可以溯源到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中，恩格斯曾概括了

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有关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及其矛盾的分析积累了数量可观的文献，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评论，可参见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② 这一提法来自卢卡奇，他写道：“马克思显然是从战争和经济在人类生命的再生产中的同根性出发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2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90页。另有：“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前引书，第475页）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几种“反作用”，认为国家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当国家权力阻碍了经济发展时，甚至可能造成整个民族经济的崩溃。^① 在这里，国家权力的作用显然不是所谓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所能解释的，它事实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尽管恩格斯晚年刻意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中，对国家权力的作用却没有在经济学上展开充分的探讨，以至于当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之后，马克思主义者被动地发现，自己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家的经济理论。

国家间竞争和国家权力对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影响，可以在近代欧洲找到一个例子。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是个典型案例，说明近代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如何推动了王权和市民阶级的结合以及剩余榨取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各国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马克思在评价重商主义时曾指出：“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替代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② 此后，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拿破仑的征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拿破仑的远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欧洲较为封建的各国统治阶级被迫进行了一场葛兰西所谓的“被动革命”（或译“消极革命”），即在既有统治者依然主导政治权力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借此提高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

这种“被动革命”的解释模式在略经修改后也有助于考察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制度变迁。^③ 甲午战争之后，恩格斯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前途做过如下预言：“中日战争意

① 恩格斯：“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间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施密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05页。马克思在讨论原始积累时分析了国家在创造资本的生存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他甚至还在拟议的“六册计划”里计划写一本名为国家的著作，但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884～885页。

③ 下述作者提出了类似观点，参见 Grey, K., “Labour and the State in China's Passive Revolution”, in *Capital and Class*, 2010, Vol. 34, No. 3, pp. 454–455。

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①但是,从清廷到民国的统治者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权力,没有能力领导一场“被动革命”,以兑现恩格斯所预言的前途。197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开展了一场事实上的“被动革命”。

第三节 戈德利耶的概念重构与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对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行分析,一个关键前提在于破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制度上的严格界分。20世纪70~80年代,戈德利耶从事了这一工作,他提出了如下假说: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并不是不同制度间的区别,要而言之,这种区别毋宁是制度的不同功能之间的区别。”^②

“下部构造(Infrastructure,在戈德利耶那里,这一术语同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而不完全等同于通常使用的经济基础概念——笔者按)和上层建筑的区别既不是层次或要素间的区别,也不是制度间的区别——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显得像是这样。就其要旨而言,这一区别是功能之间的区别。下部构造的首要性这一因果概念归根结底指的是,存在一个功能的等级,而不是制度的等级。一个社会既没有顶端,也没有底部。社会不是由各个叠加的层次组成的系统。社会是由人的各种关系组成的系统,这些关系依据其功能的性质划分为等级,这些功能决定着人的某一种活动对社会再生产所产生的影响。”^③

① 恩格斯1894年9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288页。

② Godelier, M., “Infrastructures, Societies and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8, Vol. 19, No. 4, p. 763.

③ 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p. 128. 戈德利耶的上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波兰尼下述观点的一个积极回应和进一步发展。波兰尼提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总是“嵌入”各种制度之中,而不是独立的,只有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经济才经历了一个被他称为“脱嵌”的过程(参见波兰尼《大转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关于戈德利耶和波兰尼的关系,参见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Ch. 5;另见该书p. 20) 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影响了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后者这样写道:“我乐意承认,我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M. 戈德利耶那里学到了某些东西。他们对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作了新的透彻考虑,并且把这种关系概念化。”(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6~37页)令人遗憾的是,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贡献,在国内似乎还鲜有人知。对包括戈德利耶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70~80年代围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争论,可参见里格比的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译林出版社,2012,第228~231页)。

戈德利耶据此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政治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的甚至血缘的关系和制度,只要它们在功能上直接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劳动力的配置和产品的分配,就担负了生产关系的功能。例如,在古代苏美尔的城市国家,土地被看作归神所有,人民向神庙和祭祀供奉剩余,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宗教关系事实上起到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戈德利耶笔下,原始共同体的血缘关系、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关系也都可以在功能上转化为生产关系。^①戈德利耶还指出,只要一种社会关系在功能上起到生产关系的作用,这种关系也就成为相关社会中最有决定性的力量。^②

如果政治、法律、意识形态、血族等方面的关系和制度也可以在功能上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那就必然意味着下述可能性:同一关系或制度既可以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是经济基础。^③在此意义上,作为各种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结构或基础,就不是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关系或制度相脱离的、独立的领域,而是与后者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戈德利耶还认为,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构成基础的制度和构成上层建筑的制度各自对应于特定的功能,从而产生了下述现象,即基础和上层建筑似乎可以在制度上严格地区分开来。但他又提出,这种制度和功能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在历史上只是例外。^④

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这种近乎彻底的重构,颠覆了经济决定论赖以立论的基础。经济决定论需要一个在定义上与上层建筑完全脱离的经济结构。从戈德利耶的立场来看,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经济结构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历史上的特例。而且,由于政治、法律等不同的制度型式都有可能成为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不断变化的。^⑤

如果说戈德利耶在理论上还有不够彻底之处,那便在于他所坚持的“资本主义例

① 类似的,从戈德利耶的角度来看,在古代中国,血缘关系作为农村公社得以建立的制度前提,也在领主封建制生产方式中发挥了生产关系的作用。

②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曾试图回答如下批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当代世界,却并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界,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马克思的回答是:“这两个时代的谋生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9页注释)马克思的这个回答过于简略,意旨也不够清晰。戈德利耶认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重构也是对马克思未曾解决的这一问题的解答。

③ “下部构造和上层建筑的区别不仅是制度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单一制度内部的不同功能之间的区别。”Godelier, M., “Infrastructures, Societies and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8, Vol. 19, No. 4, p. 764. 下述作者也有类似观点,见 Wood, E. M.,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981, 1/ No. 127, pp. 78-79.

④ 参见 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p. 141.

⑤ “在历史进程中,生产关系(或‘经济’)并不占据相同的位置,进而也不采取相同的形式;它们的发展方式并不一致,因而对社会的再生产也不具有相同的作用。”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p. 142.

外论”，即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经济和政治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片面理解的基础上的。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经济和政治的这种两分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自由主义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理由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波兰尼的批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理论预设，似乎是正确的。^①

戈德利耶的上述重构必然会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一直将生产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然而，如果生产关系可以涵盖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制度型式，政治经济学也将相应地失去其严格定义的、清晰的学科位置，而与其他社会科学走向融合。戈德利耶曾谈及，在解释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这一问题上，经济史或经济人类学是难以单独胜任的，甚至可以认为并不存在经济史和经济人类学，因为这里需要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社会科学研究。^② 类似的，我们或可认为，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除非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加以修改，使之摆脱学科分工的束缚），而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此意义上，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事实上复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提出的寄希望于社会科学实现综合或统一的理想，即只存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③

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尽管针对的是某种既定的经济社会形态，但也可运用于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及其向另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过渡。在此意义上，这一重构和笔者倡导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是可以接洽的。在笔者看来，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和戈德利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完整阐释。这样一种新的解释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基础。一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只是在既定前提下进行这种创造。^④ 这些前提除了生产力等因素以外，还应包括各种既有的制度型式。面对阶级斗争或国家间竞争的压力，一国若要成功地实现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无论这种变迁指涉的是向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过渡，还是在既定生产方式内部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过渡），就必须创造性地利用和改变既有的制度型式，或者开启一个制

① 参见波兰尼《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6章。另可参照本书第四章第六节的相关讨论。

② 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London: Verso, 1986), p. 142.

③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0页。

④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121页。

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使相关制度担负起切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职能。我们或许可以把那种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在概念上命名为有机国家。而上述制度变迁过程，也恰恰是这种有机国家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仅作为外在力量推动了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而且其自身的形成也是这一创造性毁灭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国家从来不在经济结构之外，而总是或明或暗地存在于经济结构之中。也正源于此，国家理论才成了一切制度变迁理论的名副其实的“王冠”。

可以指出的是，在既有文献中，大体可以辨识出三种与有机国家的形成相关的理论观点，第一种理论是葛兰西的被动革命论，这一理论一方面从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的角度，解释了一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它强调这一变迁是在大体维持既有统治阶层政治权力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对于传统制度型式向新的生产关系的创造性转化，有格外的倚重。第二种是所谓发展型国家论，它强调的是如何利用既有的国家政治权力，使之深度介入一国的资源配置，根据自身发展和赶超目标改变既有的相对价格体系，塑造本国的竞争力。^① 第三种理论则是卡尔·波兰尼的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市场的自由放任有导致社会解体的倾向，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对市场价格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以限制和约束，以达成社会保护的目标。^② 现代福利国家是这种理论观点的经验写照。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完整理论，至少是这三种（但不限于这三种）理论的结合。戈德利耶的概念重构，使这些理论有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和运用，从而为彼此的沟通和结合搭建了桥梁。

将戈德利耶的观点和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相结合而得出的上述结论，对于理解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和计划经济时代类似，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也参与构建或直接充当了生产关系，这一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剩余所有上的关系，使后者转变为具有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经济主体，由此带来了县域以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格局。第二，通过由各级政府支配的公有企业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政治权力直接决定了投资。

① 发展型国家论肇始于美国学者约翰逊以日本为对象的下述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金毅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这一理论自提出后又被其他学者运用于分析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速成长。

② 王绍光教授率先从波兰尼的理论立场看待中国的改革，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持续扩张，第二个阶段是对市场的限制和社会保护的兴起。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孟捷和李怡乐则在下述文章里运用这一框架并结合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探讨了中国劳动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见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在此前提下，政府或者直接充当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或者承担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供给，或者成为投资银行家以实现金融资产的增殖等。第三，作为事实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各级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产权及其利用方式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和关系，借以获取与此相关的各种收益。^① 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在充当或构建生产关系上所起的这种作用，使过往三十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许多有别于其他类型市场经济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不仅要解释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关系在内的各种制度型式如何参与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或直接作为生产关系发挥作用，而且要解释这些生产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生产型（或榨取型）关系，其未来演变的动力和方向如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充当或参与构建生产关系的制度型式往往具有多重属性，包含多重关系，从而无法将其明确地划归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特定的领域。以农民工制度为例，作为改革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制度型式之一，它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规则和习惯，很难将其定性为属于某个具体领域的制度，而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当代中国直接参与塑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雇佣劳动关系，在这种劳动关系中，生产者以半无产阶级的面目出现，并以用工的灵活性和低廉的单位工资成本适应了资本积累体制的需要。^②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对诺思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批判性评论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做一个比较，这一比较不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示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而且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可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迄今为止还从未实现任何领域的这种对话，笔者认为，制度变迁理论有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依照本文的观点，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生产力归根结底的作用可以在“事后”（*ex post*）而非一定在“事先”（*ex ante*）体现出来，这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为承认其他社会权力在历史发生学上的直接决定作用开辟了空间。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事后”作用不是注定能实现的；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

① 史正富教授在其著作里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过往三十年间形成的几种基本生产关系，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他的这一研究可以视为对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② 对农民工制度的经济意义及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性质的分析，可参见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区也不是以相同的形式、节奏和速度而实现的。在这里,那些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因素如何最终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以复杂的历史制度因素为中介的。为此,如何解释这些历史制度因素的作用,就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的制度经济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笔者以为,在这些问题上,以诺思和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借鉴。

在诺思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著作中,不乏一些直接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但这些评论都以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为对象,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其它解释。例如,在诺思看来,马克思的缺陷是以技术变革解释长期制度变迁,但问题是,“单独的技术变化几乎不能解释许多长期性的变革,在这些变革中,技术似乎没有重大的变化,或技术变化似乎没有要求重大的组织变革来实现其潜力”。^①类似的,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近期也写道:马克思“只强调了作为‘历史动力’……的技术和生产力,而各种制度和政治因素——例如,谁拥有政治权力、权力如何行使、怎样限制权力,等等——则被彻底忽视了”。“马克思根本没有考虑制度和政治因素,因为他认为它们只不过是生产力释放出来的强大冲击的派生结果而已。”^②在诺思和阿西莫格鲁那里,政治权力、国家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其实完全可以在一个经过重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接纳。

在笔者看来,本文强调的生产关系具有两重功能,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关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生产力而演变的自主性,为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值得指出的是,生产关系具有双重功能,且这两种功能可能彼此冲突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诺思的见解。譬如,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写道:“(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他还写道:“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③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3,第29页。

②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评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贾拥民译,《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8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15年第4期,第81、79页。

③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25页。

在这里,诺思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及其相互间矛盾的思想。诺思自己含蓄地承认,上述有关制度的两种目的及其冲突的思想来自马克思,他写道:“使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和那种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产权结构是相冲突的。这类冲突的一个变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矛盾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所有制结构和由不断演化的一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潜在收益的实现是不相容的。”^①

诺思对制度的双重目的或功能的区分,和他提出的国家悖论是相关联的。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即产权制度的界定者,既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可以阻碍这一发展,即起到相反的作用,这便是所谓国家悖论的含义。从本文提出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来看,正是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的竞争,有利于克服这种悖论,因为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类似于某种进化的淘汰机制,凡是没有能力通过制度变革引致生产型生产关系的国家及其文明,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如果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的确构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国家悖论便可在此前前提下获得解决。

历史唯物主义对诺思的影响还体现在,后者尽管不曾直接使用生产关系的概念,但构成各种制度的合约关系事实上是生产关系的代名词。在诺思那里,合约关系既包括自愿关系,也包括非自愿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把领主和农奴的关系也理解为合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交易条件明显有利于领主。在诺思看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有利于领主的交易条件的限度,以及这些交易条件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②

诺思以合约关系代替生产关系,时常成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③这类批判所忽略的是,自葛兰西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中便有一些理论,论证了生产关系表现或转化为合约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生产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往往与暴力和强制相联系。但是,任何统治和剥削的权力在强制(Coercion)这一维度之外,还往往包含共识(Consent)的维度,若缺乏后者的支撑,权力关系将难以维持。一种生产关系之所以有可能表现为相互承诺的交易或合约关系,原因概源于此。最早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的是葛兰西,他在国家理论里涉及了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

① North, D. C.,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28. 值得指出的是,诺思此书在大陆有两个译本,这两个译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些误译。鉴于诺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造成的深刻影响,其主要著作之一在大陆迄今尚未有一可信的中译本,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② 参见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26页。

③ 例如,林岗曾批评诺思将非自愿的农奴制生产关系作为合约关系,见林岗《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202页。

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美国社会学家布洛威和法国人类学家戈德利耶,分别结合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戈德利耶明确提出,在权力的两个因素即强制和共识之间,后者对于维持权力关系更为有效;而共识之所以能产生,源于下述条件:统治者有能力使被统治者确信,统治在于为被统治者提供服务,被统治者为此感到有责任以自己的服务换取统治者提供的相应服务。“对于统治和剥削关系的形成和长期的再生产而言,这些关系必须表现为一种交易,表现为服务的交易。正是这一点建立起那些被统治者的主动或被动的共识。”“倘若不是采取服务的交易的形式,没有一种统治,即便是从暴力诞生的统治,能够持续下去。”^①

合约关系作为权力关系(或生产关系)的转化或表现形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压迫性的权力关系,而是与之并存,并使后者采取了使社会紧张相对舒缓的形式。生产关系向合约关系的这种转化,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观念形式的出现。这些观念形式或意识形态,表达了当事人对双方之间交易或合约关系的性质、目的和内容的理解。没有这些观念形式或意识形态,这种交易或合约关系就无法被组织起来;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形式和意识形态同时也发挥了将既有权力关系合法化的作用。

戈德利耶(以及布洛威)的缺点是,他们较充分地讨论了生产关系表现或转化为合约关系对于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性或意义,以及观念形式或意识形态在这种转化中的作用,但相对忽略了生产关系转化为合约关系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转化为合约关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这种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这种生产关系的生产性,换言之,取决于既定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将剩余的榨取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物质利益正和关系。这种物质利益正和关系是建构上述交易或合约关系的根本条件,也是维持或再生产一种生产关系的根本条件。^②

上述在葛兰西、戈德利耶、布洛威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深入讨论的思想,在诺思的理论中被转换成了具有新制度主义特色的话语。在诺思那里,产权制度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才能有效地运作,因为意识形态有助于使现有产权制度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人们的内心得到尊重,从而降低产权的实施成本即交易费用,用他的话说,

① Godelier, M.,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English trans., London: Verso, 1986), p. 160, p. 161 (重点标识是原有的)。另见 p. 157, 戈德利耶还提出:生产关系向合约关系的这种转化,有助于“限制对野蛮的力量和身体暴力的运用,无论这种暴力是统治者的压迫性暴力,还是被统治者的反抗性暴力。”(p. 164) 戈德利耶认为,甚至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也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合约关系,他写道:“暴力和合约相结合,以造成奴隶生产关系的运作和再生产。”(p. 165)

② 笔者在下述论文里从这一点出发对布洛威的理论做了批判的分析,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探讨了这种正和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条件。见孟捷《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一方面,“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与该制度的被体认到的合法性(the perceived legitimacy)负相关”(可解读为,这种合法性越高,制度成本便越低);另一方面,“引导人们成为搭便车者所必需的报酬与对现存制度的被体认到的合法性正相关”(即合法性越高,“搭便车”的可能越少)。^①

尽管意识形态理论在诺思的体系中显得非常重要,但若考虑到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诺思在这一理论上的独创之处其实所剩无多。诺思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较其目光短浅的新古典同行而言,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当代社会科学也拥有相当广博的知识。诺思身上的这种“比较优势”使其有可能为自己设定如下任务,即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等因素,以分析制度变迁。在意识形态理论上,诺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想以意识形态理论解决所谓“搭便车”的问题,但细究起来,这个问题不过是在以个人功利主义计算为前提的纯粹新古典框架内才会生发的问题,因而并不具有超出新古典范式以外的普遍意义。^②

诺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某些相似或相通之处,但两者之间毕竟存在根本的差异。诺思对新古典范式虽常有批判,但这种批判只是为了拓宽后者的分析范围,增强这一范式的生存能力,因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发动的批判。一方面,诺思顽固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经济科学的成就,放弃这一理论等于放弃科学本身;^③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具有如下劣势:“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并未在一个包含社会、政治和哲学(更不必谈形而上学)理论的包罗万象的框架内而发展。其结果是,在面临各种条件的变化时,要维持和取得各个集团对它的忠诚,面临着严峻的困难。”^④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诺思试图把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内容,即制度、产权、国家、意识形态,一概引入其分析

① North, D. C.,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53, p. 54. 顺便指出,诺思这一著作的两个大陆译本在翻译这两句话时均有严重错误。

② 诺思:“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团体在行为上与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因为无论是维持现有的秩序,还是推翻现存的秩序,都不可能离开这种行为。”North, D. C.,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53.

③ 诺思:“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提供一个严密的、合乎逻辑的分析框架,已经使经济学成为卓越的社会科学。放弃新古典理论便是放弃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挑战在于拓宽新古典经济学的视界,以便把握这些问题。”North, D. 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8, Vol. 16, No. 3, p. 963.

④ North, D. C.,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53.

的架构中来, 以使其和马克思主义一样, 具有综合政治、社会、哲学等各方面理论的能力。从具体方法来看, 引入交易费用概念, 是达成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正如诺思所指出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世界里, 只存在唯一一种制度, 即作为交易体系的市场, 在这一前提下, 交易费用等于零。一旦引入与产权界定相关联的正的交易费用, 就可以在理论上进入原本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现实世界。正如他所说的, 通过“把新古典分析的范围扩大, 把交易费用包括在内, 就能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途径, 通过它就可以分析经济组织, 并探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一个经济的生产潜力之间的冲突”^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主题, 经过诺思这样的处理, 现在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

那么,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 是否真的能胜任这一任务呢? 诺思始终坚持, 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能的解释。诺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固执或独断尤其体现在, 在他眼中,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描述, 和新古典增长模型是完全一致的。^② 诺思在此全然忘记了, 同样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熊彼特 (以及后世的演化经济学家) 体认到, 新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纯然是静态的资源配置理论, 并不适合分析以创新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涉及企业 and 国家这两项制度, 让我们简单考察一下诺思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在诺思 (以及新制度经济学) 看来, 工厂制度出现的原因在于削减了交易费用, 从而降低创新成本, 推动了生产率进步。^③ 然而, 一个基于熊彼特或马克思立场的理论家, 马上便可提出以下问题: 为什么企业存在的原因一定要通过削减交易费用来解释, 而不是与价值创造相联系呢? 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将诺思与美国学者拉佐尼克作个对比。拉佐尼克是一位同时受到马克思和熊彼特影响的经济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创新性企业的理论, 并从这个理论出发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在拉佐尼克那里, 生产性组织可以通过内部计划对专业化分工加以协调, 并借此开发创新所需的生产性投入, 但这样一来, 势必要投资于管理结构, 从而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成本, 即提高交易费用。拉佐尼克指出, 对企业而言, 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于能否依靠其组织能力实现钱德勒意义上的速度经济, 使投资于高额管理成本而带来的劣势, 转变为生产率增长的优势, 从而实现创新和价值创造。^④ 拉佐尼克的这个理论, 和马克思在《资本论》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第69页。

② 诺思写道:“统治者界定的所有权结构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所指的效率标准相一致”, 解释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见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第29页。

③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第190、180页。

④ Lazonic, W.,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Market Economy* (CUP 1991)。尤见该书第九章对诺思的批判。

里勾画的企业理论一样，都将价值创造看作企业存在的目的，区别只在于是否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这种价值创造。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但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诺思从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企业之所以存在和生产率进步的原因，虽然和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是一个进步，但只描绘了一幅片面的图画。

在诺思那里，国家的作用在于重新界定产权，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理论中，国家似乎显得非常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只限于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经济体系回归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所设想的虚拟世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一方面假定国家在市场中不起积极的作用（所谓中性国家），另一方面排除了熊彼特意义上的生产性组织。然而，任何理论如果将这两项关键制度（即国家和创新型企业）放逐于市场之外，就无法真正解释现代市场经济及其效率。诺思虽然表面上重视国家对于制度供给的作用，却服从于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即将经济（或市场）和政治截然两分，不仅从市场中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而且排除了由市场内生的具有垄断性的其他非对称权力。这样一来，在诺思（以及后文还要谈到的阿西莫格鲁）那里，国家除了界定产权、监督合约的实施以及提供某些公共品以外，在市场中便无其他积极的作用。这种理论最终和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理论达成了关键的一致，不仅难以解释凯恩斯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无法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方法论上看，诺思采纳交易费用概念的最终目的是在理想的新古典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搭起一座可沟通的桥梁。交易费用概念是为解救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而提出的，因而所担负的主要是克服范式危机的任务，至于这个概念在含义上太过模糊，在现实中难以操作和计算，对诺思而言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如果有人只看到这一问题，进而批评交易费用概念本身，那是没有理解这个概念所担负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危机的“救世主”的角色。即便交易费用概念永远无法获得准确的定义和度量，旨在扩大自身解释力、争夺意识形态霸权的新古典经济学也需要这个概念，因为依靠这个概念它的一只脚就能伸进现实世界。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诺思自以为是在科学意义上探讨意识形态问题（他有发展“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这样的提法），却浑然忘记了，他赖以开展这种分析的理论本身，其核心内容（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披着现代科学外衣的“神学”。^①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约翰逊最近出版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我们全面考察其理论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在这部著作里，作者总结了自己在过往十余年间所做的研究。对笔者而言，

①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神学性质的分析，可参见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弗里的下述著作，Foley, D. K., *Adam's Fallacy: A Guide to Economic Th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观点,无疑当属包容性制度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阿西莫格鲁等人区分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并将其进一步界分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四种类型的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四种制度的不同组合。在阿西莫格鲁等人看来,政治决策过程和政治制度在决定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只有包容性政治制度才能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相匹配,并带来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这些见解进一步发展了诺思的观点。

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对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界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不仅区别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而且将两者对立起来。第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包容性市场,在理论上,这一市场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用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话来说,这一市场“不仅给人们追求最适合他们才能的职业的自由,而且给他们这样做的平等舞台。有好想法的人可以开公司,工人可以选择生产率更高的活动,低效率的企业会被高效率的企业取代”等。第三,与前述特点相对应,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概念预设了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解,在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那里,这一作用大体类似于斯密的“守夜人”,不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有时也暗示了国家的更为积极的作用。^①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界分,与诺思的思想是大体一致的。^②这一对概念和本文采用的另一对概念(即生产性/榨取性生产关系)表面上看是类似的,但细究起来,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阿西莫格鲁等人那里,包容性经济制度在定义上过于依赖一组特定类型的制度(如私人产权和包容性市场),因而忽略了下述可能性,即这些特定类型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未必一定导致令人满意的增长绩效。对阿西莫格鲁等人来说,一个难以面对的事实是,一些看似具备了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出现更优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个典型例证是将印度和中国比较,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其增长绩效都优于同时期的印度。和阿西莫格鲁不同,本文采纳的与相对/绝对剩余生产方式分别对应的生产性/榨取性生产关系,在定义上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制度,而只取决于各自的功能(即是否能将剩余的获取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这种界定方式反而使这对概念有可能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获得更为广泛而灵活的适用性。

第二,根据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界定,市场和国家(或者经济和

① 参见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第52~53页。

② 诺思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提法,与包容性制度的概念意义类似,见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13页。

政治) 依旧是截然两分的不同领域。而参照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 政治权力可以参与构成或直接充当生产关系, 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因而是相互包容和彼此渗透的。这一观点在解释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时, 具有格外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 在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著作里, 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互相排斥的, 这一观点低估了下述可能性, 即这两者有时是可以并存的, 并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可能性意味着, 某类制度型式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具有包容性, 在另一背景下则可能具有汲取性。阿西莫格鲁对这两种制度的截然两分, 事实上美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低估了汲取性制度或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从历史上看, 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是绝对剩余生产和相对剩余生产各自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而且,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 还很难说这种此消彼长是以相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持续增长的方式实现的(尽管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假设的)。自卢森堡以来, 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中一直有一种观点, 认为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可以通过支配外围国家的剩余, 支持核心国家的资本积累。这意味着, 除了马克思所注重的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内源型资本积累外, 资本积累还存在另一类形式。哈维曾将后一类型的资本积累称作“剥夺性积累”, 并试图在概念上将其进一步普遍化, 以囊括包括金融化在内的各种新的剥削形式。^① 毫无疑问, 造成这种剥夺性积累的制度条件和造成内源型积累的制度条件, 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

不过, 尽管存在上述片面性, 阿西莫格鲁等人在诺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下述观点, 即特定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诱致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形成, 进而促进了生产率增长^②, 仍然有许多合理的成分, 并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观点有明显的相通之处。他们针对一些国家的历史制度分析, 以及为此而发展的计量经济学技巧, 的确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直接决定历史的制度因素与生产力进步之间在“事后”所建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实质, 在于利用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创设出一整套生产关系, 使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借用科恩的术语, 即使得一个社会中流行的生产关系最终转

① 参见哈维《剥夺性积累》, 载哈维《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② 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匹配”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第57~58页), 这一观点虽然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 但在理论上可以看作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另一个版本, 这是因为, 一方面, 他们对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界定, 意味着他们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衡量一切经济制度有效性的标准; 另一方面, 他们对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界定, 又意味着将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作为衡量政治制度有效性的标准。值得一提的是, 马克思也曾批评过“历史终结论”, 并采用了“世界历史的终结”这一术语, 他写道:“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 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 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0, 第161页(重点标识为引者添加)。

变为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性关系。尽管阿西莫格鲁等人指斥历史唯物主义犯有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误,但略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事后”形成的功能性关系,也构成了他们自身研究的主题。

第五节 尾论

历史唯物主义自其提出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和内部的争论。如果撇开来自外部的,即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不谈,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大约经历了三次争论。还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的倾向,在其晚年的几封著名书信中,恩格斯试图批评并纠正这种倾向。这批书信的问世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恩格斯当时把经济(和生产力)决定论的出现,视为马克思和他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得不够充分而造成的误解,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矛盾的表现。^①因此,尽管恩格斯为纠正这一决定论倾向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②恩格斯去世后,这种经济决定论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为通行的解释。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当时围绕这场革命的性质,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争议,这些争议在理论上必然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普遍站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基础上,认为十月革命缺乏相应的生产力基础,不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即便是赞成十月革命的葛兰西,在撰文评论这场革命时,也将文章题名为《反〈资本论〉的革命》。^③列宁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前文已经分析过了。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大致沿袭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观点。布哈林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书中表露的观点与列宁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显然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还体现在卢卡奇针对该书撰写的书评中。此后,经过大约半个世纪,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

①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01页。另见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同上书,第553页。

② 卢卡奇:“恩格斯在晚年曾作过坚持不懈的(但徒劳的)努力,试图把机械的庸俗的、错误的认识论的经济优先观(有人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引上辩证法的轨道:他试图防止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似乎任何社会现象都能从经济中‘作为逻辑的必然而推导出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第274页。

③ 葛兰西写道:“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见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载《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第10页。

的潮流中,又出现了第三次大的分歧或争论,其典型表现是科恩和布伦纳各自发表的著作,尽管在这两人之间似乎并未展开直接的论战,但双方的理论以更为发展的形式再现了卢卡奇和布哈林的争论。^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使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面临着下述近乎悖论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如果坚持生产力在解释历史制度变迁中的首要性地位,其结果将导向生产力决定论,即认为任何历史制度变迁都可以从生产力的变化中推演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放弃这一观点,承认其他因素具有与生产力类似的首要性,其结果将有滑向韦伯式理论的危险,即承认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在历史变迁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② 本文的全部讨论旨在探索克服这一悖论的可能性。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构想一个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历史序列,但这一序列只是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概括,并不能无条件地用于解释每一段实际历史。一些要求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与每一国家、每一时期的历史直接对应的观点,是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理论的性质。

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除了生产力系统的自主变化外,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是推动生产方式演变的两大直接动因。一种生产方式的演变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取决于流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方向。根据前文的观点,一方面,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制度型式都有可能依据其功能担负起生产关系的角色;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生产关系的这两重功能既可以相互结合,也可以相互背离。如果一国的

① 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争论,诺思的下述评论是不无道理的:“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乎就有多少种对马克思理论的注释。这就使确定马克思的模型变得很困难。”见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第67页。不过,诺思尽管知晓这种困难,却不加讨论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技术决定论(同上引)。

② 里格比曾总结了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这种悖论:“正如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摆脱还原论的魔咒,而它的批判者通常会还将还原论视为导致它失败的关键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滑向多元论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因此,马克思主义似乎无法成功地摆脱这两种命定的束缚。”(见其《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林出版社,第二版序,第29页)这里提到的还原论指的是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多元论则是指新韦伯主义理论,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是这一理论的当代代表,该理论认为,不存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领域(如经济),在历史过程中,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权力都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权力是相互依赖、彼此转化的。参见迈克尔·曼的多卷本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特定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联盟，面对来自阶级冲突和国家间竞争的压力，有能力利用国家权力推动一场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将流行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切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从而使剩余的增长更多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促成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既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其自身之形成也构成了这一制度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国家理论相应地成为一切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戈德利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往往直接充当或参与构建了生产关系。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笔者希望，本文提出的这一再解释能给历史唯物主义带来足够的弹性和活力，使之不仅摆脱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束缚，而且能为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指引。

中国经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即将到来的中国危机

理查德·韦格*

周钊宇 译 张 开 校**

摘 要：比较日本 1991 年经济危机和美国 2008 年经济危机，可知过高的私人债务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过高的私人债务，一方面可以引起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能够导致大量不良贷款。目前中国私人债务超过 GDP 的 200%，处于爆发危机的边缘。即使中国能够采取各种措施防范经济危机的爆发，但经济放缓已经不可避免，放缓的中国经济将通过四种途径对与之联系紧密的国家带来不利影响。对中国而言，经济放缓是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过高的私人债务。过高的私人债务不但能够引发经济危机，而且在经济复苏时期抑制经济快速增长，因此，虽然困难重重，通过债务重组缩减私人债务已然是中国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私人债务 经济危机 产能过剩 中国

一 是故事， 还是事实？

私人债务的快速增长使日本陷入 1991 年的经济危机，同样也使美国和欧洲陷入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下一个可能是中国。

2016 年 9 月 8 日早晨，作为中国众多信托公司之一的温州信托公司（Wenzhou Credit Trust）发生违约。该公司停止发放新增贷款，终止其信托证书（trust certificates）的还本付息，这些都是其客户存款的等价物。

那时候，信托公司违约似乎很正常。少许信托公司——“影子贷款人”（shadow lenders）发放贷款，通常最具风险，且独立于中国传统银行业——近些年它们就是这样来干的。但是一周内，另一家信托公司发生违约，至少七家信托公司也在接下来的一周步其后尘。愤怒的信托证书持有者在温州和重庆抗议，但被警方平息。这些抗议最初并未引起重视，几年以后，数百起抗议和骚乱遍及中国，事实证明它们是危机来

* 理查德·韦格（Richard Vague），著有《下一场经济灾难》（*The Next Economic Disaster*），美国加百利投资公司（Gabriel Investments）管理合伙人，非营利慈善组织 Governor's Woods Foundation 主席；曾任 Energy Plus、Juniper Financial 和 First USA Bank 的 CEO。本文发表于《民主》杂志 2015 年春季卷 [The Coming China Crisis, *Democracy* (36), 2015]。为方便读者阅读，译稿增补了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的标题。

** 周钊宇，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张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临的前兆。

一个月内,超过50家信托公司违约。抗议活动升级并蔓延到全国各地。恐慌中,房地产新增贷款锐减,加大了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冲击了地方经济。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铁、钢、煤、铜、铝和包括石油在内的其他商品价格螺旋式加速下降。

近年来,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容忍这些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其试图为系统引入更多风险。然而,现在中国政府改弦易辙并进行干预,对这些信托公司注资并保证客户利益,这将为这些机构提供担保。这些举措使股市趋于平稳,但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和人民币贬值。

到了冬天,其影响遍及亚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市场和公司,欧洲和美国的市场也开始萎缩。

中国的大恐慌全面推向高潮。

二 场景转换

未来当然不必以这种方式到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可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

但无法改变的是:中国在过度放贷的刺激下,已经生产了过量的住房、钢、铁和许多其他商品,积聚了前所未有的过剩产能。据我估计,在此过程中形成了2万亿~3万亿美元的巨额不良贷款。由于GDP所反映的只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能力,而非实际需要的生产能力,况且,中国GDP的高增长率几乎完全是由持续高水平的贷款增长所推动,这加剧了而不是解决了中国根本的产能过剩问题。

这意味着:自2008年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以来,作为全球唯一主要增长引擎的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促进作用正在急剧减弱,不久将很可能结束。问题是,这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中国的不良债务问题规模空前,但不是本来如此。在2007年和2008年,美国在不良债务重压之下,经济遭遇崩溃。系统本身并不知道为何遭受重击:在我们自身的崩溃伊始,尽管超过1万亿美元的不良抵押贷款已经形成,并且重大金融衰退不可避免,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即用于支付不良贷款的预留资金规模空前接近低位,而消费者的资产净值和股市却空前处于高位。

今天我们两大主要经济理论都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鸽派——那些支持低利率和政府刺激者——持乐观态度,对贷款的高速增长漠不关心。鹰派——那些主张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货币供给扩张者——对通货膨胀发出严重警告。两个经济理论都失败

了，但仍坚持己见，不做修正。

尽管会招致反对，但我认为美国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完全可以预见。它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回顾历史记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只要观察私人债务水平迅速上升的红色预警线，便可以预测主要的金融危机。如果我们要避免历史重演，就应该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困境，知晓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三 美国的私人债务问题

在华盛顿进行的关于政府债务的讨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引致美国滑入危机的那几年中，显著原因不是政府债务水平的增加，而是私人债务相对于GDP比重的激增，该比重由1997年的120%飙升至2007年的165%。相比之下，政府债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同一时期从占GDP的63%下降至62%。私人债务是消费者的债务总和，包括抵押贷款和商业债务。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私人债务比率不应该超过GDP的125%~150%。1990~201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私人债务、政府债务情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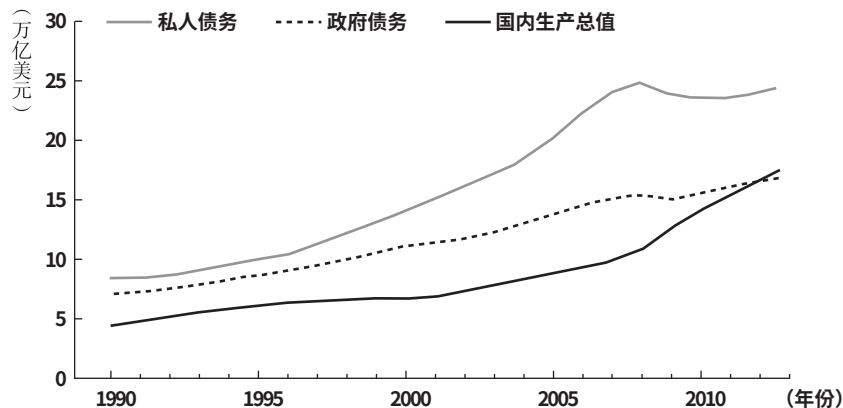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情况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美联储、财政部。

虽然很多观察家没有注意到这些现象，但自从把住房抵押贷款的快速增长视作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广泛讨论以来，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把私人债务看作美国危机的关键因素。仔细考察历史数据可以得出，私人债务与金融泡沫破裂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普遍的：当我们审视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发现，即便这些危机被归因于其他原因，但私人债务仍是基础性因素。一个国家的低位或适中的私人债务总体水平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特别是当它可以用资助项目的收入来偿还债务的时候。但是，当私人

债务增长过快或过大时，问题就会出现。

图2显示了一个相似的画面。在1991年危机前的几年里，日本的私人债务达到高峰。这正是我们在危机交替中所看到的景象。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有一个公式可以预测这些危机。如果私人债务占GDP的比重以17%或以上的增长率连续五年增长，并最终超过150%，金融崩溃就在眼前。私人债务的上升可能推动危机爆发前的迅猛增长（例如，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日本80年代的繁荣）。但这些收获终将消散。由私人债务增加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终将被金融危机所替代。

在过去的危机中，如1929年危机、日本1991年危机、美国2008年危机，高水平的政府债务并不是罪魁祸首，因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每种情况下都大体持平或下降。它们和那些被广泛引证的其他很多原因之间没有关系，包括当前对赤字和利息率的解释。（政府债务的迅速上升通常成为危机后的问题，由于税收直线下降和赤字上升，政府的“安全网”方案被更多地付诸实践，政府运用更多的政府投资来抵消私人投资的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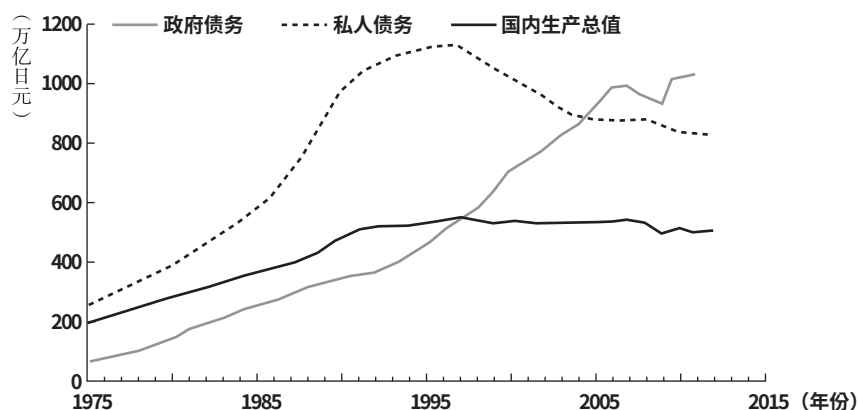


图2 1975~2015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清算银行、Reinhart and Rogoff. com。

为什么私人债务的迅猛增长会导致金融危机？首先，因为它意味着建造或生产的东西过多。美国2008年主要是住房过剩；日本1991年主要是商业地产过剩。其次，因为它意味着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过多的不良贷款。例如，2007年美国银行系统大约有1.5万亿美元的总资本，据估计却有2.5万亿美元的不良贷款。

如果问题是过多的产能和过多的不良贷款，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时间和资本：吸收过剩产能需要一定时间的有机增长，修复银行和借款人的利益需要资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缓和冲击，但并不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无法解决潜在的

问题。

四 中国的潜在危机

中国在 2015 年所面临的问题，与 2008 年的美国和 1991 年的日本很类似。

私人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过去五年中的增长高达 60%，这一比例现已超过 200%。中国迅猛的债务增加主要来自商业贷款，现在中国的商业贷款总规模大于美国，甚至按汇率计算，美国的 GDP 还要比中国的 GDP 多 82%（对中国而言，我们使用“私人债务”来表示商业和消费者债务的总和，尽管一些分析家把它看作“非政府债务”）。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生产和建造了过多的产能，这是通过对钢铁、水泥企业和加快房地产发展中进行过度投资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积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不良债务。1997~2013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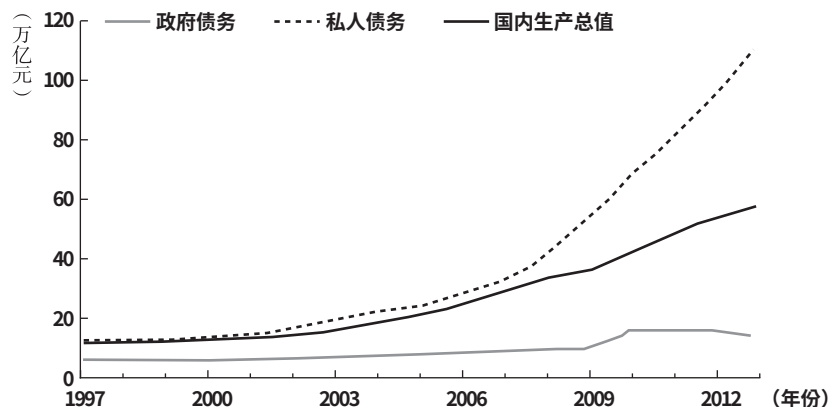


图 3 1997~2013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清算银行、CEIC 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市场的崩溃，造成了私人债务于 2008 年的快速增加。1999~2006 年，中国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激增了 95%。以美元计算，中国的净出口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的出口增长是以西方国家以债务来推动的不稳定的经济扩张为基础的，而这导致了 2008 年的危机。当这种需求锐减，中国的出口也随之锐减。沉迷于快速扩张的中国，建造和生产了大量的、超过实际需求的房地产和商品来弥补出口缺口，所有这些都是由前所未有的私人债务的增加来提供支持，这些债务不可能被完全偿还。

结果是，中国现在处于有史以来不良债务和产能过剩的最高峰。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Household Finance）的资料显示，中国城市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住房是空置的，其中已出售的住房中有 4900 万套空

置,还有350万套未能出售。这些空置和未售出住房的背后是私人债务,包括开发商贷款和抵押贷款债务。中国房价沿着与2008年前的美国和1991年前的日本相同的、危险的轨迹上涨,现在房价开始了类似的下滑。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价格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峰值6%;今天,中国房地产价格占GDP的比重却已高达20%。

还有其他因素已达警戒线。1980年中国生产了世界炉铁总产量的8%;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炉铁产量与过去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现在中国的炉铁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61%。2002~2011年,中国的铁产量快速增加,在债务拉高需求的作用下,铁的价格增长了12倍(债务增加导致了价格上涨)。但是现在铁的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需求,价格骤减超过50%,过剩产能如此之大以至于快速增长的信贷所创造的需求也无力支撑起价格。此外,2011~2013年中国使用的水泥高达66亿吨,其规模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所使用的45亿吨还要多。

这些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少数几个。近日中国国家规划机构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已经“浪费”了68万亿美元的投资。许多部门的产能过剩是非常显著的,这将需要数年通过有机需求来吸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问题被中国持续的高增长率所加剧,因为GDP的高增长是对创造出来的额外产能的一种衡量,即便这种产能是不被需要的。

顾名思义,良好和健康的贷款能够带来相应的GDP增长。因此当私人贷款增长超过GDP增长,差额中的部分(其他危机中的经验表明,差额中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将是不良贷款。根据这个公式,中国当前很可能有大约1.75万亿~3.5万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这个数字大于中国银行系统中资本总额1.5万亿美元。

当然,中国的银行和影子贷款人并未以接近这个数额的不良贷款对外公布。但是美国的银行亦如此:在美国经济危机前夕,银行使贷款损失准备金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贷款的激增创造了繁荣的假象,欺诈和腐败则使景象看起来更加真实。

一些人对这些危险信号不予理会,并指出许多经济预测曾错误地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做出了同样的极端预言。但两者有很大不同:在1999年,中国的私人债务总体水平占GDP的111%;后来为211%,几乎是当时的两倍。在1999年,中国具有充足的空间来推动增长,可以通过持续的私人债务扩张,以及通过西方国家债务繁荣所导致的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出口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后来则正好相反。

五 中国与世界的未来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放缓。名义GDP的增长,已经从2011年的超过15%下降到2014年的7%左右(一些分析家认为它实际上接近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

速在未来三到四年将持续下降。然而，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在同时处理短期问题（增长放缓）和长期问题（私人债务过多）时所采取的方法。

中国的困难在于，化解这两个挑战的应对之策是相互冲突的。在任何经济体中，GDP 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信用的增长，然而中国的私人部门已经过度杠杆化。扩张信用或可逆转经济下滑，将进一步增加不良债务，并使根本问题变得复杂；另一方面，遏制债务将有助于解决债务问题，但会使经济增长放缓。

诚然，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可以制定和废止自己的规则，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支撑起他们的贷款系统（即便是日本也能够在其股市崩盘后支撑银行数年）。但是，他们可能不再对房地产和商品价格提供实际支持。因为房地产和商品价格的下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证明，而这些资产是债务的抵押品，这将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

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滥用债务推动增长，这大大超过了收入增长的可能限度。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选择很糟糕，但中国拥有巨量资产和中央政府低债务水平的条件，因此实际上仍有通过这场危机的手段。中国仍有回到过去成功实践的冲动，所以很难想象它能够放弃过去增长战略的三大支柱：出口、商业信用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现实情况是每一个支柱重新启用的可能都在减少：出口受制于全球需求低迷的影响；商业活动已经过度杠杆化；中国已经修建了很多路而无路可修。

由于以上因素难以为继，中国可能考虑其他的增长渠道：促进消费者信用增长；扩大其他种类的政府支出，如军费支出；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甚至可能重启货币贬值。但是，即便采用这些方法，还将是功亏一篑。

据报道，中国消费者杠杆率较低，但家庭债务的增长速度已远超过中国人的谨慎度，并最终会被家庭收入所限制。由于大量非正式的消费者贷款未被报道，中国的消费者债务（consumer debt）可能更高。进一步来讲，中国消费者已经把他们大部分的储蓄投资在房地产上，而且很多人拥有多套房产，因此持续下跌的房价将使消费者不愿承担过多的新债。

增加政府支出应该有助于扭转颓势，特别是当它集中在非产能过剩领域的时候，如军事支出。但即便在这个领域中，额外支出的规模和节奏必然会受制于作战的实际需要。中国希望将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以及增加工资和住房需求。但是，这些计划主要依赖于支撑这些人口转移的就业增长，而就业创造（job creation）是出口减少的主要受害者。最后，当全球需求旺盛的时候货币贬值效果最好，风险转嫁给外国资本，但在任何情况下，这很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货币的竞相贬值。

“再平衡”（rebalancing）和“改革”（reform）均被认为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再平衡是必要的，与家庭消费相比，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商业投资。但是，再平衡需要数年的艰难工作，它不足以迅速扭转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商业活动（business practices）的改革很有必要，但将困难重重，而且不会很快开始。

一些人认为通过持续的、大幅度的生产率提高，中国能够在不加重私人债务问题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近年来私人债务增长几乎与中国生产率提高相当，这使得那种主张在没有持续的、高水平私人债务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生产率提高的观点陷入窘境。

六 恐慌与传导路径

由于能够充分提振经济增长的好办法是非常少的，商品和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下降会使中国银行业中的问题贷款更加糟糕，中国私人债务中的极大部分是由商品和房地产做担保。根据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措施，它将可能会通过公开和广泛地对消费者的存款、财富和信托证书给予保障，来解决正在恶化的银行贷款质量问题。它也将悄悄通过注入资本来支持这些贷款机构。如果中国推行这些政策，它确实会避免直接的金融危机。但它最终还是无法扭转在未来3~4年内增长放缓的趋势，也许经济增长会接近于零，由于增长过低，中国将面临“失去的”一代，类似于日本过去20年的境况。

世界上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会由于受到中国影响而爆发危机？金融传导路径（path of financial contagion）是怎样的？

金融传导并不是那种必然控制健康的神秘力量。对中国以外的公司和国家的影响将来自：①给中国那些存在问题的银行和商业提供过度贷款；②过度依赖针对中国的出口；③依赖于较高商品价格的效益；④由于人民币贬值，出口导向型国家不得不使本币贬值。

大多数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出口集中于中国，它们将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不利影响，对许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的影响亦如此。欧洲也将受到影响，特别是在高端汽车和奢侈品领域。除了那些诸如高科技和建材产品在中国销售较多的行业外，美国受到的影响极为有限。

尽管中国据称有低水平的外国债务，但这些债务水平可能被低估，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那些贷款给中国公司或银行的外资银行将面临实际风险。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都处于对中国（系指中国内地——译者注）放贷最多的系列之中。依赖于高油价和其他商品价格收益的国家也面临同样风险。如果人民币贬值，许多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亚洲邻国将被迫跟进，事实上这些国家可能会先于中国进行货币贬值，这将把银行业危机的幽灵引入这些国家。

七 如何应对私人债务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在我从事商业活动的那些年，媒体大肆宣称日本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商界领袖。日本公司购买了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如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高尔夫度假村，似乎证实了这一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 GDP 达到世界总量的 18%。今天这一 GDP 份额已经下降到 7%。我们现在知道，失控的私人债务铺就了日本昔日的经济辉煌。

虽然中国的发展路径可能与日本不同，但两者也有深层的相似之处。中国的私人债务失控增长多年，而 GDP 的增长正在放缓。毫无疑问，人口超过 13 亿的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一种倾向，那就是高估中国在短期内扭转经济颓势的能力。美国经济规模大体上是中国的两倍，我们的相对影响力将继续反映这种差别。

事实上，我们应该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随着其经济增长，中国在多个政策领域更为引人注目。它在军事方面更加自信。它努力让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在本质上是与美元展开竞争，以求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努力回应这种自信。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部分回应都不足为奇。虽然中国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它目前面临着大量的以及在某些方面前所未有的内部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短期内为扭转经济颓势所采取措施的局限性，并避免对其相对能力高估而使政策失误。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中国要直接对付的不是增长放缓，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和过量的私人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谨慎地减少贷款和降低经济增长，使需求能够与过剩产能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对贷款机构预先进行资本重组。

但是，我的建议远大于中国之前的银行清理力度。它进一步要求贷款机构广泛地、迅速地、果断地对负债过重的借款公司进行债务重组。换句话说，给予真正的债务减免和重组，这将使得这些企业恢复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做一些简单的会计花招。否则，高负债将持续数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拖累。

大规模公司债务的减免将会是复杂和困难的。但来自日本的经验教训表明，当时日本私人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令人吃惊地达到 221%，然而及时的、有意义的债务重组却没有被采纳，这正是它的必要性所在。一代人之后，日本的私人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仍高达 170%，这是使日本增长乏力却仍被忽视的核心问题。

中国或许永远也不会实施这种系统的私人债务重组，但这是振兴中国饱受困扰的

商业部门的可靠路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稳定物价，以及恢复合理的增长。通过减轻而不是简单掩盖中国的私人债务占 GDP 比重过高的问题，这能够为中国公司在经济下滑过后更好地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审慎地讲，现在还是有希望的）。

八 留给美国的经验教训

失控的私人债务使美国经济在 2008 年遭受重创。1991 年的日本也是这样。中国正处在相同的过程中。然而支配思维和左右华盛顿政策制定的各种经济思想流派，很少关注私人债务。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在预测危机方面将继续犯错，且事后的理论修正也不充足。正是失控的私人债务造成危机，危机之后高悬的私人债务限制增长。私人债务不被经济学家们所重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观点认为每一个借款人都有一个贷款人与之相对应，所以私人债务“净值”为零。这种观点忽视了债务的分布：贷款人往往是机构，而借款人往往是中等和低收入家庭，而中等和低收入家庭对于维持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私人债务不被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债务更多体现我们的公共责任，私人债务属于私人部门范围，应该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美国危机七年之后，其私人债务占 GDP 的 143%，低于 2008 年最高点 167%，但仍然很高。美国高水平的私人债务阻碍了经济增长，其显著证明是 5300 万抵押贷款中有 900 万是负资产。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私人债务水平都很高，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数十年私人债务的积累，减少了需求，并抑制了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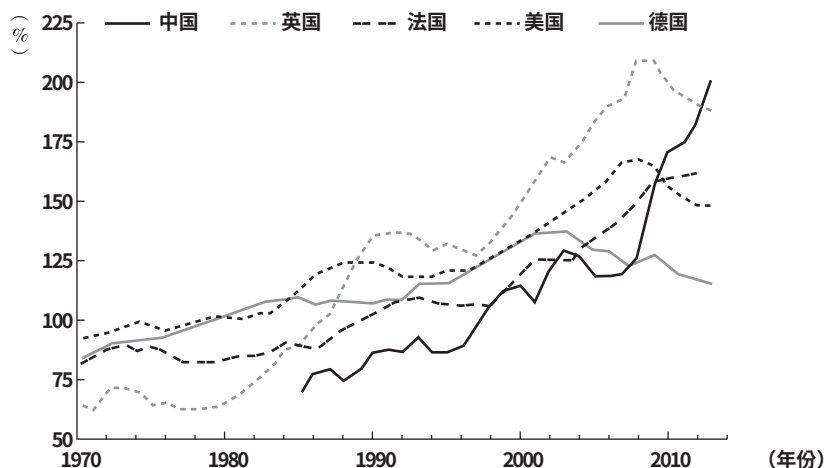


图4 各国私人债务占 GDP 的比重（1970~2013 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美国经济分析局、美联储、国际清算银行、CEIC 数据库。

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给美国提供了学习和校正经济思想的机会。与中国一样，我们现在应该集中精力相应削减私人债务（我们在 2008 年危机之后并没有这样做）。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经济复苏受到下一轮经济放缓的冲击（来自中国或其他地方），美国现在需要采取行动了。以重组或免除部分债务的形式来进行债务减免，作为一个选项应该被认真考虑。倘若贷款机构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内才能最终削减掉负资产（write down underwater mortgages），这将意味着什么？虽然在今天其必要性已经减弱，如果它在 2008 年已经被完成，它将带来完全不同的经济复苏轨迹。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公共债务上转移视线，并把注意力转向私人债务这一真正问题上。他们应该认识到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些陈旧工具的不足，进而引导一场关于策略的讨论，特别是通过重组，来解决处于历史高位的私人债务这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低水平的私人债务，配合着低产能（住房、工厂等方面的供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经济繁荣的前提。

中国经济的衰退，仅仅是加重了美国经济的挑战。当代世界有四大经济引擎——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它们共同构成世界 GDP 总量的 60%。尽管美国增长态势良好，但背负高水平私人债务的欧洲和日本步履蹒跚。

但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中国。中国正面临较长时期的增长放缓，这将给全世界中国的贸易伙伴和贷款机构带来不利影响。虽然美国受到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主要国家都要小，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来自它的影响。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调研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首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以建筑业为例

孙咏梅 田超伟^{**}

摘 要：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首都都市圈，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身处劳动群体的最底层，其相对贫困化日益显著。农民工贫困问题关乎农村和城市的贫困人群，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一环。减轻、消除农民工多维贫困，对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测量多维贫困的 AF 方法，将农民工的贫困类型划分为五种：物质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健康贫困。并以农民工最为密集的建筑业为例，从多维度对首都地区农民工贫困状况进行考察，涵盖了农民工家庭基本情况、就业与权益、能力与发展、生活与健康、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以及农村的生活等六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的特点，并从制度和农民工自身两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工贫困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取消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待遇、改善其居住条件、提高其组织化程度等措施以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问题。

关键词：城镇化 农民工 物质贫困 权利贫困 精神贫困 能力贫困 健康贫困

一 引言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期，城镇化率从 2002 年的 39.09% 上升到 2014 年的 54.77%，以年均增长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推进。而我国的京津沪等一线城市，城镇化率均超过 76%，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大都市，其城镇化更具有典型代表性。新型城镇化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途径，将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国际经验表明，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人口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核心标准。以人口城镇化率来对城市型社会进行阶段划分：城镇化率

^{*}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对我国农民工劳动报酬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以建筑业为例”（2011030285）阶段性研究成果。

^{**} 孙咏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农民工就业与贫困问题等；田超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51%~60%，为初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61%~75%，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76%~90%，为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

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49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去年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①首都城镇化率由2004年的79.5%增长至目前的约86%，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预计到2020年，首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89%。首都城镇化建设造就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庞大的首都农民工群体，目前北京地区的农民工总量超过400万人。随着大量农业人口进入首都都市圈，农民工队伍的收入层次低、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返贫现象也时有发生。2011年国际贫困标准调整后，按人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2）。首都尽管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陷入收入分配层级中的最低端，相对贫困化现象十分明显。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贫困人口群体的存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挑战。因此，若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迎接挑战，有效消除贫困。农民工联系着农村和城镇，其贫困化问题关系着广大低收入家庭的生计，是当前中国贫困问题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迫于生计进入城镇，从事的工作往往卫生条件差、工作强度大、薪资报酬低，他们在城市中艰难求生。他们不仅是城市最贫困的群体，而且联系着农村的千家万户，与农村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建筑行业是我国农民工就业最为典型的行业，其所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近1/3，这些农民工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贫困的农村家庭。所以，研究建筑业农民工贫困问题对于洞察和解决农民工贫困乃至全中国贫困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筑业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既有贫困群体的共同特征，同时也有自身的独特特征。总体而言，这些特征包括：收入低下，被拖欠工资的概率较其他行业高；劳动和生活环境恶劣；作为“外来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常常受到歧视；各项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缺失，饱受制度或非制度性歧视。

首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贫困问题不仅仅是收入过低问题，因此，通过收入来衡量首都建筑业农民工贫困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农民工的贫困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导致贫困的因素也是多样的、错综复杂的。多维贫困测量比传统的以收入定义和测量贫困更能准确地反映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现状和成因。多维贫困测量并不是对收入

① 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贫困测量的简单替代,而是重要的修正补充。这有利于使扶贫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明确未来北京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政策,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 农民工贫困的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 贫困界定和衡量方法

目前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共约400万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扣除生活成本,外出农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结余1557元。相较于首都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来看,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综合现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其进行量化研究是十分关键的。关于贫困程度的衡量,传统的体系包括收入标准与消费标准,但仅以收入及消费水平来考察农民工的贫困度是不够的,我们应参照联合国多维度贫困衡量标准,对首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贫困问题进行科学规范的衡量。

随着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一些贫困的农业人口进城打工,引发了学术界对农村转移人口贫困问题的日益激烈的讨论。农民工贫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的综合体,也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关于如何界定贫困,英国的Townsend(1979)在Poverty in th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nd Living Standard中认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食物、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和缺少最低生活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童星、林闽钢(1993)撰写的《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提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最低收入造成的缺少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生活状况”;世界银行则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还包括人均寿命、教育、卫生和生活条件等因素的“人文贫困”的概念,即从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获得基础卫生保健服务、可饮用水和合适食物的状况等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困的程度。

关于贫困程度的衡量体系,Bourguignon & Chakravarty(2003)和Alkire & Foster(2007)分别讨论和提出了多维贫困的数学测算方法,这种方法利用各国国家统计局采集的家庭调查数据以期对贫困的意义进行深入洞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全球104个发展中国家多维贫困指数的测算则包括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3个维度在内的共计10个指标。传统衡量贫困的方法是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收入或者消费不能充分反映其他维度的贫困。因此,阿

马蒂亚·森提出能力法,法国学者拉诺尔提出社会排斥法以对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前者注重个体差异,强调贫困是收入与物质缺乏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个体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后者强调贫困与群体、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联,将分析重点从个体转移到社会关系与制度上。这两种方法是当前贫困多维测量的概念和理论基础。2011年,Alkire和Roche将AF方法应用到儿童贫困测量。201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儿童贫困和不公平——新视角》中,从多维贫困视角审视儿童贫困。目前国内对多维贫困的研究为数不少,主要是对国外多维贫困方法的应用(王小林,2012)。

(二) 农民工贫困的文献综述

农民工是首都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作为首都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特殊群体,其贫困问题是首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继续推进城镇化等过程中最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从20世纪开始,农民工现象就逐渐开始成为政府、社会与学界关切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截至目前,对于首都农民工的贫困程度进行科学测量的研究并不算太多。目前国内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面向全国各行业的农民工,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首都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金莲(2007)研究了城镇农民工贫困测度问题,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食品定量标准,确定贫困群体最低食品消费量,并根据价格数据测算出最低消费额,以此作为标准来考察农民工贫困。樊丽淑、孙家良、高锁平(2008)从经济、能力资源、社会权利、社会交往和心理素质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城市农民工贫困的表现和特征。林娜(2009)在《多维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贫困可以分为物质贫困、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康建英(2009)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了农村向城市移民过程中的贫困问题。王雨林(2004)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维度,林娜(2009)从物质贫困、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三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贫困问题;王雨林和林娜均主要是从概念框架角度阐述了多维度研究农民工问题。李善同(2009)则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城市贫困的视角》一文中,从农民工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视角研究了城市农民工的贫困问题,认为农民工是跨越社会环境最大的群体,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工资水平往往比较低,有着较大的陷入贫困的风险。目前,关于农民工贫困的救助、保障体系十分薄弱,农民工处于既脱离了农村扶贫体系,又不能加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境地。杨洋、马骁(2012)在成都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王美艳(2014)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多个维度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状况,

指出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是影响其贫困的主要因素。王春超、叶琴(2014)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并从收入和教育维度着重考察了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指出农民工教育回报率低对其贫困状况有着深刻影响。侯为民(2015)全面考察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化特征,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户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等措施以应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目前国内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已有研究更侧重于概念框架的探讨,而通过建立系统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及第一手调查数据来全面研究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则很少。

三 农民工贫困状况的多维度划分

对农民工贫困的界定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贫困衡量指标。现在测量贫困的大部分指标是以经济条件为主体的,如莱篮子法等。但是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资源上的缺乏,对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不是很差,但他们仍是弱势群体,属于贫困人群。结合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笔者对农民工的贫困这样界定:农民工贫困是指农民工个人、家庭和群体缺乏物质和能力资源,以及因为受到社会歧视和排斥而缺少争取资源的途径而导致的一种缺乏状态和缺乏过程。

本文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量多维贫困指数的AF方法,将农民工的贫困类型划分为五种:物质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健康贫困。相比传统以收入或消费定义和测量的贫困,多维贫困测量更能准确地反映首都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全貌,以及导致贫困的多方面原因。

(一) 农民工的物质贫困

农民工的物质贫困主要表现在相对贫困上。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一般要比其在家务农的收入要高,但农民工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的收入相比是很低的。从我们对北京市顺义区、房山区建筑工地的调查来看,建筑业农民工平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最高工资达10000元,但在应付子女教育费用、家中盖房、子女成家立业等支出时显得捉襟见肘。农民工几乎没有任何隐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通货膨胀高企,生活成本不断增大之时,生存压力依然巨大。我们通过对首都建筑业农民工生活及工作情况的深入调查,发现农民工贫困问题呈现出两条贫困线:即食物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

我们在顺义、房山和昌平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中抽取不同收入层次的打工者,通过其食物的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计算出农民工最低营养需求的食物支出,用以对照食物贫困线。根据营养学家的建议,我国采用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作为最低营养需

求。我们调查的农民工群体,有37%处于食物贫困线之下。

从国际一般贫困线角度来看,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在50%以上,即一半多农民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低于贫困标准。这一结果反映了,建筑业农民工迫于家庭长远生计的压力存储意愿强烈,牺牲了个人正常消费需求。

(二) 农民工的健康贫困

据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8296万人,比上年增长3.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31451万人,比上年增长6.1%。^①然而,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绝大多数农民工作为生存困难群体,收入水平低,经济条件有限,常常应就诊而不就诊,应住院而不住院,结果“小病磨,大病拖”,酿成很多悲剧。

根据我们对首都郊区建筑业农民工的调查发现,50%的农民工患病时选择路边诊所简单就诊,30%的农民工患病时仅仅靠自己去医院买药治病,20%的农民工患病时常常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大部分工地没有诊所,农民工生病,无法得到及时与有效的救治。调查显示,农民工只有货币工资,而缺乏社会福利性的社会保障。从调研对象的情况来看,农民工正值青壮年,健康情况目前较好。但是农民工的健康意识总体薄弱,缺乏定期体验的习惯。同时,农民工获得健康知识的途径有限,主要通过电视和网络,而缺乏基本的健康知识。

(三) 农民工的能力贫困

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接受培训的机会少,自身能力不足,使得就业渠道狭窄,只能出卖廉价劳动力获得一份“脏、累、差”的工作。他们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餐饮业等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且安全系数比较低的行业。这些工作岗位的待遇水平一般不高,但风险高,一旦出现意外极易陷入深重贫困境地。当问及他们是否有转到其他行业的期望时,他们很无奈地回答,即使有此想法,也因为能力的匮乏而无能为力。

(四) 农民工的权利贫困

权利贫困是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经济贫困现象时提出的一种概念,农民工的权利贫困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贫困。政治方面,农民工参与民主政治的机会严重不足,几乎丧失了话语权。他们所在的用人单位大多没有设立工会等维护其权益的机构,其利益得不到保护,处于劣势地位。在社会上也经常受到其他组织的排斥,无法向社会诉求、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经济上,农民工的就业和劳动保护权利缺失,

^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

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虽然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同一企业工作,但没有受到相同的福利待遇,安全措施和工作环境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经常超时间、超强度地工作,休息权经常受到侵害。医疗、教育费用是农民工的沉重负担,是导致其消费能力弱化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却没有分享的权利,农民工的子女跟随父母流动,在就学方面受到歧视,难以在当地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

(五) 农民工的精神贫困

精神贫困是指认知个人追求、信念、价值观、习惯等人类知性的障碍,缺乏张扬个性生命的内在动力。其表现就是没有理想信念、内心世界空虚、萎靡不振、工作不思进取、没有生活情趣等。事实上,正如权利贫困是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利贫困也是精神贫困的一种重大诱因。总体来说,农民工精神贫困表现为思想观念落后(小农思想严重)、角色意识模糊、价值目标单一、生活格调低、社会融合度低,以及因内心自卑、孤独、空虚而易滋生极端心理等。

四 首都建筑业农民工多维贫困的现状调研

在本次所调研的建筑业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为男性,主要与建筑业的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较高有关。而在我们的统计数据中,所调查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9.6岁,根据图1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年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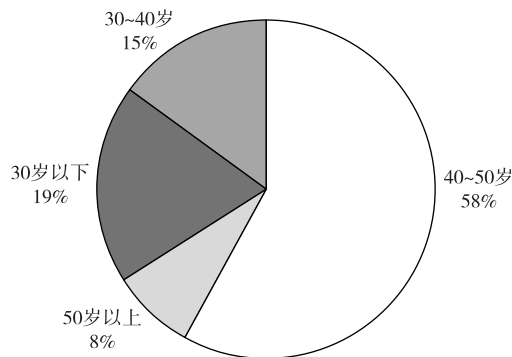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的年龄分布情况

在本次调研的样本中,最年轻的工人为18岁,最年长的为57岁,大部分工人的年龄集中在40~50岁这个年龄段。并且,85%的农民工都是已婚人士,一般有2~3个孩子,据统计,孩子的教育费用占家庭支出的一半以上,是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压力来源。除此之外,建房与购房支出,也占农民工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地位。而赡养老人和医疗开支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见表1)。

表 1 农民工的消费支出结构

家庭主要消费支出	百分比 (%)
建房/购房	36
子女教育	52
赡养老人	4
医疗开支	8

对于大部分的农民工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是限制他们取得高收入的重要原因。在我们调查的样本中，农民工的最高学历为大专，这部分农民工主要为工地的管理人员。然而，文盲在农民工仍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重。而农民工当中，最为普遍的学历为初中，约占 41%（见图 2）；文化程度为小学和高中、中专、技校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 20%。根据我们的样本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因此，要改善农民工的贫困程度，从教育出发提升农民工的技术、文化水平是很重要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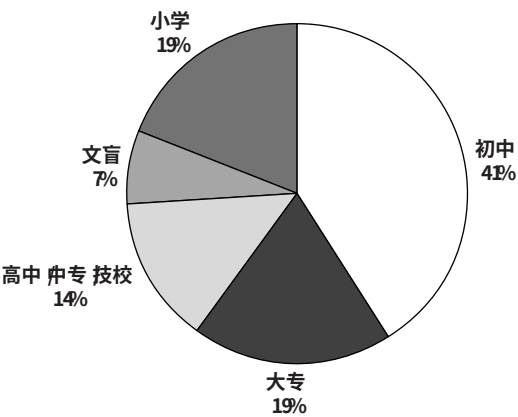


图 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下面我们将从物质贫困、健康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五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首都建筑业农民工物质贫困调查

关于农民工的“物质贫困”，我们主要是通过调查农民工在城市及农村老家的生活情况及其物质收入情况来进行考察。在生活情况方面，我们收集了有关农民工居住条件、伙食条件、所拥有的电气设备及其自我评价等方面的数据信息；在物质收入方面，我们收集了月平均收入、年平均收入、月平均工作天数与年平均工作月数等方面的数据信息。

1. 被调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情况

(1) 建筑业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条件的调查

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工地提供的免费住宿来解决在城市打工时的住宿问题的。对于当前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67%的被调查的农民工表示一般，表示很满意、比较满意的农民工分别占14%、19%，没有人表示“不满意”与“很不满意”（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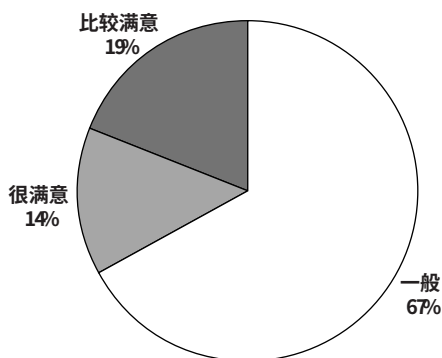


图3 被调查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

(2) 被调查农民工拥有生活电器或设备情况

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与所拥有的电器种类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建筑业农民工。从图4中可以看出，9成以上的农民工都拥有移动电话或是固定电话；彩色电视机也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受访者中拥有彩色电视机的人数占到了6成；大约2成左右的受访者拥有电脑，这可能是由于当前农民工年龄的日趋年轻化。但是从总体情况上来看，农民工所拥有的生活电器或设备的种类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电器或设备的拥有比例均在10%及以下。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被调查农民工所拥有的电器种类很可能还受制于一些其他的非物质因素，例如，农民工可能并不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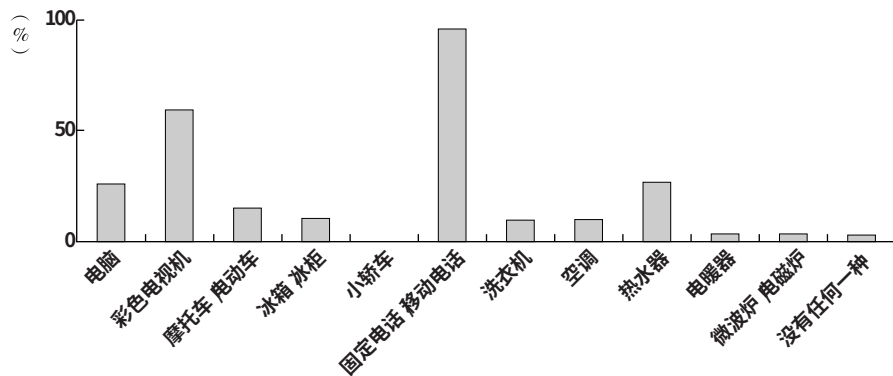


图4 被调查农民工拥有生活电器或设备情况

工地所居住的地方为自己真正的家，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动力去添置一些家电，尽管他们拥有这种能力。

(3) 被调查农民工伙食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农民工是通过“公司收费食堂”解决吃饭问题的，约占59%；23%的农民工“自己做饭吃”；通过公司免费食堂、餐馆解决吃饭问题的农民工各约占9%（见图5）。被调查农民工对伙食的满意程度集中在了“一般”与“比较满意”这两个选项上，前者占比50%，后者占比32%（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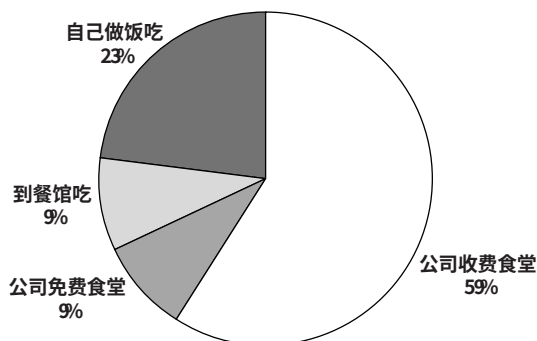


图5 被调查农民工吃饭问题解决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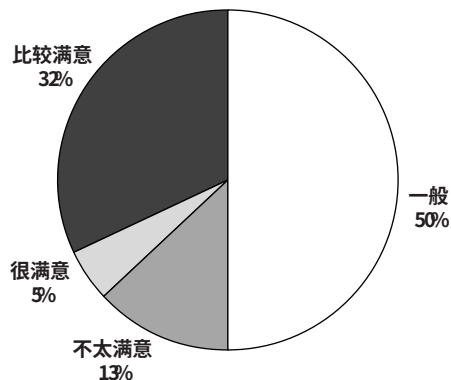


图6 被调查农民工对伙食满意程度

(4) 被调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65%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市的生活条件一般，表示比较满意的占35%（见图7）。相比农村，北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物质文化可谓高度发达，然而农民工似乎难以融入其中，共享城市文明。

2. 被调查农民工在老家的生活情况

(1) 农民工在老家的住房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结果，被调查农民工在老家的住房情况总体较好。从墙体类型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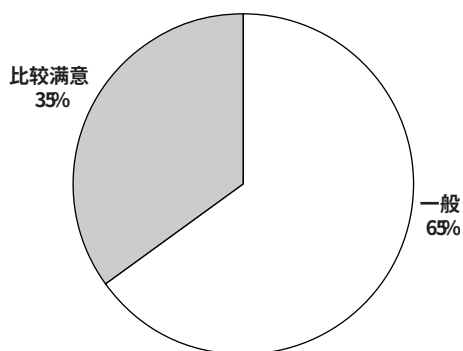


图7 被调查农民工对生活条件满意程度

69%为砖石墙体，31%为混凝土墙体（见图8）；没有土坯墙、沙石墙甚至木墙之类的较差墙体。从被调查农民工自身的评价来看，表示“满意”和“一般”的各占33%，20%的农民工表示“很满意”，仅14%的农民工表示“不满意”（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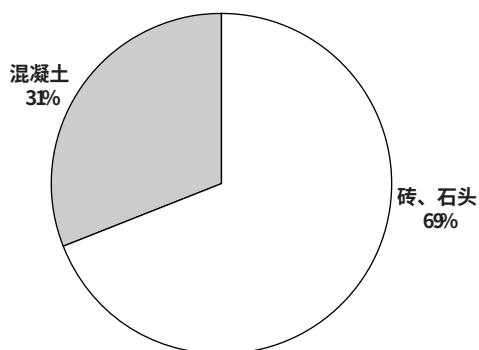


图8 被调查农民工在老家住所墙体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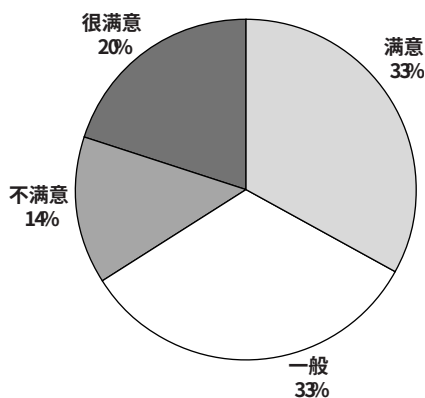


图9 被调查农民工对老家住房的满意程度

(2) 被调查农民工在老家拥有的生活电器或设备情况

被调查农民工在老家住所拥有的电器种类比较多。电脑、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等电器拥有比例均高于 50%；洗衣机、冰箱/冰柜、彩色电视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的拥有比例均高于 75%；小轿车、空调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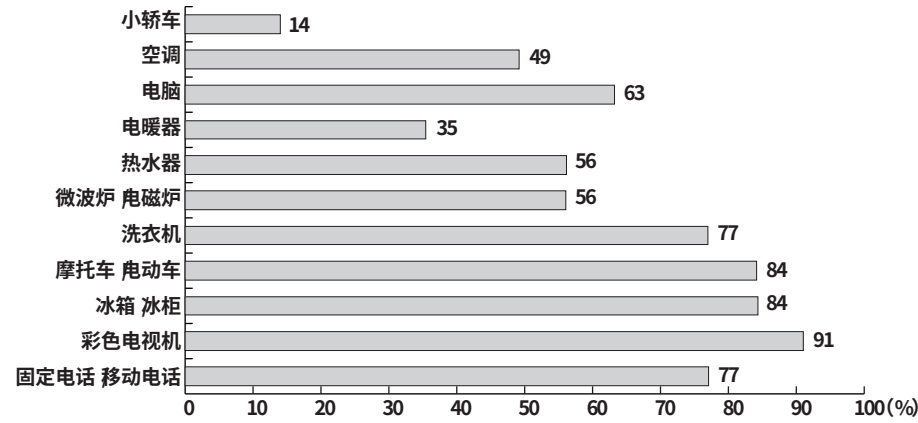


图 10 被调查农民工在老家住所拥有生活电器或设备情况

(3) 被调查农民工对老家生活状况满意程度

根据我们的调查，被调查农民工对老家生活状况的评价为“比较满意”的约占 62%；25% 的农民工表示“一般”；表示“不满意”与“很满意”的各占 6%（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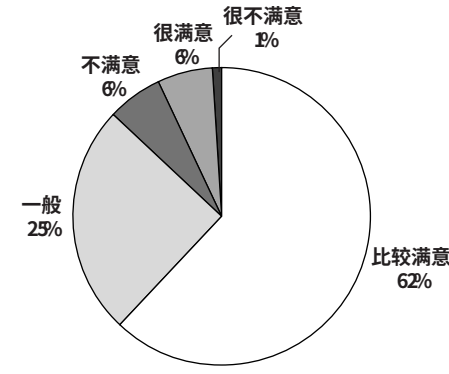


图 11 被调查农民工对老家生活状况的评价

(4) 被调查农民工收入支出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首都建筑业农民工每人平均每月工作时间为 26 天，月均收入为 4664 元，年收入平均为 48611 元，年支出平均为 30556 元。农民工家庭主要消费支出结构如表 2 所示。

表2 农民工家庭主要消费支出结构

单位:%

家庭主要消费支出	百分比	家庭主要消费支出	百分比
建房/购房	36	子女教育	52
赡养老人	4	医疗开支	8

子女教育费用和建房或购房费用是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也是其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二) 首都建筑业农民工权利贫困调查

农民工的权利贫困在问卷上主要体现在问卷B部分的“就业与权益”。农民工权利的获得体现在他们是否签了劳动合同、工资水平、工作时间长短、工作时是否享有劳动保护,以及是否遭到工资拖欠等方面。

1. 被调查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在本次调研中,大部分农民工都签订了用工合同,但是仍有23%的农民工没有签订用工合同(见图12),他们的合法权益仍然有遭受侵犯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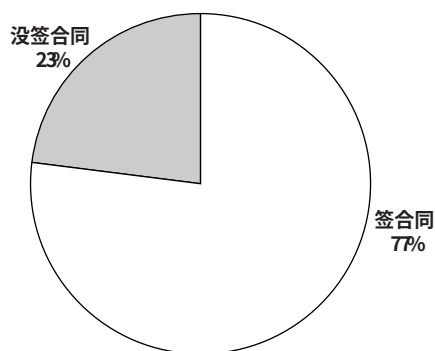


图12 是否签订了用工合同

2. 被调查农民工遭遇拖欠工资的情况

建筑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比例最高的行业。近些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其中大多都注明了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处理办法。各种维权机构、律师事务所也为农民工维权和追讨工资提供了很大帮助。因此,农民工遭受拖欠工资的情况明显改善,这一点也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体现,仅有个别农民工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见图13)。

3. 被调查农民工每月平均工资与月平均工作天数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4664元,其中最高的达到10000元,最低的为2000元左右。与其他地方相比,首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但不排除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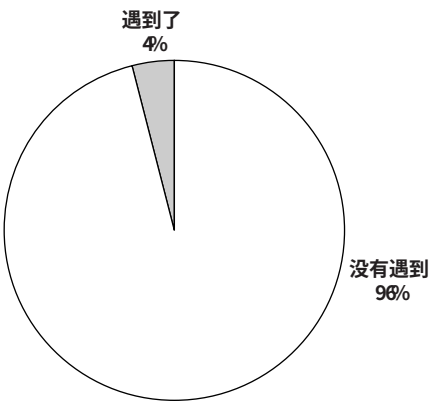


图 13 是否遇到了工资拖欠

数农民工工资低下，生活艰难。农民工的月平均工作天数为 26 天，日工作时间也较长。他们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时间，劳动强度也较大。

4. 被调查农民工节假日加班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节假日偶尔加班的占比是 48%，经常加班的约占 29%，每个节假日都加班的人约占 9%（见图 14）。农民工节假日加班现象较为普遍，法定休息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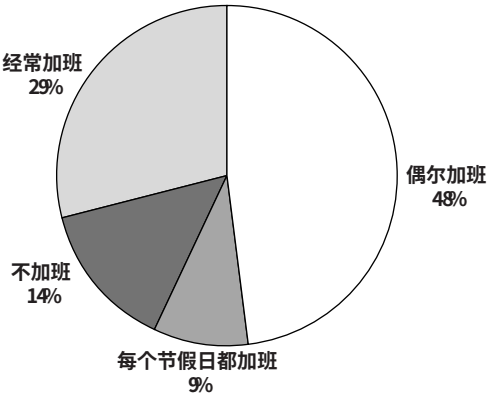


图 14 节假日是否加班

5. 被调查农民工节假日加班费发放情况

60% 的农民工可以取得少量加班费，而 40% 的农民工没有取得任何加班费（见图 15）。由此可见，农民工的休息休假的正当权益被侵害而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6. 农民工工作时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建筑业农民工经常会有高空作业等具有危险性的工作，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中经常遭受工伤侵扰，甚至会出现严重受伤致残致死的情况。因此，工作时是否有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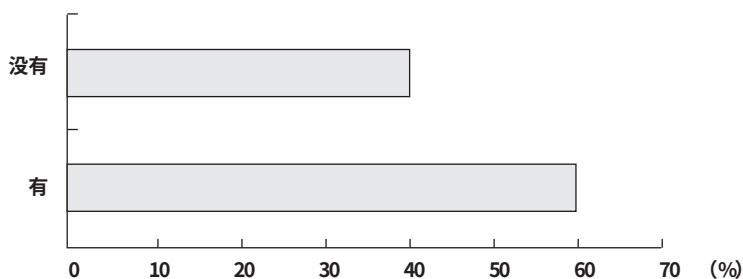


图 15 节假日加班是否有加班费

防护设备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虽然工地上的农民工都配有安全头盔等防护用品，但是这种防护措施过于简单，有 25% 的农民工表示劳动中没有有效的安全防护工具或设备，只有绝对必要的安全防护工具。

7. 农民工劳动防护用品获得渠道

至于防护用品的来源，农民工自费购买约占一半（见图 16），这与其说是和他们的工种相配套，不如说是公司为节约成本克扣农民工的防护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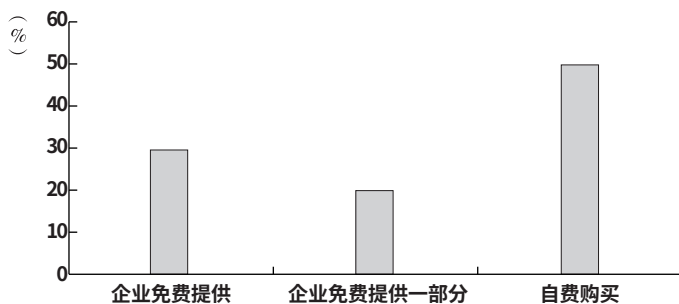


图 16 劳动防护用品的获得渠道

8. 农民工对当前工作的满意程度

对当前工作，约 11% 的农民工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56% 的农民工表示一般，其余表示满意（见图 17）。建筑业农民工对自己目前工作的折中态度，折射出他们迫于生计的无奈。

（三）首都建筑业农民工精神贫困调查

精神贫困是农民工的多维度贫困分析中不可忽视的一项。林娜（2009）在《多维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一文中，对精神贫困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精神贫困是指人的追求、信念、价值观、习惯等人类知性的窒碍，缺乏张扬个体生命的内在动力。对于农民工的精神贫困，本次调研分两部分进行，即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分析。

1. 农民工社会关系调查

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好坏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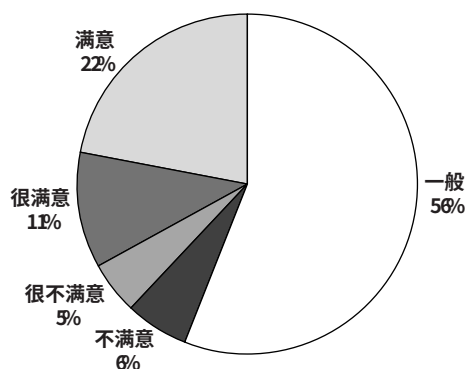


图 17 对当前工作的满意程度

生重大的影响。对于本次所调研的对象——建筑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所接触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是亲人，很多农民工都是与家人一起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工的；其次是他们的工友；最后就是他们的上级管理人员，包括班组长或者是劳务公司的经理等。因此，我们分别调查了农民工与工友，以及与上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并通过对比的方式进行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之间普遍相处得较好（见图 18）；农民工与班组长、劳务公司经理之间的关系总体较好（见图 19）。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内的误差，因为农民工不太愿意表露自己内心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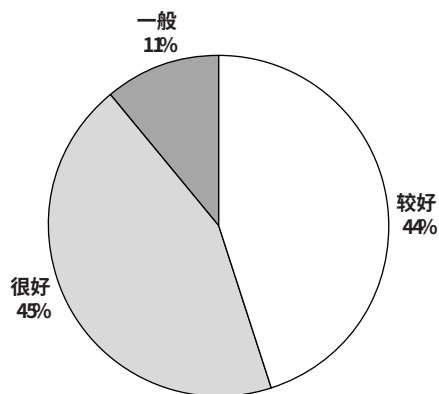


图 18 农民工之间关系

数据显示，农民工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来源排前五位的是：家庭成员、老乡、工作单位/老板、亲戚、朋友/同学。而来自城市居民、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和当地政府的帮助所占的比例很低（见图 20）。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比较封闭，也很狭窄。

2. 农民工社会参与度调查

社会参与度反映了农民工闲暇时的生活状态与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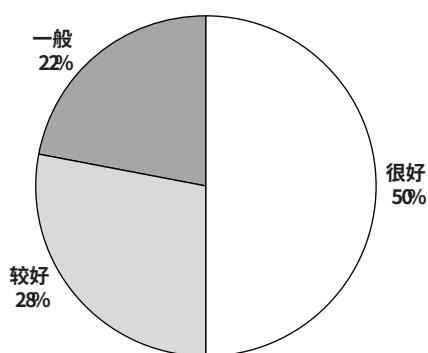


图 19 农民工与公司经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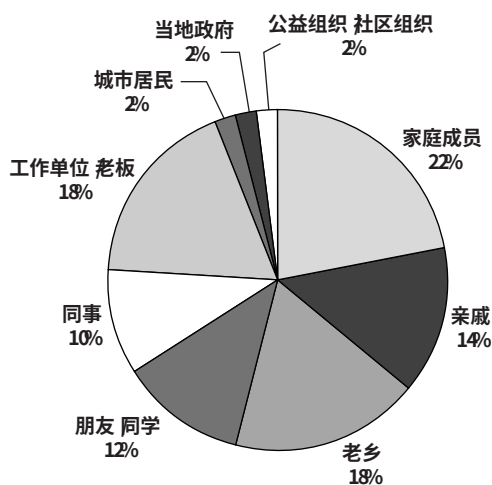


图 20 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来源

根据调研结果发现,约 15% 的农民工表示没有业余活动,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空闲时间。逛街/逛公园这种耗时较多的业余活动所占的比重较少;而看电视/听广播、上网、读书看报这种时间容易掌控且在宿舍就可以进行的活动所占比例较大(见图 21)。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精力投入业余活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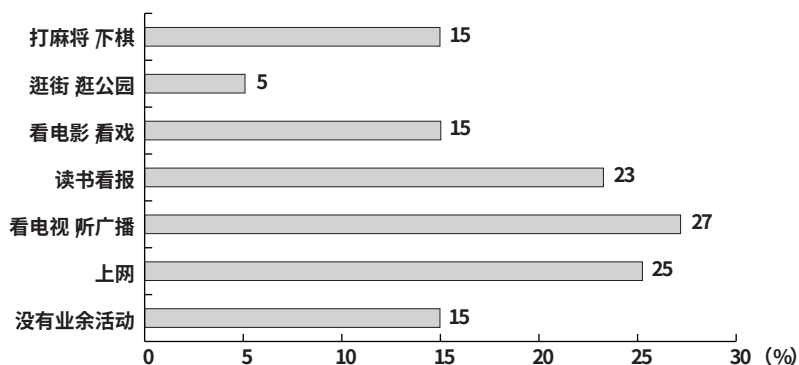


图 21 业余活动统计

同时,我们对农民工参与一些社会活动的意愿和经历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见表3。

表3 农民工社会活动参与意愿调查

单位:%

活动分类	参与意愿		是否参加过	
	愿意	不愿意	是	否
文化体育活动	77.8	22.2	5.6	94.4
社区公益活动	83.3	16.7	16.7	83.3
业主委员会活动	94.4	5.6	5.6	94.4

根据表格数据显示,从总体来看,农民工对于各种社会活动有着相当高的参与意愿,但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参加这些活动的经历。农民工由于劳作而长期处于身体疲惫、精神萎靡的状态,无法从社会活动中获得压力的释放、精神的愉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农民工的精神贫困。同时,通过纵向对比可以看出,农民工参与文化体育活动的意愿最低,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如献血、做义工等)的意愿其次。究其原因,这与农民工的自身知识文化水平有关,大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程度有限,同时繁重的工作可能让他们参加占时较多的文化体育活动的意愿下降。据调查,部分农民工对献血等活动有误解,这也降低了他们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意愿。

除此之外,我们还调查了老乡会/同学会、兴趣文化组织和维权组织在农民工中的普及情况。根据调查数据显示,44.4%的农民工有参与老乡会/同学会活动的经历,27.8%的农民工参与了兴趣爱好组织,而参与维权组织的农民工仅有11.1%(见图22)。农民工参与的组织活动严重不足,无法通过集体活动缓解身心的疲惫,从而振奋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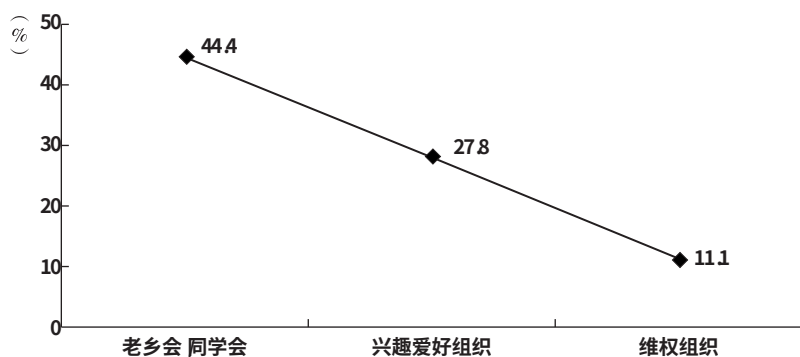


图22 农民工参与活动比例

（四）首都建筑业农民工能力贫困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6.5%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与建筑业相关的技能或知识培训。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无法通过培训获得谋生的必要技能,在能力方面是贫困的。在没有参加过培训的调研对象中约70%的农民工表示没有接受培训的机会,而他们希望能够获得相关技能和知识培训。

图23是对农民工最希望学到的知识的数据统计。图中显示,70%的建筑业农民工最希望学到的还是建筑业的技能,13%的农民工希望学习经商管理知识,期望能够离开建筑业向商业方面发展。事实上,当农民工达到一定年龄时,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或不能胜任建筑业这种体力要求较高的行业。从长远发展来看,他们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来维持生计,于是很多农民工希望学习经商管理知识,为以后的生活早做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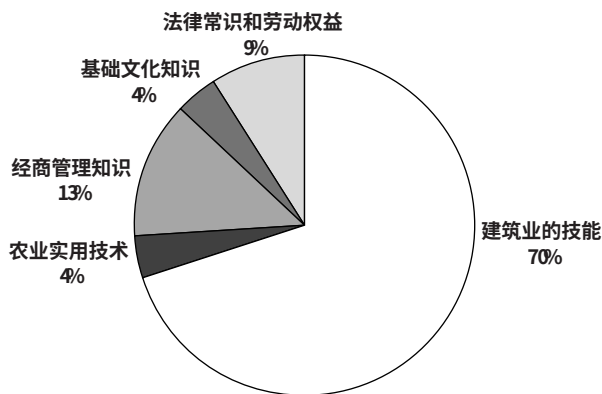


图23 最希望学到的知识

（五）首都建筑业农民工健康贫困调查

健康的身体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因此,我们选取健康贫困作为衡量农民工多维度贫困程度的一个指标。为此,我们对所调查的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统计,结果见图24。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6个月中,只有个别农民工生病住过院,大部分的农民工身体状况良好。虽然表面看来农民工健康状况良好,但是过度劳累使他们未老先衰,身体退化加速。由于正值青壮年,身体抵抗力强,农民工几乎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通常“小病磨,大病拖”。因此,农民工健康贫困问题不容忽视。

同时,我们还对农民工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进行了调查(其中,其他部分主要为不关注健康知识,小部分为通过看病治疗获取健康知识),调查结果见图25。

对于农民工而言,获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为看电视节目、上网、短信等,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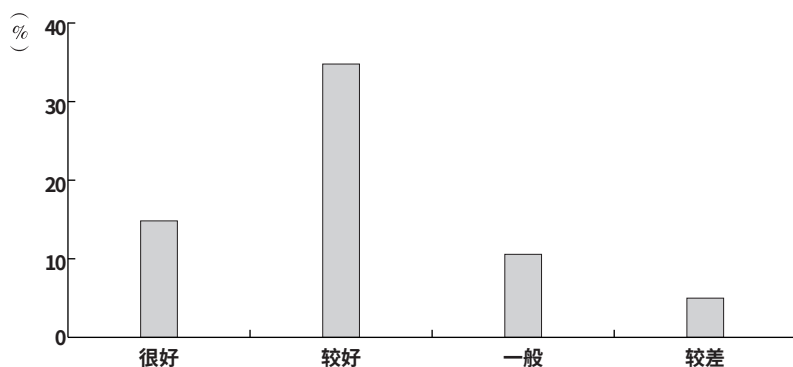


图 24 被调查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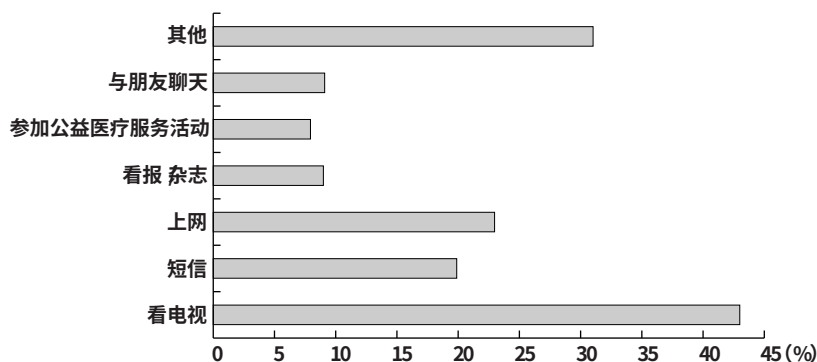


图 25 被调查农民工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

分散，也无法系统学习。农民工对基本的健康常识也不甚了解。

五 首都建筑业农民工多维贫困特点

本文从物质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和健康贫困五个方面对首都建筑业农民工的贫困程度进行多维度的评估。总体而言，目前农民工各方面权益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农民工多维度贫困问题仍然很突出。

（一）建筑业农民工物质贫困特点

综合住房、伙食、生活电器或设备数量等各方面数据，大部分被调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尚无法达到城市正常生活水平。从物质收入的角度来看，被调查农民工月均收入与年平均收入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是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也较差。农民工通常迫于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及医疗养老的压力，压抑基本消费需求以图多储蓄。

（二）建筑业农民工权利贫困特点

建筑业农民工合同签订率仍然偏低，为合法权益被侵害埋下隐患。虽然被拖欠

工资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农民工在法定节假日休息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加班期间没有加班费的现象屡禁不止。工地农民工安全防护措施比较简陋,甚至只有一顶施工安全帽,安全生产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农民工权利贫困问题尤为严重。

(三) 建筑业农民工精神贫困特点

农民工的精神贫困情况主要体现在:农民工缺乏足够的空闲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文化娱乐活动,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农民工长期过度劳动,身心疲惫,精神萎靡;农民工社会关系过于封闭,获得帮助的渠道狭窄;农民工很少可以通过集体活动缓解压力、振奋精神。

(四) 建筑业农民工能力贫困特点

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获得技能、知识培训的机会十分有限,长期单一的体力劳动使得农民工能力狭隘。无论是希望学习建筑业的技能以便继续从事建筑业,还是希望学习经商管理知识以便转向商业,农民工获得培训的机会少,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改变。

(五) 建筑业农民工健康贫困特点

虽然农民工目前年富力强,健康问题不甚突出。但是,农民工过度劳累使得身体未老先衰、退化加速的问题十分明显。农民工健康意识总体较弱,缺乏定期体检的习惯,获得健康知识的途径有限,甚至对基本的健康常识也了解不多。

六 首都城镇化进程中影响农民工贫困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贫困问题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一环,首都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福利情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科学客观的贫困测量和分析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提高建筑业农民工生活水平的基础。只有分析清楚建筑业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多维贫困发生的具体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使建筑业农民工贫困问题早日得到有效解决。农民工贫困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从制度和农民工个人两方面分析其贫困原因。

(一) 从制度方面分析农民工贫困的原因

首先,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制度障碍。农民工的户籍身份阻碍了其在城市中公平竞争的自由,剥夺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成为在城市社会夹缝中生存的最底层。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村人口迁移和自由流动,户籍不仅仅是人口管理方式,还演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与其配套的福利制度和衍生的歧视性政策阻碍了农民工摆脱贫困的步伐。

其次,组织制度的不健全使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工会是工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和谈判平台,而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加入,甚至不知道工会是否存在。这些制度的缺陷使农民工群体处于弱势状态,集体话语权缺失。解决组织制度的问题可使农民工享受到互相尊重的社会空间,不仅仅改善物质贫困,也使社会人文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最后,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城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竞争日益激烈。城市劳动力市场现状是分割的,呈现二级分化的状态。一级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主要是非熟练、没有特殊技能的就业者,一般是拥有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的劳动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就业不稳定、可替代性强,主要是受限于本身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低,因此基本没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正规的就业体系,工资低且不合理,甚至没有就业合同,农民工的权益易受到侵犯。

(二) 从农民工自身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

首先,农民工自身能力较差,知识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受限。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来到城市后从事的工作基本上与农业不相关,主要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农民工长期工作类型单一,附属于机器设备,各方面技能、能力很难得到锻炼、提高。此外,农民工获得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无法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因此,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只能在青壮年凭借体力从事简单的劳动以养家糊口。

其次,农民工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受限。农民工进城之后,原先的社会网络难以发挥作用,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在外打工,原有的认同感和安全感也降低,难以迅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获得有效的生活帮助和精神支持。农民工在城市容易产生“边缘人”的自卑感,形成自我隔离的状况,回避与城市居民交往,精神生活匮乏,这种交流的缺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距离逐渐增大。

最后,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一般在外务工的建筑业农民工大多为家庭中的年轻力壮的男性,他们承担着子女教育和养老的重任。而且农民工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随着近年来教育和医疗成本的逐年增加及子女结婚成家的费用与日俱增,农民工的家庭负担更加繁重。农民工务工收入微薄,为了补贴家庭而省吃俭用。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无法满足大多数的物质文化需要,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同步改善,反而在发展过程中使许多人陷入各种形式的相对贫困状态。

七 首都城镇化进程中针对农民工的减贫策略研究

只有分析清楚建筑业农民工多维贫困的现状 & 贫困成因,才能制定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实施相应的干预项目以早日改善建筑业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一)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待遇

户籍制度及其附加其上的歧视性政策,使农民工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均处于劣势。为了减轻乃至消除农民工的贫困状况,政府应当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各项福利政策,保证其作为公民的正当权益,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平等就业。做好农民工就业指导工作,及时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信息服务,帮助农民工实现充分就业。积极营造一种没有户籍歧视和偏见的氛围,尊重农民工,保障其权益,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二) 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提供住房保障

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是住房条件,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设施良好的廉租房。为此,政府应该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和生活环境。有条件的地方可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住房纳入所在城市经济适用房供应范围。在逐步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同时,加强农民工住房安全管理,提供符合国家建筑设计规范、消防标准、基本卫生条件、远离危险源和污染源的居住场所。这对于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贫困具有重大意义。

(三) 健全法律法规,加快形成农民工工资稳步增长机制,消除克扣和拖欠工资现象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收入稳步增长;督促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合理调整农民工工资水平,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严厉惩处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坚决杜绝此类现象。政府部门要积极督促公司和企业单位与农民工签订有效正规的劳动合同,对于雇佣无劳动合同农民工的企业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都要严肃处理,公检法部门可以为农民工依靠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便捷服务。

(四) 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度

政府可以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为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在出现事故、重病及生活拮据时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此外,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管力度,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定,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以保障农民工工作时的生命安全。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的安全意识,以防止农民工因为意外伤害而陷入极端的贫困之中。

（五）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其谈判力量

积极发挥党团、工会等组织的作用，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农民工行使参加所在地党团、工会的权利，强化其与资方谈判的力量。把农民工组织起来，不仅有利于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还能提高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工会组织既可以发挥劳动保护、监督检查作用，又开辟农民工维权热线，通过合法途径促进用人单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技术实力

由于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步伐逐渐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对农民工的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然而，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参加过知识和技能培训，能力贫困问题突出。政府部门和建筑公司应该积极合作，为农民工开展知识、技能培训的课程，探索建立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这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能力，增强其素质和竞争力，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

（七）提高农民工健康意识，改善其就医环境

农民工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有限，普遍缺乏健康意识，日常卫生状况较差，这为农民工的健康埋下隐患。政府或社会公益组织可以组织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农民工开展健康讲座，提供健康书籍，普及健康常识。同时，政府应该督促用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定期体检，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的权利。此外，对于农民工看病就医困难的问题，当地的医疗卫生部门可以扩大社区医疗的网点和范围，为农民工就医提供便利。企业应当定期进行公共卫生检查，保证农民工拥有健康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 [1] 林娜：《多维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 [2] 王春超、叶琴：《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 [3] 王美艳：《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
- [4] 侯为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 [5] 李善同、Walker Wendy 主编《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城市贫困的视角》，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 [6]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
-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 [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 [9] 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10] 王雨林:《对农民工权利贫困问题的研究》,《青年研究》2004年第9期。
- [11] 杨洋、马骁:《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 [12] 黄承伟:《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2)》,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 [13] 李春光:《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1)》,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 [14] 金莲:《城镇农民工贫困程度的测量》,《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 [15] 康建英:《农村向城市移民过程中的贫困现象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 [16]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17] 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18] 王小林、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
- [19] 樊丽淑、孙家良、高锁平:《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的表现特征及根源》,《理论导刊》2008年第5期。
- [20]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统计研究》2007年第3期。
- [21] 胡德巧、孙中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调研报告》2011年第8期。
- [22] 刘圣龙、张云阳:《辽宁农民工问题调查研究报告》,《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 [23] 蔡昉:《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
- [24]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期。
- [25] 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蔡禾:《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 [26] Alkire, S. and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PHI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8.
- [27] 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Satya R. Chakravarty,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 (1), 2003.
- [28] O'Brien, D., Wilkes, J., De Haan, A. and Maxwell, S.,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North and South,” Working Paper No. 55, Brighton: IDS, 1997.
- [29] S. Alkire, J. Foster,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 2007.
- [30]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nd Living Standard* (Allen Lane and Penguin Books, 1979) .

本文附录

附录1: 调查问卷

建筑业农民工问卷调查

姓名: _____ 联系电话: _____

A. 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

1. 你的性别: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龄_____周岁。
3. 你的民族: 1. 汉族 2. 少数民族
4. 你的文化程度: 1. 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中专/技校
5. 大专
5. 你的婚姻状况: 1. 单身 2. 已婚有配偶 3. 离婚 4. 丧偶
5. 分居 6. 未婚同居
6. 你的政治面貌: 1. 中共党员 2. 民主党派 3. 群众
7. 你家有_____口人, _____个儿子, _____个女儿, 其中_____人在上学; 有_____人在外务工; 家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60岁以上) _____人; 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60岁以上) _____人。(没有的情况下, 请填0)
8. 与你一起外出生活的家人有(可多选): 1. 没有 2. 儿子 3. 女儿
4. 配偶 5. 父母
9. 你是如何获得现在工作的? 1. 自己闯荡 2. 熟人介绍 3. 企业招聘
4. 劳务中介 5. 其他(请说明) _____
10. 你现在的户口类型属于: 1. 农业户口 2. 非农业户口
11. 你家去年(2012年)的年收入是_____元, 去年家庭年支出是_____元。
12. 你家庭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只选一项): 1. 建房/购房 2. 子女教育
3. 赡养老人 4. 医疗开支 5. 其他(请注明) _____
13. 你的家庭每月基本生活费是多少? _____

B. 就业与权益

1. 你干建筑前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只选一项) 1. 务农 2. 制造业(工厂打工)
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 4. 住宿和餐饮 5. 批发和零售业 6. 采

- 掘业（如挖煤矿） 7. 电煤水生产供应业 8. 其他（请说明）_____
2. 你干建筑业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只选择一项）1. 工资高 2. 工作好找
3. 技术要求低 4. 喜欢这行 5. 有发展 6. 其他（请说明）_____
3. 你干建筑业的时间：1. 不足1年 2. 有1~3年 3. 有3~5年
4. 有5~7年 5. 有7年以上
4. 你干建筑业后，共做过_____个项目，跟过_____个建筑公司，干过_____个工种，换过_____个工作（注意：没有换过工作的请写0）。
5. 你现在的工种：1. 管理人员 2. 木工 3. 混凝土工 4. 钢筋工
5. 普工 6. 电工 7. 砌筑工 8. 油漆工 9. 机械操作手 10. 管道工
11. 其他
6. 你与用工企业签订用工合同了吗？1. 签合同 2. 没签合同
7. （没有签合同的，不回答此题）你签的是_____（年）零_____（个）月的劳动合同。
8. 你的工资是怎么发的？1. 按天给 2. 按月给 3. 按年给 4. 按包工量给
9. 最近一年你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了吗？1. 没有遇到 2. 遇到了（拖欠次数为_____次，被拖欠总共数额为_____元，拖欠时间为_____天）
10. 你解决拖欠工资的方法是：1. 找政府 2. 找老板 3. 找维权组织/律师
4. 其他（请说明）_____
11. 你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1. 在8小时以内 2. 有8~10小时
3. 有10~12小时 4. 在12小时以上
12. 你现在平均每月工作多少天？1. 15天以下 2. 15~20天 3. 20~25天
4. 25~31天
13. 你节假日加班吗？1. 不加班 2. 经常加班 3. 偶尔加班 4. 每个节假日都加班
14. （节假日不加班的，不回答此题）你有节假日加班费吗？1. 有 2. 没有
15. 你工作时有劳动防护用品吗？1. 有 2. 没有 3. 很少
16. （没有劳动防护用品的，不回答此题）你得到的劳动防护用品是：1. 企业免费提供 2. 企业免费提供一部分 3. 自费购买
17. 你对当前工作满意程度是：1. 很满意 2. 满意 3. 一般 4. 不满意
5. 很不满意

C. 能力与发展

1. 你参加过与建筑业相关的技能/知识培训吗? 1 参加过 2. 没有参加过
2. (参加过建筑业技能/知识培训的, 不回答此题) 你为什么不参加与建筑业相关的技能/知识培训? 1. 不知道哪里有培训 2. 觉得没有必要培训 3. 培训费用太高
4. 耽误时间, 会影响收入 5. 没有机会培训 6. 其他(请说明) _____
3. (没有参加过建筑业技能或知识培训的, 不回答此题) 你接受过的培训或学习的性质是(可多选): 1. 免费 2. 半自费 3. 全自费 4. 带薪培训
4. (没有参加过建筑业技能或知识培训的, 不回答此题) 你接受过培训或学习的内容有(可多选): 1. 劳动技能 2. 法律常识和劳动权益 3. 工作安全知识
4. 疾病预防 5. 文化知识 6. 其他(请说明) _____
5. 你的技能等级是: 1. 初级 2. 中级 3. 高级 4. 技师 5. 高级技师
6. 你的劳动技术是如何学到的? 1. 自学 2. 师傅教的 3. 参加老家政府开展的培训 4. 参加城市劳务部门组织的培训 5. “农民工学校”教的 6. 在社会上开办的培训学校学会的 7. 其他(请注明) _____
7. 您目前生产生活存在的困难?(可多选) 1. 工资太低 2. 拖欠工资
3. 工作不安全 4. 生活卫生条件差 5. 看病难 6. 养老难 7. 找工作难
8. 干活时间太长 9. 子女教育条件差
8. 你目前拥有以下哪些社会保险?(可多选) 1. 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2. 工伤保险 3.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 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 6. 商业医疗保险 7. 生育保险 8. 其他(请注明) _____
9. 你当前最需要参加的保险是(只选择一项): 1. 工伤保险 2. 医疗保险
3. 失业保险 4. 养老保险 5. 生育保险 6. 不需要参加保险
10. 你未来2~3年的打算?(只选择一项) 1. 继续干建筑 2. 回老家务农
3. 回老家创业(从事非农职业) 4. 在城市改行再打工 5. 其他(请注明) _____
11. 你最希望学到的是什么?(只选择一项) 1. 建筑业的技能 2. 农业实用技术 3. 经商管理知识 4. 基础文化知识 5. 安全知识 6. 法律常识和劳动权益 7. 疾病预防 8. 其他(请说明) _____
12. 你愿意在下列哪个地方定居? 1. 农村老家 2. 老家所在地的镇上
3. 县城 4. 地级市 5. 省会城市 6. 直辖市
13. 如果你在城镇定居了, 你如何处理老家承包土地? 1. 保留承包地, 自家耕种

2. 保留承包地, 有偿流转 3. 保留承包地, 入股分红 4. 承包地换城镇户口
5. 给城镇户口, 有偿放弃承包地 6. 其他

14. 如果你在城镇定居了, 你希望如何处理老家宅基地?

1. 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 将来备用 2. 有偿转让宅基地和房产

3. 给城镇户口, 有偿放弃 4. 置换成新的住房 5. 其他 (请注明) _____

15. (打算在城镇定居的, 不回答此题) 你不选择在城镇定居的原因是什么? (可多选)

1. 缺乏在城市生存的技能 2. 户口限制 3. 房价太贵 4. 小孩上学难
5. 不愿离开农村 6. 其他 (请注明) _____

D. 生活与健康

1. 你目前在城市打工如何解决住的问题? 1. 已在城里买房 2. 工地免费提供住宿
3. 租房 4. 没有住处

2. 如果你是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 (包括建筑工棚), 房间面积是 _____ 平方米; 每个月的租金是 _____ 元 (不用租金的, 请填 0); 实际居住人数是 _____ 人。居住状况是: _____ 1. 和家人同住 2. 和工友同住

3. 你现在住的房子建筑面积是 _____ 平方米; 每个月的租金是 _____ 元; 实际居住人数是 _____ 人; 离工作地点有 _____ 公里。

4. 你现在使用的厕所是什么样? 1. 室内冲水厕所 2. 集体住房内厕所 3. 集体住房外的厕所 4. 无厕所或灌木丛或田间 5. 其他 (请说明) _____

5. 你对在这里生活的居住条件满意吗? 1. 很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满意 5. 很不满意

6. 你平时喝的水是: 1. 自来水 2. 深度大于 5 米的井水 3. 其他水源 (河塘湖泊、雨水收集、未受到保护的泉水和浅水井等) 4. 其他 (请说明) _____

7. 你在这里生活用电情况怎么样? 1. 从来不停电 2. 偶尔会停电
3. 经常停电 4. 不通电

8. 你在这里生活都有一些什么生活电器或设备? (可多选) 1. 电脑
2. 彩色电视机 3. 摩托车/电动车 4. 冰箱/冰柜 5. 小轿车 6.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7. 洗衣机 8. 空调 9. 热水器 10. 电暖器 11. 微波炉/电磁炉 12. 没有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电器或设备

9. 你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1. 自己做饭吃 2. 公司免费食堂
3. 公司收费食堂 4. 到餐馆吃

10. 你对目前的伙食满意吗? 1. 很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太满意 5. 很不满意

11. 你在这里生活的个人开销每天是_____元。

12. 与去年相比,你个人目前的生活开销是怎么样的? 1. 增加了 2. 减少了

3. 没变

13. 你对在这里的生活条件满意吗? 1. 很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满意 5. 很不满意

14. 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 1. 很好 2. 较好 3. 一般 4. 很差

15. 你现在一般多长时间体检一次? 1. 一年 2. 两年 3. 两年以上

4. 从来不体检

16. 你最近生过病吗? 1. 没生过病 2. 生过病但不严重 3. 一般 4. 严重

17. 如果你生病了,如何治疗? 1. 去医院治疗 2. 自己买药治疗

3. 不治疗

18. 如果你生病不治,一般是什么原因? 1. 病情轻 2. 缺钱 3. 没时间

4. 到医院的路程太远 5. 医院服务差 6. 看了也没用 7. 其他(请说明) _____

19. 在过去6个月里你住过院吗? 1. 住过 2. 没住过

20. 如果你生病,住院费用在老家新农合报销吗? 1. 报销 2. 没有报销

21. 如果你生病了,却没有报销,一般是为什么? 1. 手续不全,不给报 2. 手续复杂,不愿报 3. 回去不方便,报销成本太高 4. 还没有来得及回去报销

5. 其他(请注明) _____

22. 你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可多选): 1. 看电视 2. 短信 3. 上网 4. 看报/杂志 5. 参加公益医疗服务活动 6. 与朋友聊天 7. 其他(请注明) _____

E. 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

1. 你与班组长、劳务公司经理的关系如何? 1. 很好 2. 较好 3. 一般

4. 不好 5. 很不好

2. 你觉得目前工地上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1. 很好 2. 较好 3. 一般

4. 不好 5. 很不好

3. 你与城里人(例如同事、邻居)有来往吗? 1. 从不来往 2. 偶尔来往

3. 经常来往

4. 打工期间,遇到困难时你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可多选) 1. 家庭成员

2. 亲戚 3. 老乡 4. 朋友/同学 5. 同事 6. 工作单位/老板 7. 城市居民 8. 当地政府 9. 司法、执法机构 10. 警察 11. 公益组织/社区组织

12. 公会/妇联/共青团 13. 新闻媒体 14. 宗教组织

5. 你平常主要有哪些业余活动?(可多选) 1. 没有业余活动 2. 上网

3. 看电视/听广播 4. 读书看报 5. 看电影/看戏 6. 逛街/逛公园 7. 打麻将/下棋 8. 其他(请说明) _____

6. 你愿意参加本地区举办的文化体育活动吗? 1. 愿意 2. 不愿意

7. 你参加过本地区举办的文化体育活动吗? 1. 没有参加过 2. 参加过

F. 你老家的生活状况

1. 你家是否被列为老家所在地的贫困户或低保户? 1. 贫困户 2. 低保户

3. 两者都是 4. 两者都不是

2. (觉得自己家里不贫困的, 不回答此题) 如果你家里贫困的话,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家里贫困?(可多选)

1. 自然灾害 2. 疾病和损伤 3. 孩子上学 4. 盖房买房 5. 自己缺乏文化和技能 6. 交通不便 7. 地少 8. 其他(请说明) _____

3. 你在农村老家居住的房子的墙体属于? 1. 砖/石头 2. 混凝土 3. 波纹形金属 4. 木头 5. 泥土/沙石 6. 土坯 7. 竹子 8. 稻草/麦秆 9. 其他

4. 你在农村老家的住房地面类型是? 1. 泥土地面 2. 水泥地面 3. 瓷砖 4. 木地板

5. 你现在对农村老家的住房条件满意吗? 1. 很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满意 5. 很不满意

6. 你个人有没有承包地或口粮田? 1. 有 2. 没有

7. (有土地的, 不回答此题) 你没有土地的原因是什么? 1. 被征用了 2. 转让了土地经营权 3. 二次承包时没分到地 4. 其他

8. (没有土地的, 不回答此题) 你的承包地或口粮田目前由谁来耕种或经营?

1. 自己 2. 家人 3. 让别人免费耕种 4. 撂荒 5. 出租/流转

9. 你在老家生活的住所有下列哪些设备?(可多选) 1.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2. 彩色电视机 3. 冰箱/冰柜 4. 摩托车/电动车 5. 洗衣机 6. 微波炉/电磁炉 7. 热水器 8. 电暖器 9. 电脑 10. 空调 11. 小轿车 12. 没有上面说的任何一种电器或设备

10. 你在农村老家做饭主要使用什么燃料? 1. 天然气或液化气 2. 沼气 3. 煤 4. 柴草/动物粪便 5. 电 6. 其他(请注明) _____

11. 你在农村老家生活用水属于：1. 自来水 2. 深度大于5米的井水 3. 受到保护的泉水 4. 其他水源（河塘湖泊、雨水收集、未受到保护的泉水和浅水井等）
12. 你在农村老家生活用电情况如何？1. 不通电 2. 从来不停电 3. 偶尔会停电 4. 经常停电
13. 你在农村老家生活使用的厕所是以下哪一类？
1. 室内冲水厕所 2. 室外冲水厕所 3. 干式卫生厕所（三联沼气、双瓮漏斗式、三格化粪池等） 4. 粪桶 5. 旱厕 6. 无设施或灌木丛或田间
7. 其他
14. 在农村老家你觉得去医院（诊所、卫生室）看病方便吗？1. 非常方便 2. 比较方便 3. 一般 4. 不方便 5. 很不方便
15. 在农村老家，你去医院（诊所、卫生室）看病的最主要方式是？1. 步行 2. 骑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 3. 坐出租车/小轿车 4. 坐公交车
16. 离你农村老家住所最近的医院（诊所、卫生室）有多远？1. 不足1公里 2. 有1~2公里（不含2公里） 3. 有2~3公里（不含3公里） 4. 有3~4公里（不含4公里） 5. 有4~5公里（不含5公里） 6. 有5公里及以上
17. 你家里是否所有成员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 是的 2. 没有
18. 你家里的老人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吗？1. 是的 2. 没有
19. 你对自己在农村老家的生活状况的评价是：1. 很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满意 5. 很不满意

附录2：访谈内容

1. 你愿意参加本地区的社区公益活动（献血、募捐、做义工）吗？
1. 愿意 2. 不愿意
2. 你参加过本地区的公益活动吗？
1. 没有参加过 2. 参加过
3. 你愿意参加本地区的业主委员会活动、选举或评选先进等活动吗？
1. 愿意 2. 不愿意
4. 你参加过本地区的业主委员会活动、选举和评选先进活动吗？
1. 没有 2. 参加过
5. 你有参加过老乡会/同学会等联谊组织吗？

1. 没有参加过 2. 参加过
6. 你参加过一些兴趣爱好组织（如唱歌、跳舞类的组织）吗？
 1. 没有 2. 参加过
7. 你参加过一些维权组织（工会、互助会、法律维权组织等）吗？
 1. 没有
 2. 参加过
8. 你对下列关于农民工的内心感受和表述有什么看法：
 - 8a. 我觉得我不是农民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确定 4. 反对
 5. 强烈反对
 - 8b. 我不喜欢农村的生活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确定 4. 反对
 5. 强烈反对
 - 8c. 我虽在这里工作却不属于这里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确定
 4. 反对 5. 强烈反对
 - 8d. 城里人很排斥我们打工者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确定
 4. 反对 5. 强烈反对
9. 以下说法是否符合你在打工期间的内心感受：
 - 9a. 我喜欢和别人聊天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9b. 我很少跟其他人聊天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9c. 我能够吃饱穿暖已经很满足了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9d. 与以往相比，我现在生活处境变艰难了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9e. 我感觉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变化的步伐了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9f. 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多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9g. 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10. 在过去一星期里，你是否有以下方面的感受和行为：
 - 10a. 感觉到生活充实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10b. 经常会感到心烦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10c. 感觉自己是精力充沛的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 10d. 觉得大多数人都比自己有钱
 1. 是 2. 否 3. 不好说

学术综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九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

李怡乐 韩文龙*

2015年10月17~18日,第九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成功举办。本届会议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各理事单位共同主办,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承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内外60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14家学术期刊和出版单位的150名代表参加。会议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制定“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际召开,有着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全会围绕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思想史传承与方法论构建;当代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with 全球经济演化实践;新常态下农村经济、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形成了很多创新性、有交锋的重要观点。现简述如下。

一 新常态下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方法论问题研究

本届年会上,与会专家首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政治经济学自身面临的创新重任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其中,逢锦聚教授发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呼声。他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其关键又在于理论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华民族的传统经济思想、世界各国文明成果这四个方面理论智慧与历史经验的汲取有助于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刘灿教授提出了新常态下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她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征和问题,而且要从基本经济关系层面上研究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权利、利益关系的变化,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基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何祚庥院士分析了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在当下表现为“科技、市场的社

* 李怡乐、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会化”和“占有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提出深入改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史正富教授提出了“双层市场理论与中国道路”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政策构想。他构建了“普通商品市场”与“基础性要素市场”两类市场体系，企业竞争力由普通商品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和基础性要素市场要素价格两方面构成。两种市场的运行规律不同、治理结构不同，亦要求国家职能发生变化。特别表现为政府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营造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并进一步分析了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SBA）投资对于巩固超常增长战略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宏大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侧重于从思想史分析出发，提出了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各个特定领域所需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韦森教授从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角度对作为“商品货币”和“债务货币”的货币本质进行了再反思；探究了思想史上货币、利率、投资、资本形成与商业周期关系的演变；剖析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货币主义的破产；进而探讨数字货币时代中国是否正在形成一个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央银行与货币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的关系。左大培研究员引入数量化模型，诠释了李斯特保护关税培育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主张；考察了美国、日本、德国的发展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探究了保护关税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通过扶植一国新产品的生产，成为最有力的促进落后国家发展的方式，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蔡继明教授分析了西方国家及我国混合经济的形成，即公有制与私有制、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多种分配方式三方面混合的现象，进而探讨分别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大经济思想体系，即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同宗同源且殊途同归，将以广义价值论的构建为基础走向理论上的共融。刘方健教授等对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探究，分析了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价值。卢映西博士等提出经济学理论重构中的首要任务是对人性问题进行再认识，马克思主义为揭示人性的本质提供了真正科学的方法。

二 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全球经济演化实践研究

不断深化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分析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与演化的实践，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学会致力于完成的目标。本届年会上，与会代表就劳动价值论的现代表达、互联网虚拟价值问题、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与财富分配关系演变、技术变革与利润率变化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的宏观模型构建、城镇化与资本空间运动等问题展开了新颖而深入的研讨。

1. 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本次会议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突出了其现代数理表达,如何运用于分析生产效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以及互联网等新经济现象。冯金华教授提出,劳动价值理论不仅可以运用于分析收入分配领域,而且可以运用于分析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生产效率问题,而后者恰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常忽视的。他认为,可以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基础上,说明和推导单位劳动价值量的概念与公式,并根据单位劳动价值量,确定任意一个行业或企业相对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高低,比较任意不同行业或不同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小,从而构造出劳动、价值与效率之间直接的关系。马艳教授剖析了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性质、互联网空间的虚拟商品属性、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定价模型和虚拟价值,以及将互联网空间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变量,考察其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宋树理博士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汇率决定理论缺乏应有的国际价值基础,有必要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推导国际价值决定的一般汇率形式,并讨论汇率的变化规律。罗雄飞教授认为狭义“转形问题”长期被当作一个数理逻辑问题,从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看,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的差异引起的一个伪命题。严金强博士则运用计算机软件 matlab 对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动态形成过程进行仿真模拟演示,以展示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动态转化机制与均衡过程,同时论证动态价值转形模型的合逻辑性和可操作性。

2. 资本积累金融化问题研究

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典型现象,深入研究其形成原因与影响机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规律具有重要影响。以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为引入点,葛杨教授考察了社会财富金融化的典型特征,及其作用于收入和财富集中度提升的典型机制;关注了金融化的世界进程、突出影响,以及我国在全球金融化浪潮中需要汲取的教训和改革的方略。马淮博士分析了当今世界虚拟经济产生的原因,将虚拟经济归结为资本在与劳动有限性的矛盾中,为提高利润率而脱离生产,通过资本化定价手段投机性地再分配社会流动性而形成的经济系统。杨慧玲教授提出全球化和金融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近 20 年来,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以货币“外生性”为基础的货币“中性论”站不住脚。张兴无博士从波兰尼的观点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认为金融自由化并非自然的经济趋势,而是国家决策和政治选择“有意培植”出来的;它也会引起社会的反向运动,金融危机的结果将把金融市场重新带回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之下。张雪琴同学评析了拉帕维查斯的金融化理论,认为金融利润从根本上源自剩余价值,同时也来自于对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剥夺,反映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

3. 技术变革与利润率变化趋势研究

充分认识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特征,合理解释超额利润的来源,并对利润率变化规律做深入考察,始终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必须解决好的基础理论问题。对此,刘刚博士详细分析了部门内的超额利润不仅源于企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且源于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异。骆桢博士讨论了技术进步导致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提出利润率下降并不是一个由技术进步决定的独立运动过程,当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和持续增长的时候,利润率下降会因为不变资本变便宜而受阻;当资本主义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时候,利润率就会出现下降的趋势。裴宏博士等详细区分了置盐定理和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前提假定、研究对象和理论目的,指出置盐定理实质上正是证明利润率下降理论中所预言的各种“反作用因素”,二者在经济原则上是相容的。

在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性和应用性研究中,还有以下代表性的视角:刘小怡教授运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概念,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及其有关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劳动市场均衡、生产函数、生产价格决定等问题的论述,构建了一个马克思式的AS-AD模型,论述了这个模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现实指导意义。丁为民教授提出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趋势主要是资本积累和资本空间运动的结果,资本积累和资本运动的矛盾在其空间运动和城镇化中表现出来,由此引发的城镇变迁和兴衰,是资本暂时解决矛盾的手段和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空间运动和城镇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理论与历史经验对我国实现新型城镇化有重要启示。

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前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本届年会上,参会代表还就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各关键领域中最为人瞩目、最能引发学术争论的问题做出了重要研讨。其中包括:

1.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变革的讨论

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确权”的具体机制、集体土地入市过程中呈现的典型矛盾、农业经营制度变革过程对农民主体的影响、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如何同步跟进等学术热点话题是十八大以来经济学界集中关注的农村经济焦点问题。对此,杨继瑞教授依次分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对策,以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调查案例为背景,提出了在尊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活跃务农者经营权的总前提下,理顺每一种权利关系的可操作性办法。盖凯程教授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视为既有土地利益关系的重构,

他提出城乡土地市场二元分割和非对称的土地权利架构塑造了非均衡的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各利益主体围绕争夺土地增值收益和外部利润的博弈推动着农地非农化模式的变迁，这一过程内嵌着土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向农民（集体）转移的核心逻辑。康静萍教授等分析了新常态下“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所面临的培育对象选择及来源短缺问题，指出现有问题的原因在于培育主体过于单一、农业经营收益较低、返乡农民工并未大量从事农业生产和留守劳动力优势未得到充分开发。为此应加大对培育主体的资金投入，并围绕农民要求增加收入的诉求制定政策，为大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有力支撑和帮助。娄锋博士应用马克思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分析的理论内核，结合历史事实，说明农业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视角分别是分工协作与产权关系演进的结果；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则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而新制度经济学所谓降低交易费用的观点，则是分工协作和产权关系对分工协作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纪尽善教授提出，建设农民就地聚居点应是城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模式。当前我国应采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挂钩的政策措施，推进农民就地聚居点建设。

2. 关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与改革的讨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本届年会参会学者也就收入分配领域的新现象和部分焦点理论问题做了有益的讨论。李实教授解析了近期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首先就收入差距的度量——抽样调查测算基尼系数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方法做了详细诠释，并给出了当下运用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前后比较可信的基尼系数范围；进而分析了2007~2013年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总体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和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经济增长减速未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农民工劳动力加速转移及其工资的上升；同时考察了居民财产分布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表现为房产价值的快速上升和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后指出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成功面临的难点问题，包括如何同步提高低工资人群的工资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缺少有效的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垄断势力和部分利益抗拒改革等方面。王云中教授等考察了国有垄断行业按劳分配的实施环境与特点，指出国企职工的按劳分配不仅应以其劳动要素的贡献为依据，还应兼顾到处于不同市场结构中的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职工的劳动报酬是否公平；按劳分配在量上的实现应该是一个有兼顾的相对变动的弹性区间。李福安教授等提出，由于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的特殊性，工资不应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政府必须干预初次分配，从最低工资等六个方面调节初次分配；协调和均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调整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徐晓红整合CHIP数据和CFPS数据，测度并分析了

教育、职业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传递和职业传递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但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镇居民的教育传递贡献率高于职业传递，农村居民则相反。并且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教育、职业路径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为此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建立公平的就业平台，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

3. 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现实问题研究

在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劳动力供需条件变化的具体情境下分析中国产业升级问题，并引出政府在其中必需的作为及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基础性作用，是本次会议讨论这一议题时的典型特征。高粱研究员指出当下推动中国产业升级需要处理好开放性和自主性，以及政府干预和微观活力这两方面的关系。实践中应坚持以产业自主发展为前提；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同时能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各方面的作用；使外资政策从根本上服从本国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自主升级政策，统筹兼顾开放与市场保护政策，限定具体的引资范围、合作方式与针对垄断行为的外资审查制度。以有关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为基础，黄少安教授讨论了在劳动力供需条件和用工成本变动的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他指出，所谓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不过是市场均衡工资的形成，不等价于劳动力短缺，过往中国工人工资被压得过低，创造了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但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人口红利而成为发达国家，我们也不必留恋低工资的人口红利，更无须再造它。而应把人口红利消失作为倒逼机制，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张四灿博士在考虑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中间投入的三部门新凯恩斯模型，以此分析产业间联系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具体机制，并提出，政府要实现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应注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消除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宋磊博士讨论了过往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特征的研究主要由强调宏观因素或政府作用的研究所主导。这些研究由于忽视经济主体的结构性特征，存在缺乏微观基础的问题。现实中模块化的分工方式和将美国企业组织形态视为唯一最优解的经济理念在推动中国企业扩张规模的同时，抑制了中国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宏观问题也应做好企业微观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工作。

4.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与国企改革问题研究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分类型国企适用的治理结构，以及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领域最为前沿的问题。就此，荣兆梓教授探讨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如何实现的举措。提出产权改革要由公司制延伸至信托制，国有资本转型为信托资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政府

自益信托的形式保持最终所有者的身份；二是政府依法设立他益信托——社会投资信托基金，直接将全体人民设立为基金受益人。国有资产分类管理不是按企业职能，而是要落实到分类资本管理的顶层设计，包括公益性、产业性、竞争性国有资本的分类管理。对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管理模式而言，信托制度可以满足政资分开的需要，信任与监督机制、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营和信托合伙人的激励需同步建立。刘灿教授的研究发现，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取决于转轨国家市场发育程度及改革的初始条件；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的企业比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也是更适用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所有制选择模式。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部分。一个透明、规范及权利制衡的治理结构，才能有效保护各类投资主体的产权利益，构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自然垄断行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问题。齐昊博士等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增长模型，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与经验关系。他们提出，国有企业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权衡只在短期存在，同时私有企业建立在超时劳动基础上的配置效率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会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证实，国有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拖累作用，并且在长期中有利于经济增长。

5. “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扩大对外经济合作、获取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重要源泉。对此，周文教授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为“一带一路”战略寻找理论支撑，并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此的质疑。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好地以资本输出实现合作共赢，推动资源要素的全球化分工，促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多元化。葛浩阳同学分析认为随着国内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国外市场的需求疲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了新的格局：开放区域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内陆，贸易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贸易往来由偏重“引进来”转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开放领域由单维度转向全方位、多领域。“一带一路”战略遵循互惠互利、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并需防范海外投资风险。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准确把握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如何实现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长效机制、构造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四 政治经济学其他问题研究

在有关中国经济史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陈乐一教授利用CPI指标，以改革

开放为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物价波动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出我国物价波动的客观规律,旨在为我国维持币值的稳定,提供宏观经济决策方面的参考和依据。张晓宇博士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大萧条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大萧条的冲击通过白银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到中国银元汇率和货币供给,造成当时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方建国教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一元化领导体制推动了国营经济力量的增长,促进了私营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人民生活水平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最快速上升时期,以及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在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实证研究领域,李建德教授等分析了上市公司的政企关联与银行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建立政企关联的上市公司可比没有建立政企关联的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在具有相同层次的政企关联条件下,董事长政企关联要比总经理的政企关联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李萍教授等提出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当前改革理论和实践重点关注的领域,既有研究多论及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利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性,还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新方向。陈师博士的研究认为金融市场不完善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会造成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干预,同时弱化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进而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白烁博士等的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后,东部地区的发展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环境限制条件下略有下降是由技术进步的限制造成的,“西部大开发”是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

历时一天半的第九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贡献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成果,验证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为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繁荣、在新形势下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政治经济学报》投稿格式与注释规范

(一)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请作者将自己的姓名、署名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所受资助、感谢语等信息全部列于与正文内容无关的首页。在正文中，则应去除自己的姓名。

所投文章，无论本刊是否采用，恕不退稿。请作者做好稿件备份工作。

(二) 文章正文，小四宋体，1.5 倍行间距；所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全部采用“Times New Roman”格式。

(三) 文章一般包括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注释。

1. 摘要。摘要是对文章主要观点的概括，200—300 字左右。本刊欢迎有条件的作者，提供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2. 关键词。作为文章核心范畴的关键词，3 至 5 个。

3. 正文。正文的一级标题使用“一、XXX；二、XXX”格式，前后各空一行，并居中、加粗。二级标题使用“（一）YYY；（二）YYY”格式，左起空两格、加粗。

4. 参考文献。西文在前，中文在后。中文或日文按作者姓氏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西文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具体样式为：

(1) 专著。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论文。例如，罗斯多尔斯基：《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4 期。

(3) 报纸。例如，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学习时报》2015 年 9 月 7 日。

(4) 网站资料引用。例如，周艾琳：《央行盛松成：人民币贬值是短期现象》，《第一财经日报》2015 年 9 月 28 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928/011823362920.shtml>。

(5) 正文行文中，需要标明出处的引文或提示。例如，“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2004：10）

5. 注释。凡是需要对读者进行特别指明并强调的文献引用，亦包括进一步的说明性文字，需要使用“当前页下脚注”，以“①、②、③”小五号宋体，每页重新编排。

《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报. 第6卷 / 孟捷, 龚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097 - 9373 - 2

I. ①政… II. ①孟… ②龚… III. ①政治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3952 号

政治经济学报 第6卷

主 编 / 孟 捷 龚 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陈凤玲

责任编辑 / 陈凤玲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373 - 2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稿 约

《政治经济学报》（原《清华政治经济学报》）创办于2013年，旨在推进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并鼓励以多学科视角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举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斯拉法经济学、女性经济学、非均衡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进路的理论、历史和实证的研究，均在本专辑欢迎之列。

本专辑发表的文章不限字数，只要内容言之有物，即可刊登。

注释体例请参考本专辑已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格式。

来稿请寄：mengjie@ruc.edu.cn; 或libangxi@gmail.com

《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报》（原《清华政治经济学报》）创办于2013年，旨在推进国内经济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并鼓励以多学科视角进行经济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学派化、数理化、跨学科多样态势，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本专辑旨在系统地展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是了解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上架建议：政治经济学

ISBN 978-7-5097-9373-2



定价：58.00 元